书名：薛明（贺龙夫人）传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署名：肖羽/编著

书号：ISBN 7 - 5034 - 1072 - 3/K · 365

电子版定价：5.00元

版本：2006年1月第1版

CIP数据核字（2005）第230288号

目 录

一、风满楼	1
二、迷惘的革命者	15
三、短兵相见	29
四、织 网	42
五、空问行云凝眸处	49
六、无计赴国忧	69
七、关河梦断	83
八、大树悲风鸣	94
九、凄风苦雨	106
十、欲暖还寒	137
十一、忽闻人间曾伏虎	155

一、风满楼

1965年初冬。

这一年的寒流来得急迫迅猛，刚交立冬，西北风刮起来已经像群狼似的嗥叫不止了。院里的柿子树叶儿落得精光，几根枯瘦的残枝在寒风中摇摆。西伯利亚刮过来的寒流久久地盘踞在北京上空。好在屋里已经烧上了暖气，和室外俨然是两个天地了。

薛明把贺龙过冬的衣服都翻腾了出来，摆在床上一件件地翻着。她盘算着，该补的补，该拆的拆，该添置的也要添置件把。贺龙的衣服不多，常穿的也就是那么几套军服。整理起来很方便。贺龙坐在沙发上看新来的大参考。

薛明说：“别光顾了看，快过来比比这件毛衣，还是刚进城的时候织的，好像瘦了！”

贺龙转过身去，让薛明举着毛衣在背上比划，眼睛还是没离开那几行铅字。

秘书急匆匆地进来：“首长，刚接到中央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贺龙抬起头来，问道：“什么内容？”

秘书说：“没有讲。”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以往通知开会的同时都要一并告知会议内容，让与会者好作些准备。

贺龙又问：“几时开会？”

秘书说：“12月6日。”

贺龙沉吟了一会，点点头说：“好，知道了。”

薛明（贺龙夫人）传

秘书出去了。担任贺龙办公室主任的薛明这才开口道：“要不要再打个电话问问？到底开什么会嘛。”

贺龙说：“他不说不说，就有他不说的道理。不用问了。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发了个通知，是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这事挺急。可能会议还是与此有关。”

薛明说：“你这是瞎猜。”

贺龙皱了皱眉头说：“猜就猜一回嘛。你去跟秘书说一声，把东南沿海的作战地图和有关材料都给装上！”

上海的冬天显得姗姗来迟。贺龙一行下了飞机，便被接到一所独门独院的平房里，这里是兴国路1号。院子里的冬青树剪得齐齐整整，在冬天里看到一抹青绿很让人兴奋，薛明很高兴，觉得这个环境挺静谧。

简单地安顿了一下，秘书便来通知，过一会准备开会。会开的时间很长，已经很晚了，贺龙还没有回来。服务人员来问可不可以开饭摆台子了，薛明说再等一会。稍等了片刻。门外汽车声响，小罗说：“是首长回来了。”便去通知开饭。

贺龙大踏步地走了进来。薛明说：“怎么这么晚？”贺龙的脸色挺难看，一声不吭，薛明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想了一下，此刻要问，一是显得仓促，二是有时会议上的事，贺龙要不愿意说，问了也白搭。于是决定不问，只是催着开饭。

贺龙说：“不想吃！”

这事态就有点严重了。贺龙不是那种遇到点事会憋在心里的人，从前不管打仗、行军、工作怎么难，他总是说：肚子是要吃饱的，吃饱了才有劲干革命。今天居然说不想吃

饭，可见遇上的不是一般问题了。

薛明不得不发问了：“怎么回事？去开会前还好好的呢，会上说什么了？”

贺龙犹豫了一下，呼吸都显得粗喘急迫起来，不过声音并不高：“这次开的，是批判罗长子的会。真是没想到哇。”

“没有想到”这句话明显是带有情绪，只能跟薛明说。没有想到或者想不通的事情，以前也有过，等弄明白了或是弄清楚了，问题就算解决了。但这次不一样，批判罗瑞卿，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开始只是说关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单是这个问题，一年前有过争论，贺龙以为已经平息了，没有想到旧话重提，而且声势还很急重，一上来就准备给罗瑞卿戴上一顶反党的帽子。

当然事情的变化不是一夜之间才有的，回想起来，大约是从1964年，许多事开始显出别扭来了。

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以后，发现了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于是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中央军委在1964年的1月3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

事情进展的很顺利，由于这种教学方法生动活泼，收效显著，很容易为广大指战员接受，所以，这个群众性练兵活动很快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在那段时间里，贺龙显得年轻许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练兵活动中去。下了部队，看了军事表演，他回来

薛明（贺龙夫人）传

就对薛明说：“你该去看看，那些战士打的真是精彩。兵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嘛，过去战争时期，我们不也是很重视练兵吗？”薛明瞧他高兴，便故意和他抬杠说：“那得打掉多少子弹哇？那不是浪费吗？”贺龙没听出来薛明的“别有用心”，认真地点着薛明的鼻子说：“你这个同志，观点不对头呀！账不能这么算嘛！如果发100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50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做是有点划不来，用100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薛明说：“对呀！”贺龙笑了起来：“对什么对！告诉你，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反过来，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50发子弹可能打中50个敌人。”在贺龙的影响下，薛明也成了军事训练迷。只要有看军事表演的机会，一定不放过。

练兵运动在深入开展，为了进一步掀起练兵热潮，4月中旬，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北京军区被拔为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由总参谋长罗瑞卿组织实施。“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相当成功。贺龙觉得应该让中央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精彩的军事表演。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建议。贺龙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但是，仿佛泥牛入海，那封信没有得到回音。也许，这就是一个讯号，但贺龙忽略了，因为更令人兴奋的事向他涌来。当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后，毛泽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且以他一贯的幽默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

简报上提笔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

6月15日和16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北京和济南两个军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在长长的一串到场的显赫的中央领导人的名单里，独独没有林彪。

贺龙又一次忽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这一系列的、被很多人称为“我军的盛举，我国发展史上光辉篇章”的活动中，林彪一直没有露面。

原是不应该忽略这件事的。但确实有一些另外的因素影响了判断。众所周知，林彪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症。比如说，怕见风，爱出汗，只要一看见水就拉稀。所以，他在北戴河的别墅盖了好几处，一定要在一个看不到海水、听不到海浪，但又能嗅着有海边新鲜空气的地方。他总是以一个疲倦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所以，当这样一个病人，没有参加类似军事表演这样比较容易引起劳累疲惫的户外活动时，没有能够引起包括贺龙在内的任何人的注意，也并不奇怪。

不过林彪没有总是闲着。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的时候，林彪派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广州军区蹲点；假调查研究之名，行搜集大比武“罪证”之实。

叶群是以什么身分去的，谁也没有说，这个工作组在下面蹲了一个来月，先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好几份调查报告。夸大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苗并丘、

薛明（贺龙夫人）传

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十大问题。报告中有的话说得分量很重，可谓危言耸听：“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又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

在大比武中，出现一些问题并不奇怪，而且贺龙与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正了。贺龙三令五申，反复告诫部队必须是练为战，不能练为看，坚决反对拼凑“尖子”和其他种种弄虚作假的现象。这些问题经提出后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叶群这次把它重新提出来，并非是为了改正缺点，多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毛泽东支持的练兵运动，公开提出反对是不策略的，但可以换个说法，拿的出手的理由是“政治挂帅”，让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还有一层意思，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出来的。

应该说，林彪和罗瑞卿先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罗瑞卿是四川人，人很能干。在彭德怀被罢官之后，由国防部长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林彪有病，也是为了照顾他，毛泽东告诉过罗瑞卿：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军队的事。罗瑞卿和贺龙还有其他军内领导人一起搞了这个“大比武”运动，

搞的这样轰轰烈烈，全军都热火朝天地动了起来，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观看军事表演，不仅毛泽东亲自去了，还带去了在京的中央首长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何等的风光热闹，却独独没有林彪。林彪不能容忍了。林彪的愤怒也是理所当然的。

林彪曾经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这里虽然是用了“我们”这样一个显得挺近乎的词，不过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罗瑞卿本人无关。说到“南昌暴动”，当然是另有所指。林彪有时候对自己缺乏自信。罗瑞卿对林彪这种酸酸的想法没有吭气，这也不是他可以随便议论的问题。

在延安时，有一次兴致所至，毛泽东曾送过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毛泽东有敏锐准确的观察力，这是对罗瑞卿突出的个性有感而言，也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引导。严格的说，罗瑞卿对毛泽东这两句深奥的评语一直是迷惘的，他很不懂得避过锋芒。他坚持认为1964年的军事训练成绩是主要的，大比武始终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罗瑞卿说了这样一句话：政治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不能搞空头政治。林彪听到各总部、各大军区及军兵种领导对他提出的“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赞同时，只是冷冷地说：“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大比武的风波算是过去了，但是林彪和罗瑞卿，也许还有别的谁，之间却拉开了距离。

这次上海会议的前十天，林彪在苏州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罗瑞卿，说了一通关于治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的话题。罗瑞卿觉得谈话的气氛显得比往日还轻松些。自然没有想到，十

薛明（贺龙夫人）传

天后召开的上海会议就把他整了下去。

贺龙的眼睛凝视着窗外，仿佛在注视着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见，轻轻地又说了一句：“只是罗长子一个人么？”薛明答不上来，事情来的太突然了，不由得身上袭来一阵寒气，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初到上海时的轻松心情已经荡然无存。

很沉闷地吃完了晚饭。饭后，李井泉来了。刚刚坐下，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也来了。他们的住处离兴国路1号不远。

薛明很愿意他们来，这会儿，她很想有人来与贺龙说说话，多知道些情况，不然总像闷在鼓里似的。她让秘书去端了一盆苹果出来，自己坐在沙发上，削好一个就递给了王光美。

王光美说：“这苹果真大，是烟台的吧？一个可吃不了，刚刚吃了晚饭，我和少奇分一个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行，分我少一半。”

王光美用水果刀一切两瓣，递了过去：“半壁江山，吃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薛明说：“倒显得我小气了似的，还多着呢，一会儿带点回去。”又削了一个递给李井泉。

李井泉说：“谁跟我分？”

薛明说：“谁也不跟你分，自己消灭！”

李井泉举着苹果找贺龙：“贺老总，咱俩共同解决，怎么样？”贺龙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靠在沙发上，迟迟才说：“吃不下去。”大家都沉闷下来。薛明赶紧打岔说：“井泉，一个苹果算什么，一会儿就消化掉了，能者多劳，能吃多

吃！”

刘少奇不抽烟斗，自己点了一支烟，缓缓地问：“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你知道是开这样的会吗？”

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我还想问你呢。”

李井泉说：“开会前，我们书记处的几个人都在昆明，原先是想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罗瑞卿也要来昆明，后来就打了个电话，说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什么的。可罗瑞卿还没到呢，我和小平同志就被叫到上海来开会了。开什么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一点准备也没有。”

刘少奇吸了一大口烟，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哇！”

不知道的情况不只是这一点，罗瑞卿离开苏州后不久，林彪搬到了上海，随即派叶群去了杭州，因为毛泽东在杭州。叶群去究竟说了罗瑞卿一些什么话，谁也不知道。当晚，毛泽东让汪东兴派专车送叶群回了上海。然后就在上海开的会。

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召开的，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之外，知道真正内容的人很少。另外，参加人员的范围也很怪，既不是政治局的会，也不是书记处的会，更不是军委的会。一些特殊人物，例如无任何职务的叶群却显得异常活跃。

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坐着车到兴国路1号来了。薛明仍旧是拿出大苹果来招待客人。

叶群摆着双手说：“哎呀，苹果我可不敢吃，生冷，对

薛明（贺龙夫人）传

胃不好！”薛明说：“那吃块糖吧，上海的奶糖味道不错的。”

叶群捡了块“大白兔”说：“糖我也不能多吃，对牙齿的腐蚀作用可厉害啦！不过我既然来了，就尝一块。不然你说说我啦！”薛明说：“你喝点热茶吧，这是今年新下来的龙井，一来可以冲冲糖的甜味，二来可以暖暖胃。”

叶群嚼着奶糖问：“有没有炒花生？嚼奶糖吃花生味道很特殊的，你没有尝过？”

薛明歉意地说：“可惜没有花生。”接着问：“孩子们都好吧？”

叶群说：“老虎还好，豆豆这孩子不知怎么搞的，性格上好像有点毛病，跟我话很少。”

薛明说：“你们要求高，管孩子别太紧张了。像我们家那几个，活泼的有时候都显得没大没小了！”

叶群笑了起来，说：“对，赶明儿送老虎和豆豆上你们家去受影响，现在是严肃有余、活泼不够。”

薛明也笑着说：“好的。贺龙就是喜欢小孩子。在延安那会儿，只要听说谁谁谁牺牲了，他就要把孩子要过来，说‘这个算我的’！”

叶群说：“真是，咱们两家应该经常走动走动才对。过去我不敢来，是因为怕贺老总骂我，我摸不透贺老总的脾气！”

薛明说：“他那人，就那脾气。也说过他，没什么效果。”

叶群放低了声音说：“所以我怕啊！咱俩是多年的老关系了，说些啥不算什么。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我也不会

总记着；是不是？以后你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叶群说的“不会总记着”的“那些话”，可见并没有忘。薛明也没有忘。是指在延安时两人发生争吵的那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像是封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现在尘土又被一阵风吹的飞扬起来了。薛明一时不及所料，没想到叶群赤裸裸地把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既大胆又无耻。薛明倒显得一时语塞。叶群的双眼盯着自己，急切地等待着回答。不容思索，一句话脱口而出：

“过去的事你我心里都清楚！”

这句话太不策略，无疑是给了叶群迎头一棒。叶群脸色微微一沉，想发作，知道不是地方，理由也不充足，再加上也有几分心虚。一旦想明白，细长的眉毛挑了一下，脸色转得很快，叶群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

薛明也有点后悔，自己太唐突。一来事情过去已很久了，旧话重提，不必恶狠狠地揭老伤疤，大家都要痛的；二来现在身分也不同以往了，都是元帅夫人，也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了，不必让人家说，一点涵养没有。但一时情急仓促，倒想不出新的话题来改变气氛。

倒是叶群应变自如，几秒钟的工夫，脸上已经有笑容了，很亲切地说：“101 很关心贺老总，总催着我来看你们，回头见着贺老总，记住代我们问好！”

薛明说：“好的，也代我和贺龙问林总好，请他首先把身体养好！”

叶群说：“你看了今年8月1日的《人民日报》了吗？”

薛明知道她是问那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薛明（贺龙夫人）传

点点头：

“看了。你是说那篇文章吧？”

叶群拍了拍手说：“对呀，你知道吧，那是 101 决定用贺老总的名义发表的，问我，我说当然好啦！101 总是说，贺老总在群众当中威望高，特别是这几年，101 身体不好，军队的工作主要是贺老总在抓，很辛苦呀！是有功之臣嘛！”

这番话有讨好的味道。不过做法有点幼稚，像小孩子似的，“这块糖是我给你的”。另一层意思是做了好事，一定要说出来，让你知恩报恩。薛明说：“谈不上辛苦，贺龙那个脾气呀，你要不让他工作，他才要生病呢。”

总是不太投机，叶群有点讪讪地。该说的话都说了，又扯了些天气冷暖之类不着边际的事，叶群也就告辞了。

等贺龙散会回到住处，薛明帮他脱下夹大衣，一摸两边的口袋都是鼓鼓囊囊的，掏出来一看，是好几本会议文件。贺龙忙说：“别动！这些东西我自己保管！”

薛明说：“不交给秘书？”

贺龙说：“不交，你也不能看！”

薛明叹了一口气，把文件依然给他塞进口袋里。贺龙的这个举动有点一反常态，但现在违反常规的事太多了，这次在上海的许多事都显得古怪，让人不能理解。

吃完饭，在院子里散步。台阶上放着好几盆迟开的菊花，浓紫淡白，团团粉黄，开的正到好处。贺龙驻足欣赏，又招呼薛明道：“你过来看看这朵，像不像个紫爪金龙？这也就是在上海，气候温暖湿润，要在北京早就过了季节了。”

薛明不想打断他这几天来难得的好兴致，敷衍道：“开的是好，真是不多见。”

贺龙浅浅地笑了一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脚步扭过脸来看着薛明，问：“怎么搞的嘛？吃饭的时候我就瞧着不对劲。你说说吧！”

薛明知道有事也瞒不过他，只得说：“今天叶群过来了。”于是把叶群的来访经过说了一遍。

贺龙静静地听完，沉吟了很长时间，这才缓缓地说：“叶群很能说，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别人发言她还不断插话。”叶群在会议上针对罗瑞卿的问题说了很多。概括起来，大约。不外乎三条，一是反对林彪；一是反对突出政治，再就是向党伸手。有的事情是查无旁证的，听得到会的人目瞪口呆，吃惊不小，如坠五里雾中，看着叶群很认真地一直在煞有介事地滔滔不绝，谁也不敢说这些事是子虚乌有。叶群说了这样一件事，已故世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临死之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她说，他对不起林总，上了罗瑞卿的当。这个“当”说的是罗瑞卿曾要他向叶群转告四条意见，逼林彪下台。这四条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只是时间问题；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叶群说得很是回事，她听完之后当时就把刘亚楼顶回去了，说罗瑞卿不会这样说。并且安慰刘亚楼好好养病，不要背包袱。养病就是养病，再操心工作上的事不合适，对身体无益，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刘亚楼见她没当回事，于是又亲自找林彪谈。这样才使叶群觉得问题严重了。刘亚楼与罗瑞卿有很好

薛明（贺龙夫人）传

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他说的话分量不同于别人。

还有更严重的事。说罗瑞卿有一次上林彪家去，很嚣张地对林彪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说得林彪当时就出了汗。临走时，在走廊上还把路过的猫踢了一脚，扯大了嗓门说：走开！里屋的林彪听见又出了一身汗。这事有证人，是叶群、林豆豆，还有林彪秘书。

这事显得有点可笑，离奇的有点近似于演义了。但是薛明笑不出来，心里沉甸甸地像是渐渐注满了铅水。罗瑞卿怎么会是这样呢？林彪又怎么会是这样呢？

夜的寒气已经慢慢地侵来，在院子里站立久了，明显地感觉到了上海冬夜的那一份渗入骨髓的湿冷。贺龙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这几天突然发生的许多事，让他一下子不能接受，可又不能不接受，这种痛苦交织着缠绕着他，他努力想要理出个头绪来。他的声音喃喃的，不知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薛明听：“叶群的话靠得住吗？罗长子真的做得出来？”

薛明伸过手去，紧紧地握住了贺龙的大手，她想要分担点这一份沉重，但又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单薄，那样的无能为力。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贺龙的感激之情已经从温暖的手心里有力地传递了过来。没有一句话，两人之间的情感在这沉默的冬夜里延续不断而缠绵地沟通着、交流着。

好一会儿，贺龙才轻轻地说：“往回走吧，外边凉。”

贺龙有更深一层的想法没有说出来，他意识到了叶群的来访也许意味着什么，叶群说，她对以前的事不记恨，如果是真的，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这一次的上海会议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会是批判完了罗瑞卿就算了结了。可是，下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二、迷惘的革命者

转眼到了1966年的夏天。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不堪回首的灾难岁月的开始。

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也是一个鲜血淋漓的年代。

事实上，党内及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尽管这些人后来都被“文化大革命”这根挂满荆棘的大棒子打得头破血流，开始却一直对这场动乱的认识和估计不足。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下了“反党”的调子，制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后，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人们不能料及的迅猛之势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了中国大地。无论在何处人们随时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看到形形色色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一律身着黄军装、手举小红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一夜之间从中国大地如同雨后菌菇似地涌出的各类造反组织，看到这些组织们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们遭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一切都变得不好理解起来。

薛明（贺龙夫人）传

星期六到了，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照例都该回家，每到周末，是全家团聚的日子，也是薛明最累而又最开心的日子。

贺晓明和贺黎明先回到了家，像两只叽叽喳喳的燕子。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个子往上窜得挺快，才一星期没见，好像又增了一截。草绿色的旧军装裹在身上，显得肥大了点。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戴着一个挺耀眼的红袖套，印着仿毛体的“红卫兵”三个黄字。

黎明搂着薛明的脖子，勒得特别紧：“妈妈，今天吃什么？”

薛明扒开她的手，松了口气说：“吃饺子，好不好？”

黎明说：“当然好，多放些肉，特想吃肉饺子！”

买肉是要计划供应的，家里的户口只有贺龙和薛明两个人的计划，所以数量不算多。薛明有点为难地笑着说：“这个月的肉票全买了，就这么多了，多放些蔬菜吧。但是管够！”

黎明说：“你不知道，学校的伙食差劲透了！老是土豆、萝卜、萝卜、土豆！”

晓明说：“那你还不错呢！瞧我们学校，食堂的大师傅组织了一个‘南泥湾’战斗队，都出去刷大标语去了。”

薛明挺担心地问：“那你们吃饭怎么办？本职工作怎么也不做了？那不是全乱套了吗？”

晓明很严肃地说：“妈，你要是在外面这么说，非批判你不可！参加不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少吃两顿饭算什么。”

黎明说：“姐，他们叫‘南泥湾’战斗队是不是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意思？”

晓明说：“对！不培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姐妹俩热烈地聊着。薛明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于是问道：

“那你们上课呢？”

晓明说：“还上什么课呀，知识越多越反动！”

黎明说：“我们学校老师都靠边站了，现在我们每天管他们，学习语录，打扫卫生，让他们改造思想！”

薛明一下子陷入到一种迷惘之中，有一丝深深的忧虑是不能对幼稚无知、充满热情的女儿们说的。没有想到学校里这么乱，整个事情有点颠三倒四了，该做饭的不去做饭，该教书的不能教书，该上课的又不上课。难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这些吗？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那又到底想干些什么呢？

饺子在锅里翻着跟头的时候，儿子贺鹏飞才匆匆赶回来。他的个头已经赶上贺龙了，也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与妹妹们不同的是，他在腰上扎了一根宽宽的军用帆布皮带，倒是显得挺精神的。进门就问：“爸爸呢？”

薛明一边赶紧布置碗筷，因为瞧着孩子们都饿了，一边回答鹏飞：“你爸爸今天开会去了，还没到家。”

黎明说：“哥，这么着急找爸爸干吗？”

贺鹏飞说：“我要告诉他一个让他非常吃惊的事儿！”

“让人吃惊的事儿”指的是“把刘少奇揪出来了”。首先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贴出了一张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针对中央工作组影射后台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

薛明（贺龙夫人）传

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的火药味比较浓，来势凶猛，其实也是有后台的。就在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前前后后，由于校际之间的“交叉感染”，北京各学校反工作组的情绪就像点燃了一座火山似的爆发起来，而且趋势还在蔓延。

随之而来的是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学生组织提出要赶走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对清华大学的运动非常关心，是日，刘少奇便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园看大字报。王光美到清华园，无疑成了一个不同于一般工作人员的工作队成员。她的特殊身份，使人愿意把她看成是党中央的触角，是党中央和清华大学的联系桥梁。王光美表态，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刘少奇支持了这种意见。而蒯大富等人却是毫不退让，针锋相对，两派的斗争是越演越烈，斗争等级也在不断升级，到后来，矛头直指刘少奇。

毛泽东站在了红卫兵一边，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激烈的支持”。

贺鹏飞带回来的便是这样的消息，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来自各地的干部、群众，乃至许多外国人，都看见了一位国家主席所面临的一种难堪的局面。

贺龙震惊了。正吃着饺子，“啪”地便把筷子使劲拍在了桌上，怒道：“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太不妥当了，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子，对外是什么影响？”

贺鹏飞说：“他现在不能算是国家主席了，他派去的工作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贺龙说：“你知道什么？！什么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胡说八道！”

贺鹏飞不怕父亲的盛怒：“这也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定的调子！”

贺龙说：“不管是谁，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不能是谁说打倒就能打倒的！”

贺鹏飞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

贺龙一下子哑然了，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沉默了许久，才喃喃地说：“娃娃家，娃娃家呀！”

饭桌上本来很活跃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固起来，几盆饺子渐渐地冷了，贺晓明与贺黎明很少看到父亲发这样大的火，看到父亲变得这样沉重，坦很少看到哥哥这样的理直气壮。她们怀着膨胀的热情和极度的信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投入的是人类革命史上最光辉耀炼的一页，正在做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正在进行父辈们未曾完成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使他们欣喜若狂，毛泽东的语言是指导一切行动的指南。他们崇敬毛泽东，把毛泽东的思想和言行看成是衡量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论、香花与毒草的标准，这也正是他们的父辈们身体力行所教育给他们的。可是今天，黎明和晓明，包

薛明（贺龙夫人）传

括贺鹏飞，有点迷惘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父亲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像一座山一样地魁梧高大，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他的言谈、思想，他的鲜明的性格，他的斗士般的神，总是像磁石般紧紧吸引着他们。父亲一生对党执着的追求，对革命事业忠心不渝。

爱党、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这是父亲从他们懂事起就用自己的言行栽培在他们那幼小心灵中的绿苗。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按照父母们教育与期望的成长起来，热爱党，热爱祖国，崇拜毛泽东，对父母们也同样充满了敬爱。可是现在，他们仿佛走进了一片雾地，不知所措。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们孤独地与父母们失去联系之后，这才意识到，悲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后悔当年自己的盲目自大，痛悔当年自己与父母幼稚的争吵。但应该这样说，经历了这一切，他们已经开始真正地成熟起来了。

夜已经很深了，薛明倒了一杯水过来，对斜靠在床边上的贺龙说：“别看文件了，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早点休息吧。”

贺龙放下手中的文件，一言不发，拉开被子，重重地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薛明见他睡了，便轻轻地关掉了床头的小灯，蹑手蹑脚地也躺下了。

薛明睡不着，白天的事儿像电影画面般总在眼前闪晃，排遣不开去，她不愿意批评贺龙，她觉得贺龙是对的，学校这么乱，社会这么乱，全国这么乱，难道革命是这样子的吗？难道社会主义建设是这样子的吗？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她了解他，可以说，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人所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

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总是不打折扣坚决贯彻执行。对薛明来说，贺龙既是一位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战士，又是一位具有深厚情感、充满爱心的丈夫，贺龙会错吗？如果不是贺龙错了，那么是谁错了？她也不能批评孩子们。孩子们健康、活泼、充满热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更是奉若神明，而这正是自己和贺龙一贯要求孩子们这样去做的，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他们也没有错。如果孩子们也没有错，那么，错的究竟是谁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像绳索般缠绕着薛明，思来想去，毫无结果，疲惫不堪的神经像是脆弱的玻璃，也许只要轻轻一击，就会粉碎。“啪搭”一声，是贺龙拧开了床前的灯。他坐了起来，点燃了那只大烟斗，白色的烟雾在桔黄色的灯光中冉冉飘荡，两道浓浓的眉毛紧紧地锁着，脸色是那样的沉重、忧虑。

薛明也坐了起来，拿过一件外套给贺龙披上。她没有吱声，她习惯了贺龙的沉思。而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贺龙，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第一个说给妻子听。

她静静地坐着，过了许久，贺龙突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般，歉意地问道：“累了吧？怎么还不睡？”

薛明说：“没什么，我也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想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贺龙的烟斗早已熄灭了，他从床头拎过烟丝袋，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声音沉稳地说：“料所未及呀！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阴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所以才开展了起

薛明（贺龙夫人）传

来的，现在看来……”

贺龙刹住了话头。他想得很多很深，也很远，但觉得似乎还是没有考虑成熟，说出来恐怕对薛明反而是一种压力。自己能够承受的重担，他不想再推卸给薛明。

其实贺龙的意思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了。薛明心头微微一震。“现在看来……”怎么样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因为运动的发展不得不让人怀疑运动的本身和目的。多少年以来，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一直影响着贺龙和薛明，同时也影响着中央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元帅大将们。这就是在许多年来，无论是内战中，还是在长征中，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更使全党钦服毛泽东的领导高明。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又往往证明了他是正确的。所以，从贺龙和薛明开始就已经习惯于认为主席比自己看得远，看得深，习惯于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与决定。可是现在，这个根基似乎发生了动摇，这不仅使薛明感到了担心，更觉得有点可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她无从知道。她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一个人的脆弱与力薄。

冰凉似水的月光缓缓地泻进了窗口，屋子里借着月光能分辨出衣橱、桌子的团团阴影。黑暗中，贺龙又平静地开口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眼下流行的一句名言，那就执行吧……”薛明没有发现，说这话时，被黑暗包裹着的贺龙已是热泪盈眶了。

但是薛明从贺龙那异常的语调中感受到了丈夫的那一份沉重与痛切，她想分担点什么。过了一会儿，轻轻地说：“有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跟总理说说，也许会好一点呢？”

贺龙说：“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尽自己的力量吧。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想了一下又说：“打电话不好，一句半句也说不清，还是你去一趟吧。”

薛明问：“去哪儿？”

贺龙说：“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你去，就说是我的意见，解决学生问题不能草率急躁，王光美在清华，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其他学校，例如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团结不好，怎么进行工作？共产党就是最善于团结各种类别的党派与群众的嘛。并且要说明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与意见，许多老同志，包括李井泉、王任重都是这样看的。”

薛明用心地听着，点点头说：“你放心，我会把意思说清楚的。”周恩来变得更忙碌了，要找他非常不容易。第二天，薛明赶到了人民大会堂，不巧，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解决与引导学生运动方向的问题。

薛明坚决地说：“那我等他。”

在高大敞亮的接待厅里，薛明找了一张沙发稳稳地坐了下来。一路坐车行驶过来，沿街所能见到的，都是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弥漫着“打倒”、“炮轰”的浓厚火药味，无数的高音喇叭播发着“最后通牒”、“紧急动员”的文章，年轻的红卫兵们那幼嫩的嗓音变得粗糙起来，强迫地震荡着人们的耳膜。薛明注视着这纷乱的京城，仿佛觉得这熟悉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

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打断了薛明的思绪，是周恩来来了。她偷眼看了一下腕上的表，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

薛明（贺龙夫人）传

了。

周恩来显得有点疲倦，眼窝周围深深透出一层黑雾来。看见薛明，他急步迎了上去，拉着薛明的手说：“薛明同志，让你久等了。贺龙同志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薛明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她镇静了一下情绪，说：“谢谢总理，贺龙同志很好。今天是他让我来，向您谈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

周恩来摆了摆手，坐了下来。服务员端来了一盘冒着热气的温毛巾，周恩来用热毛巾使劲地搓擦着脸颊，一下子换了好几条毛巾，脸上这才渐渐透出些红润来。周恩来仿佛有点歉意地说：“会议开的时间太长，连着开了好几处会，一个通宵了。”

薛明知道周恩来有用滚烫的毛巾提神的习惯，说：“总理太辛苦了！”

周恩来摇摇头，放下手中的毛巾，说：“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嘛，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太多了。”

薛明于是把反复考虑的几点想法详细地给周恩来说了说。周恩来面色严峻地听着，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地锁在一起。待薛明一口气说完，他点了点头，问道：“这些意见，除了贺龙同志以外，还有些谁？”

薛明如实地说：“是李井泉同志，还有王任重同志和贺龙同志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周恩来刚要说什么，一位秘书匆匆走进来，说：“总理，江青同志到了，请您马上去开会。”

周恩来站起身来，把手伸给了薛明，说：“很抱歉，又要开会了。回去转告贺龙同志，他们的意见我都知道了。另

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的运动，我们都要在运动中加强学习。”

薛明点点头说：“我一定一字不差地转告贺龙同志。”从人民大会堂一回到家，薛明连口气也未喘就直奔书房。她要赶紧把谈话的经过告诉贺龙。

果然，贺龙一直在书房里等，一见到薛明，第一句话就急切地问：“见到了吗？”

这是问见到了周恩来没有。

薛明怕他着急，连忙说：“见到了，见到了，挺顺利的。”贺龙放心地松了口气，可紧跟着又问：“怎么说的？”

薛明有点兴奋，鼻尖上微微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说：“我把你们的意思都说了，总理听得很仔细。本来还想多谈一会，结果他又要去开会了，只得匆匆结束。不过你放心，该说的我都说了。”

贺龙说：“见到了就好。别看都在一个地方住着，要见一面也不容易呢。还说什么了？”

薛明说：“你别慌，让我喘口气、想一想。”

贺龙说：“就办这么件事，你看你紧张的。”

薛明说：“总理最后讲了一句话，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的运动，说我们要在这场运动中加强学习。”

贺龙说：“差不多呢，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不加强学习恐怕是不行的罗！”说着，倒了一杯水递给薛明道：“好，奖励你喝水！”薛明接过杯子，跑了这半天，这会儿真是感到口干舌燥了，一口气喝了半杯，缓了缓气说：“我看这下子好了，总理知道了，一定会据理力争，保护住一批领导干部的。”

薛明（贺龙夫人）传

贺龙又抽起了烟斗，说：“别把问题看的那么简单。有些事现在很难说，有的事总理也很难办啊。总理后面说的那句话，我还要好好想想。”

近来薛明更加关心局势，读报听广播也更加用心仔细。没有人告诉她更多的情况，也许谁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告诉她。她只能够自己用心去看、用心去听，自己用心去分析。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锋芒所向是要打倒党内一小撮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薛明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一小撮”的范围有多大，所能知道的，不是今天这个被揪出来了，就是明天那个被打倒了。一个接一个的熟悉的领导和战友从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薛明同意贺龙的观点，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北京作为全国串联的集散中心，每天要接待大批的人群。空了的校舍首先被开放为接待站，教室的桌椅被高高地堆放在一角，地上铺着篾席，连成长长的通铺，安排和迎接“毛主席的客人”，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了特别的款待。毛泽东以无人可以比拟的胆略与魄力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红卫兵集会游行的队伍确实是气势磅礴，群众确实是被充分发动起来了。

11月3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了红卫兵，和以往几次一样，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更。但是细心的薛明注意到，权威的《人民日报》上还选登了一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的大型照片，而刘、邓二人并没有能够在这张照片上露面。薛明叹了一口气，把报纸拿去给贺龙看。薛明说：“《人民日报》

这么处理版面，不就是意味着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个虚设吗？”

贺龙说：“是。这些日子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唉，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是越上越高！”

薛明有点不解：“这是怎么弄的？这样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吗？”

贺龙说：“是主席已经点了他们两个人的名，所以调子就拔高了。人人都要表态，人人都要发言。”

薛明问：“你说了没有？”

贺龙说：“就是这点叫人最难弄，不说不好，说也违心。说轻了说是‘隔靴搔痒’，说重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嘛！”

薛明有点着急，又问：“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嘛？怎么说的？”贺龙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主席也问我，发言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又问，怎么不讲一讲？我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薛明一下子哑然无语。她了解贺龙在直率坦诚的性格，她感觉到了贺龙的这种非常时刻更显出的那一份可尊与可贵。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又多了一份担心。

薛明说：“你这样说，是不是显得太直露了？”

贺龙说：“是。但我既然说了，就不后悔。你想想嘛，‘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照现在的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点是我最想不明白的了，这些老干部一辈子在为中国革命而工作，有的人几次都差点掉了脑袋，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他们是什么阶级，

薛明（贺龙夫人）传

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贺龙说着，微微地显得有点激动起来。薛明知道贺龙的不解与担忧，但她只能安慰贺龙道：“以后少说点吧，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相信他们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的。”连她自己都觉察出来，自己的语调是那樣的苍白无力。

贺龙并没有“少说点”。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军队院校也乱了起来，军队院校也开始了介入与串联。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们来到了北京，他们对于部队的按兵不动感到惊讶，他们决定反过来要在北京再点上一把火，推动部队的运动发展。他们与地方“造反派”联合起来，采取了“革命行动”，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闹得势态恍惚，各军队机关无法再正常工作下去，严重地影响到了国家基石的稳定。处于这种局面，中央军委的“文革小组”决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有影响的大会，请出几位元帅来做工作，稳定军心。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都出席这次大会并讲了话。贺龙特别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出好样子来。他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中要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并且“应着军装，是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子，要发扬三八作风，要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贺龙提出了“八个不准”，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最主要的是特别强调了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

开完大会回来，贺龙有点兴奋，较长一段时期的阴郁似

乎驱散了一些，“总算说了个痛快！”

薛明也被贺龙难得的好情绪感染，说：“照这样发展下去，事情也许不会太糟糕呢。”

薛明并没有料到，这是贺龙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也是贺龙生前在群众场合上的最后一次讲话。此时此刻的薛明，正在为别人的命运所担忧，她更未料到，一片巨大的阴影已经悄然无声地向贺龙、向她、向孩子们笼罩了过来。

三、短兵相见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地位上上升最快的就是另一位元帅——林彪了。也应该说，在这场运动中的一些人，夹杂着自己个人的想法和目的。无非就是看你能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自己的设想。“林彪此时的想法非常明白，那就是要打倒能与自己抗衡的老干部，当然也包括贺龙在内。”

林彪要打倒贺龙，应该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导，但在背地里却是散布些不满情绪，甚至还骂娘。1938年召开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哼哼叽叽；抗战时期，林彪曾说过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毛泽东的这次谈

薛明（贺龙夫人）传

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弄得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很紧张，心事重重。再加上 1937 年，党中央派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意思是说蒋介石是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的，回部队以后我们可以给中央吹吹风。后来这张潦草的纸条，被贺龙的警卫员在洗衣服时泡坏了。但是这些事却成了林彪挥之不能去的一块心病。

再加上夫人叶群对林彪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

薛明和叶群认识很早，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但由于政治上与生活上的许多观点有着难以言尽的差异，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叶群这个人心计很深，善于动脑，且又善于尽快施之于行动。

虽然是个女人，一颗心却总也不肯安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薛明与叶群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又都是为了寻求抗日真理来到南京。叶群显得很活跃，一个偶然的机，使她当上了由国民党所控制的电台广播员。叶群的确很卖力气，也可以说干得挺有成效，认识了不少国民党人士，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上与一位国民党的教官关系暧昧，交往频繁。在一次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中，叶群得了个第一名，并且积极地向国民党 CC 系办的壁报投稿，与一个叫“战斗”的 CC 派外围组织有来往。为此，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即派薛明正式与叶群谈一次话，提醒叶群，注意方向选择，注意个人表现，注意周围影响。谈话未了，叶群表态说：“要慎重并重新考虑今后要走的路。”后来，两人又一道由江西来到延安。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年轻的薛明感到应该将

自己的一切坦诚地向党组织敞开，使党更加了解和信任自己。她自己这样做了，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又去找叶群。

“叶群，”薛明一跨进叶群住的窑洞，便急切地说：“我今天和党组织谈了话了。”

已经是林彪夫人身分的叶群斜了一眼薛明，问道：“谈什么了？”

薛明说：“主要是谈了谈自己参加革命的经过，参加革命的想法。让组织上多了解了解自己嘛。”

叶群不以为然地说：“薛明，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喜欢什么事都往前出头，什么事都认真得可笑，整风，也不是为了整咱们这种革命青年啊，自己往前凑什么？”

薛明确实很认真：“可不是这么说，襟怀坦白，坦坦荡荡，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嘛。”

叶群说：“咱们以前的事都谈过了，组织上又不是不了解。”

薛明说：“那不一定，以前谈的很粗。比如说你在南京的那些表现，你说了吗？”

叶群心头一紧，慢慢地说：“那有什么，我给组织上说过，生活作风方面，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薛明说：“你看你看，并没有说你生活作风有什么问题嘛，但是你和哪些人接触，参加了国民党的哪些活动，还是应该讲讲嘛。我觉得你有的事情就是总采取吞吞吐吐的态度，既然没有什么，讲清楚了不是更好？”

叶群不理薛明，站起身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要讲你去讲好了，我没有什么要讲的！”

薛明很认真，而且认真得固执，她追上去拉住叶群的衣

薛明（贺龙夫人）传

袖，有点发急地说：“你的问题，应该你自己去讲，我去讲算什么嘛！”其实这时的叶群心里又着急又紧张，她知道自己在南京的那段表现不太光彩，在人人追求进步与光明的延安，这种污点是见不得人的。她害怕，害怕把这些事情抖落出来，她总是想如果能不说就永远也不提它了。可是这个最了解底细的薛明却要让她把最痛的这块伤疤盖子揭开，让脓与血一起流出来。作为叶群来说，这太难了。她讨厌薛明，甚至仇恨薛明。此刻她心里由于害怕而慌张，气得两腿有些发软，见薛明拉住她不放，又正好被门槛绊了一下，一时不知怎么搞的，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两行眼泪随即就流了下来，一时间泪流满面。

薛明反倒愣住了。她想的太简单，她根本不了解叶群的心情。她只是觉得不应该对组织上有任何隐瞒，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却不料叶群拒而不听。见叶群坐在地上哭，薛明很生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嘛，有什么问题不能好好说吗？哭！哭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叶群索性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唠唠叨叨地说：“我有什么嘛！我就是清白的！清白的嘛！你不要瞎说！”

隔壁的勤务人员闻声跑了出来，看见叶群哭闹，便急忙跑过来拉她起来。

叶群身子很重，两只胳膊拼命挥打，嘴里嚷着：“你看见林彪不在延安，你欺负我！你到处说我坏话！你处处跟我过不去！你想害我！”

勤务员挨了叶群好几下子，也拉她不动。薛明气得脸色通红，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于是也跑过来拉叶群，大声

地说：“你这才是瞎说八道！在这儿说不清楚，走！咱们到中央组织部说去！”说着，硬是把叶群拉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把事情说了个清楚。

叶群后来在上海对薛明说的“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的坏话”，就是指这件事。

这件事当时闹的影响很大。等林彪回到延安，叶群关起窑洞的门又哭闹了一场，林彪只是坐在那儿听，也不说什么，等叶群哭得差不多了，便开门叫勤务员打一盆热水来让她洗脸。叶群弄不清楚林彪到底怎么想，见他总也不表态，也只得哭闹一阵便草草收兵了。倒是贺龙直率，有一次遇见林彪，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知道不？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要是我老婆有问题，你老婆同样也可以揭发嘛！”林彪还是一言不发，也不表态。

可是林彪根本就没有忘记这件事，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烙印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刻骨铭心。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林彪率兵进军东北，在东北特地为叶群的这件事平了反。这就是那张众所周知而有点令人发笑的“我们结婚时，叶群是个处女”的证明纸条的由来。

全国解放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使林彪深深地不满，他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视贺龙为自己的权力竞争对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林彪听见有人告诉他，贺龙在延安时期“讲了林彪在长征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中的表现的坏话”。这始终是林彪感到梗噎的心病，他觉得，如果将他与叶群的那些历史材料抖落出来，对他的地位与形象会是非常的不利。毫不犹豫，他把贺龙看成了是他夺取更大权力的障碍。既然，他与贺龙夫妇以往的矛盾最终将成为你死我活的拼搏的动因，那么，就必须先发制人了。所以，也就有了他要打击罗瑞卿的那一幕。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给林彪这类颇有个人野心的人物提供了合适的温度与土壤，使他那颗多年来显得干枯和压抑的野心一下子就膨胀了起来。他在各军兵部培植亲信，网罗黑材料。在海军的李作鹏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到了1966年7月份，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问题。

7月7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

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在会上他仍然直率地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来嘛，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在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是“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等等。

李作鹏、吴法宪等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保护住李、吴，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动。”贺龙却认为“个别的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林彪对此更为不满了。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并且给那位挂着大绵羊尾巴似的下巴的空军司令员敲响了警钟：“你要警惕，他是要夺你的权！”把吴法宪惊出了一身冷汗。

林彪给吴法宪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将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来。同时也给李作鹏打了电话，提醒他“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的人来反我”给李作鹏通风报讯道：“军委很快就要开会解决贺龙的问题了。你就这个问题赶紧写个材料来！”

吴法宪和李作鹏从一开始就想靠近林彪这个非常显赫的人物，他们求之不得地要为林彪做点什么以表示他们的一片“忠肝义胆”。他们对林彪的话心领神会。又各自打着心中的小算盘。琢磨着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整倒贺龙，才能符合林彪的心意。最后，他们不谋而合地都采取了写信诬告的手法。

9月3日，吴法宪把他写给毛泽东的有关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林彪。9月7日，李作鹏也给林彪送去了一份有关贺龙问题的信件。

与此同时，叶群为力挫贺龙而四处奔忙。她多次向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唠叨，要宋治国写信揭发。叶群嘱咐道：“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去写，不要以我指示叫你了解的口气写。”

9月7日至9月24日，宋治国按照叶群口授的材料，根据叶群所要求的那样，写了四封揭发信给林彪。当宋治国拿着写好的揭发信送到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那里时，叶群为

薛明（贺龙夫人）传

了掩人耳目，当着办公室的主任秘书，故作姿态地问：“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如果是，我们就往上送；不是的话，我们就不送了！”宋治国恨不得拍着胸脯说：“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叶群心眼很多，还怕有人怀疑此事与她有关联，又画蛇添足地叫那三位秘书在9月27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以此来证明写贺龙揭发信完全是宋治国的自发行为，与她无关。

这封揭发信里主要有这么几条：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赫冶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里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这份揭发信的内容挺无聊的，语言上使用了不少“听说”、“据说”等等语气不够扎实的词汇。连叶群在读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一下，心说这个宋治国还挺能编的。

但不管怎样，这也算是一发重磅炮弹了。宋治国的信送到了林彪手上。林彪下令，立即印发。势必要造成一个反对贺龙的声势。

但是，林彪等人的想法实施的并没有那样一帆风顺。毛泽东在接到了林彪呈送的吴法宪的诬告信后，于9月5日上午，让秘书打电话，请贺龙同志去一趟。

薛明挺高兴，毛泽东约见贺龙，说明主席对贺龙还是信任的。她用毛刷细心地刷去衣服上的浮尘，一边将衣服给贺龙套上，一边催促着秘书准备车。

贺龙情绪也受到了感染，平时穿戴不大讲究，因为要见毛泽东，他倒也变得挑剔了起来。见薛明拿来的是一套灰色的中山装，便连连摆手道：“不穿这个，不穿这个！”

薛明说：“除了这个就是军装，不穿这个穿哪个？”

贺龙说：“穿军装吧。”

薛明说：“真是，穿不够似的！”

贺龙笑着说：“当然穿不够啦。你没瞧主席每次接见红卫兵也都是穿的军装吗？”

薛明赶紧又去把绿军装找出来，说：“快穿上吧，别迟了。”

贺龙说：“离约定的时间还早哪。放心，迟不了，我这个人时间观念最强。”

薛明帮他系上扣子，又说：“让主席等不好！”

贺龙走了，薛明在家里心神不定的。一会儿就看看表，又觉得时间过得慢，一会儿又觉得时间过的快。过的慢，是因为急等着贺龙回来，急切地想知道他和主席谈话的内容；过的快，又是因为薛明总是在想，现在和主席见上一次不容

薛明（贺龙夫人）传

易了，能多谈一会儿也好哇。于是，她就像推磨似的在院子里转圈子。

临近吃午饭的时候，贺龙回来了。薛明立刻迎上去，第一句话便是：“见到主席了吗？”

贺龙点点头道：“见到了。”

薛明紧跟着又问：“都谈了些什么？”

贺龙摇了摇头，浅浅地叹了口气说：“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进屋再说吧。”

在贺龙的述说中，薛明这才知道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贺龙按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这里是毛泽东休息的住处，也是工作的地方。因为后面盖了个游泳池，便于毛泽东游泳，所以大家习惯地把这里称作为游泳池。

毛泽东把吴法宪的那封信直接递给了贺龙，自己坐在一旁抽着烟，注视着贺龙读信。当贺龙看到信中说，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而贺龙就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时，脸色一沉，心里很不是滋味。

毛泽东的眼光细微敏锐，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贺龙神情的变化。待贺龙读毕，毛泽东重新又点了支烟，沉稳地说：“你不要紧张嘛！也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心里沉甸甸的，想早点解决好这个问题，于是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要不要找吴法宪等人谈一谈。

毛泽东一笑，说：“有什么好谈的”我对你还是了解的，还是过去曾经说过的“三条”，毛泽东伸出三个指头，提高了声音，“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当薛明听到毛泽东对贺龙的定论时，觉得很受鼓舞，也

宽慰了一些，挺高兴的说：“还是主席了解你。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吴法宪他们瞎嚷嚷，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主席不会信他们的。”

贺龙轻轻地摇摇头说：“事情要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也觉得主席对我还是信任的，但是吴法宪的问题，也要处理好才行，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薛明说：“这些人的手法也太那个了，不敢来当面谈，结果告到主席那里去，算个什么嘛！”

贺龙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就是因为他们的材料都不能摆到桌面上来嘛，只能在我背后嘀嘀咕咕！他们不敢见我的面，我可以去找他们嘛！”

过了几天，贺龙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徐叶夫的电话。在电话里，徐叶夫告诉贺龙，是主席的意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有关同志”其实就是指林彪。

贺龙还是很尊重毛泽东的提议的，决定第二天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林彪没有在住处门口等候迎接贺龙。这倒并非是他想摆个架子，而是他确实有病，一种比较复杂的病，病症表现的也很古怪。至于他能够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跟随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与百万群众，据说是用了某种兴奋剂的缘故。

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秘书把贺龙带到一间很宽大的房间里，然后悄然无声地退了出去。这间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地毯上只摆着两张沙发，挂着长而及地的窗帘，遮住了企图射进来的每一缕阳光。昏暗的灯光下，林彪孤独地

薛明（贺龙夫人）传

萎缩在那只巨大的沙发里，有点像个孩子。见到贺龙迈着大步走了进来，这才缓慢地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同时伸出了右手。

林彪说：“欢迎你来。”

贺龙也伸出了手去，握住了林彪那只软弱冰凉的手，感觉到了林彪手心里的一股阴冷的寒气。

贺龙开门见山地说：“林总，是主席的意见，建议咱们俩谈一次，看看你对我有些什么意见没有。”

林彪笑了一下，说话的声音有点尖细，声调很轻。贺龙闪过一个念头，“奇怪林彪的身体怎么这么差呢？”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没有意见，怎么会有那些莫名其妙的信呢？但是一上来如果就承认有意见，也就不像林彪的做法了。林彪不喜欢贺龙那种直接了当的做法，甚至于讨厌贺龙那种直率的表露，往往让人难堪而下不了台，林彪比较喜欢含蓄，喜欢威而不露。但是有一条必须严格把握住，那就是不说则已，一说必定得有份量。

所以贺龙见他否认，并不感到意外，仍然坚持道：“不会吧，林总，总会有一点的吧。”

林彪又轻轻地短促地笑了一下，好像在想。过了好一会，才慢悠悠地说：“要说有吧，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说着，还伸出个小指头来比划了一下。

贺龙点了点头，说：“那也是有嘛，是什么意思呢？”

话到这一步，不得不当面说了。林彪很严肃地说：“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

这个“意见”的分量非常重。意思也非常明确。看到林彪那煞有介事的样子，贺龙不知为什么反倒笑了起来，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这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啊！”

林彪没有吱声。

贺龙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我就支持谁！我一辈子就信这一条！”

林彪说：“嗯。”

其实他心里感到了无比的失望与憎恨。贺龙的回答与他所期望的距离相差甚远。如果说，他原先还有拉拢和争取贺龙靠向他的一丝幻想，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肥皂泡是真正彻底地破灭了。林彪坚定了信心，在与贺龙的较量中，决不能手软。

贺龙也绝没有想到，就在他与林彪谈话的同时，叶群正与几名警卫埋伏在隔壁的房间里。叶群害怕贺龙的脾气，怕出漏子。又企图捉住一个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所以叶群也觉得既松了口气又有点失望。

话不投机，两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则坦然起身告别。

回到家，贺龙把经过告诉了薛明，薛明感到了震惊和愤怒。她震惊的是林彪终于把他的本意赤裸裸地披露出来了，他的本意又是那样的卑鄙，那样的肮脏。肮脏得让薛明愤怒，也是堂堂的一位共和国的元帅，怎么能那样做呢？

薛明说：“咱们没有什么心虚的地方，咱们支持和拥护的是毛主席，不是他林彪。林彪不是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回答的很好，很对。倒要看看他们除了写诬告信以

薛明（贺龙夫人）传

外，还有什么花招！”薛明太善良了，对林彪、叶群等人的阴谋手段估计不足。她总以为，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戎马征战几十年的战友，存在分歧与矛盾是正常的，难道说一个元帅还能对另一个元帅下毒手吗？

叶群等人见诬告信收效甚缓，便加快了步伐，改变了方法，开始积极鼓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主要成员参与整治贺龙的活动了。

四、织网

贺龙与薛明并不知道，此时此刻，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委员也已经把手插进来了，他们与林彪一伙沆瀣一气，为罗织陷害贺龙的罪状煞费苦心。

康生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月兵变”事件，并且把这个莫名其妙的“事件”与贺龙联系起来。

1966年年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在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营房，而北京各大院当时都有一部分师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学校里有不少空着的房屋。卫戍区便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借房，想用来暂住部队，进行民兵训练。

说来也巧，部队借房与“二月提纲”事件的时间相近，在“怀疑一切”的感应之下，北京大学校团委的一名干部在当年的7月，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标题，贴出了这张刺激和兴奋某些人神经的大字报。不过在当时的大字

报上，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只是就部队欲住进学校一事提出质疑。但是大字报的内容却越传越玄，变成了可能是“彭真等企图搞政变的准备”了。

康生以他特殊的敏锐，一下子便把这件事情抓住了。

在7月27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群众大会上，康生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煞有介事地公开宣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彭真等一伙反党分子企图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已经有了周密的计划，计划之一便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变成他们的政变基地。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中央文革根据康生的这个讲话就此定下了“二月兵变”事件的基调。康生觉得不满足在以后又加进了“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并且在北京郊区修建了碉堡”等内容，给本来就骇人听闻的“事件”又渲染上了一层可怖的军事色彩。

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与赤胆忠心的红卫兵小将们不干了！这些煽动人心的鼓惑使他们气愤填膺，振臂欲起。他们的动作很快，立刻，北京各大院校都开始收集“二月兵变”的素材、找不出来则硬凑。以至于把1966年2月，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曾以北京大学为试点到北京郊区搞半工半读、并于3月底把试点经验推向全市这件事，也与“二月兵变”联系了起来。事因彭真曾经就半工半读作过安排落实，“所有的学生都下乡搞半工半读，……帐篷已经安排去做了。”而各大专院校也确有筹集帐篷一事。有的学校领导为了方便下乡检查工作，还将小轿车换成了吉普车。就这样，帐篷，

薛明（贺龙夫人）传

吉普车等等，与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了，成了“策划兵变”的事实根据。于是，纯粹是捕风捉影的“兵变”假说，成了有领导、有基地、有军队、有物质准备的“真实”事件了。

就这样，康生把“二月兵变”与贺龙联系在一起，给贺龙的“罪行”增加了新的内容。尽管贺龙本人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8月2日，当时处境已是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但是，这如同杯水车薪一样，根本镇静不了那些绷得紧如悬丝的大学生们们的神经。

另一位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江青，也就贺龙问题活跃了起来。在12月30日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的会上，江青、姚文元对于即将到来的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江青专门去找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贺鹏飞，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又恨恨地说：“你妈妈也不是个好人！”江青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通过群众运动来给中央施加压力。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林彪的第一步棋终于达到了目的。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由他点头同意，可以就贺龙的问题“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到1966年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了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

薛明又一次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猛烈炮火与汹涌而来的“革命”浪潮。

家被抄了，所存的文件、材料均被抢走；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踩坏了花木，踏平了绿草，马不停蹄地要贺龙“交代问题”；“打倒贺龙”的大字报沿街张贴，由大街小巷一直贴到家里的客厅与走廊；几只高音喇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座宅院，昼夜不停地播放着大字报、罪状及语录歌曲，尖刺噪杂，使人无法得到一刻的安宁。

家，已不像个家了，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温馨。

12月26日，周恩来告诉贺龙，组织上决定让他与薛明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避开造反派，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造反派手眼通天，消息异常灵通，他们又追到了新六所，并且声称，要将贺龙带出去揪斗。

贺龙震怒了。在新六所，他执意要同前来“揪斗”的学生们见面，要与他们“讲道理”，要揭穿几个“捣鬼的人”的阴谋。薛明一边竭力劝阻，一边着急地向周恩来告急。但没有得到及时的回答。贺龙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嘛，这帮娃娃是瞎胡闹。走，咱们也不要东躲西藏的，平日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咱们搬回去，回去和他们讲道理去！”

说着，就往外走。薛明劝阻不住，心急如焚，眼看着贺龙要了车，自己也只得跟上车去。车已经启动了，薛明想了个主意，对贺龙说：“还是要给总理报告一下好。搬出来，是总理的安排，要搬回去，也要跟他说一声才是，不能让总理着急。”

薛明（贺龙夫人）传

贺龙觉得薛明说的有道理，于是点点头说：“那就给总理打个招呼，报告一下吧。”

薛明立即对司机说：“不要直驶反帝路，从中南海拐一下，去一趟周总理家。”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给周恩来打了电话，报告了贺龙夫妇的情况后，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告诉贺龙，总理的安排让他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然而，社会上的剧烈震荡并没有平息。上海“一月风暴”的“全面进攻、全面夺权”派生出来的是整个中国好像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无际海洋之中，颠簸得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控制。中南海里也折腾起来了，也有了两派之分，住在这里的中央领导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安定的绿洲已不复存在……

1967年1月9日，经主席毛泽东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的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碰头会。

但是，军委副主席贺龙的名字被从出席会议名单中轻轻地抹掉了。

林彪说：“贺龙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的是彭德怀一个，贺龙一个。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总路线同我们不同，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大阴谋家！”

林彪说：“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可就打好了！”

林彪说：“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怕轰呢！”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要到天快亮时才能回到家小憩一

会，没有时间与贺龙和薛明谈话。但是，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林彪把贺龙作为打倒对象而在军内宣布后，周恩来如果能把贺龙继续留在中南海，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正式与贺龙谈话。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谈话的时间不长，中心思想有两点。一是林彪反映说贺龙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而且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等军队部门处处伸手。毛主席百年之后，林彪不能放心。关于这一点，林彪以前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露过。林彪很明白地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就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怕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第二点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要求贺龙“好好想二想”。

中南海虽然墙高院深，但依然挡不住墙外马路上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宣传车，“打倒贺龙”的口号声清晰地传来，使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贺龙听着，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想解释，想申辩，但是，都被周恩来止住了。其实，申辩也罢，解释也罢，实际上都是徒劳的。而且，在那种形势之下，缄口不语也许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周恩来担心的也许正是这点，不要再次授人以柄。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

薛明（贺龙夫人）传

找个地方，换个环境，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了，我去接你回来！”站起身来欲送贺龙，又勉励他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此时已是百感交加，伤心已极，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有默默地点了点头，服从周恩来的安排。

为了安全起见，动身的时间安排在了次日凌晨4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贺龙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与薛明。为了防止有人跟踪，特意又让在中途换了车，并不让带工作人员，以便于严格保守秘密。

清冷的冬夜，万籁寂静，几颗寒星疏疏落落地镶嵌在漆黑的夜空。白天刚刚下过一场冬雪，洁白的雪地里反射出莹莹的光来，映出了房屋与树木的团团黑影。中南海的湖面上连一丝涟漪也没有，已经冻成了一面厚而光滑的镜子。喧闹无休的城市好不容易地安静了下来，安静的反倒让人奇怪，让人感到居然不习惯，仿佛在这里面静的深处，盘踞潜伏着更危险可怖的恶魔。薛明扶着贺龙上了车，又扭过脸去再次环顾了一下这黑夜的景致，一切是模模糊糊的轮廓，什么也看不清楚。她不知道会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已经没有权力来支配自己的命运了，她也没有精力来考虑自己能做些什么。此时的薛明，脑子里只留下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想法，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和贺龙在一起。贺龙到哪里，自己也就跟到哪里。保护贺龙、照顾贺龙，这就是自己的责任，也就是现在自己唯一要做的事情。

车行驶得很快，驶过旷静无人的长安街，驶出了复兴门，向北，而后又一直往西驶去。几十分钟以后，车停住

了。杨青成拉开了车门请贺龙与薛明下车。

一股浓重彻骨的寒气包拢过来，薛明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裹紧了大衣。黑夜中，四周黝黝静卧的群山像是一只只隐藏着尖牙利齿的凶猛野兽，随时随地可能要扑将过来！这是哪儿啊？薛明想。但是并没有开口去问。

五、空问行云凝眸处

西山卧佛寺的象鼻子沟。这是薛明后来才知道的。也是贺龙与薛明的新“家”。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荒僻、旷静，无人所至，除了贺龙、薛明以及守卫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

天刚蒙蒙亮，贺龙便按捺不住，说要出去走走。外边很冷，薛明怕冻着贺龙，建议等太阳升高了再出去也不迟。

贺龙说：“不行，我得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从前打仗，每到一处不是都得先看地形吗？”

薛明说：“真是改不掉的老脾气！”只得让贺龙穿上大衣，陪他出来。

山下是不让去的，只能站在院落的门口望一望。清晨的雾霭已经漫天遍野地从山谷里升腾了起来，像一团团轻柔的棉絮悠悠地飘浮了上来。四周安静的像是置身在另一个宇宙之中，完全使人忘记了就在不远的城市中还有一伙充满活力的疯狂的造反群体。几只昏睡的寒鸦被惊醒，扑扑喇喇地抖

薛明（贺龙夫人）传

动着漆黑的翅膀拍落枯枝上的残雪，飞过头顶。除此而外，就剩下贺龙与薛明了。

薛明说：“这儿挺安静的，什么人也不会来。倒是个休息的好所在。”

这几句话原也是为了宽慰贺龙，谁知反而一下子便触动了贺龙的心思。

贺龙叹了口气，说：“你就知道休息、休息！你想想你能休息的了吗？给了你那么多的问题。”

薛明说：“着急、发火，能管什么用？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呀！要是留在城里，还不是除了揪斗还是揪斗，一天安生日子也不能得。还不如在这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好么？”

贺龙摇摇头，扭过身来往回走，嘟囔着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

薛明跟在后边，说：“总理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他能这么安排，让那些造反派找不到咱们，就已经是很费周折了。”

贺龙点点头：“是，一定是。周恩来的处境一定也很困难。唉，咱们就在这里好好呆着吧，等着，总理说过，他秋天会来接咱们回去。”

薛明说：“到那时候，也许你的问题搞清楚了。”

贺龙说：“但愿能如此。说实在的，洪潮的事可以考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有一定的责任。但是除此而外，其他事情可以说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说着说着，压抑不住的气愤又上来了，刚进了屋又要往外走，一头走一

头大声说：“不行，我要回去，找他们说个明白！找他们算帐去！”

薛明急忙把他拉住，指了指院子里的警卫，提醒了一下贺龙，现在是身不由己。然后说：“要搞清楚问题，也不一定非回去不可哇。现在有了时间了，也可以充分地回顾和思考一下自己过去每一时期的工作了嘛。这未必不是件好事。”

在象鼻子沟，空闲的时间显得多了起来。薛明不想让贺龙老闷着一个人想问题，于是经常拉他聊天。说起了过去的事，贺龙便止不住了话题。薛明也就更详细地了解了洪湖肃反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31年10月，贺龙率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根据地转战大江南北将近一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返回了洪湖。他和全军指战员都非常高兴。然而，他们面临的并不是顺利的坦途。

当年初，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向各根据地派出了一批中央代表。当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就是在三月份被派到湘鄂西来的。他到达以后，即组成了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分局。这时的洪湖根据地，在周逸群、段德昌、万涛等一批坚定而有经验的领导人的一致努力下，经过英勇奋战，已经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但是这个夏曦一到，不作任何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地推行起各项“左”的政策，并排斥起创造洪湖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来。

夏曦主持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面对严峻的局势，仍照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红军不停顿地进攻，耗损了红军

薛明（贺龙夫人）传

的实力。同时，还以极大的精力全面开展大规模的错误的“肃反”运动，在红军和根据地所有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中，误杀了大批有经验、忠贞的领导干部，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了外有强敌压境、内部又自我摧残的危殆局面。贺龙一方面要艰难地率军与敌作战，另一方面又要耗费相当的精力为夏曦的错误指挥作纠正。

到了1933年初，原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湘鄂西根据地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了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一月初，夏曦迫于局势，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三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

会议讨论了贺龙提出的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立即停止“肃反”。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固执地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反过来认为洪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原因是因为“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仍然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力争说：“肃反先停一个时期，以后有了反革命再说嘛！”关向应支持贺龙的意见，夏曦就指责他右倾。

讨论不出结果来，贺龙无奈，去找了关向应说：“你当书记吧。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就是谁，行不行？”关向应党性很强，严厉批评了贺龙。贺龙有苦难言。

到了1月下旬，夏曦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又突然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遭到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对。

贺龙说：“解散党，亏你想得出来！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了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解散了党，谁来领导红军？”

段德昌气愤地责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把苏区搞垮了，眼下又要搞垮党，你说你到底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又是在莫斯科人的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会议投有照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夏曦非常恼火，视段德昌等人为眼中钉。因为贺龙在军队的威信高，夏曦不敢轻易动他。但在他武断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时，悍然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长段德昌。贺龙闻讯从前线赶回来，与夏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贺龙怒气冲冲地一进门便问夏曦：“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觉得哭笑不得：“你有什么根据嘛！套上个帽子就抓人？”

夏曦说：“根据？要什么根据！他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根据！这就说明了他想要拖队伍逃跑叛变！”贺龙火了，但还压着性子与夏曦讲道理：“你这样说没有道理嘛！德昌写信来就是向你提建议。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要真的想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他自己带着队伍走不就行了吗？”

夏曦理屈，说不过贺龙，粗着喉咙叫：“他就是有危险，就是有二心，一定要杀！”

薛明（贺龙夫人）传

贺龙拍着桌子说：“不行！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不可以杀！”

夏曦突然安静了下来，扫了一眼盛怒中的贺龙，冷冷地说：“我是书记，我决定了！”

面对夏曦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无话可说，只得服从，但是当时那种痛苦与愤怒的心情是难以言状的。

当时，各根据地如果想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有一条，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可各地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与政策水平对于“肃反”造成的损失程度的轻与重，有着极大的关系。应该说，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是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在湘鄂西与夏曦分开活动时，在贺龙率领的部队中就没有进行“肃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盘铭释放了。

在“肃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在他率部从洪湖突围出来与贺龙会面后，他找着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在活动呢，你得写个申明，否则党不清楚你！”贺龙说：“你也给我写个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现在你杀了这么多的同志，你算是个什么共产党员？你也给我写

个申明书来！”两个人争吵起来，相持不下，结果是关向应闻声急忙跑过来调解，才缓和了僵局。夏曦并不肯罢休，在绕道陕南转往湘鄂西的行军途中，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危急。夏曦不顾大敌当前，又一次和贺龙发生争执，并且命人先抓了贺龙与关向应两人的警卫员，并缴了警卫员的枪。贺龙忍无可忍，拍着自己的手枪质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自己警卫员的枪不下？你要枪，我这儿还有一支，你要不要？”夏曦无言可答。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同时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战斗的人，所以才没有贸然行事。

薛明静静地听着，仿佛也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斗年代。当贺龙谈到夏曦决定杀段德昌，自己拍桌子力争未果的那段经历时，随着贺龙的情绪悲痛不已，薛明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她好不容易才镇静了自己的情绪，问道：“如果你当时与夏曦的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红军领导干部是不是可以不杀呢？”

贺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过了好一会，才缓缓地开口，痛切地破析原因道：“那时，我是一个新党员，只晓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实有过许多次很尖锐的斗争，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了。但最后总是认为按照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因为他是中央派来的。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我们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是异常的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分子打进了苏区和红军内部，我们当然也是相信的。只是到了后来，这个夏曦不停地一批又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着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这时候，我才有了怀疑，觉得不对头，才和夏曦有了分歧，有了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这我倒不怕，难道只他说我是军阀，我就会变成军阀了吗？我心里有数。要紧的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怕自己搞错了。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每次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也争不赢他。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有时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过多次。只是想保大的，却保不下来，只有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结果关向应又很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有些事总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呢？心里真是很苦，苦不堪言哪！”

在这静寂的山间院落中，薛明能够体会到贺龙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痛切的苦涩，那一种寻寻觅觅所求而不能所得的失望与焦虑。贺龙接着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都是些能打仗，有本事的……，结果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真是血的教训啊！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薛明轻轻地握住了贺龙的手，柔声地说：“我觉得你可以把刚才想的这些写出来。现在要想见到主席和总理他们比

较困难，写一份东西转呈上去，汇报汇报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说是对总理谈到的洪湖肃反问题的一个答复吧。”

贺龙想了一下，说：“可以的，这个主意比较好。薛明，赶紧找纸找笔去！我现在就写！”

薛明说：“你身体不好，眼睛也容易疲劳，这样吧，还是你说，我来记，然后我念给你听，再作修改，好不好？”

贺龙点点头，说：“这样也可以，不过就要辛苦你了。”

薛明被贺龙的那一份少见的客气引得苦笑了一下，说：“这也辛苦不到哪里去，闲着不也是闲着吗？”

面对着许多老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挨揪被斗，面对着自己今天的处境，贺龙有了更多更深的思考。他对“左”有了切身的体会，对“洪湖肃反扩大化”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3月份，贺龙写成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送周恩来处请转呈毛泽东。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热得也是“如火如荼”。山上缺水，不知何故，每天只发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是不能用的，只能乘着下雨之际，把水盆、脸盆还有水杯都拿到院子里，屋檐下，接取雨水来用。夏天山里边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薛明总是到门外去看天，一有了要落雨的迹象，看见山那边的乌云翻滚而上，就急急忙忙地去端盆子，紧张得像是要抢占一个山头似的。留下来的水，可以替贺龙擦擦身子，洗洗衣衫，也是需要合理分配使用才行。

这一天午后的雷阵雨来势迅猛，轰轰烈烈一阵子过去，居然把薛明放置的大大小的盆子、杯子都下满了。雨停之启，地上还很湿，薛明就开始进进出出地一盆一盆地往回端。贺龙看见了，也过来帮忙。两人抬着盛满了雨水的一只

薛明（贺龙夫人）传

洗衣盆往回走。真沉啊，薛明说：“放下来吧，我一个人拖！”贺龙说：“洒了多可惜，接一点水容易呢。慢慢抬吧。”可是，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一下子扭伤了腰。当时痛得就站不起来，薛明连忙丢下水盆，跑过来搀扶起贺龙，一步一步地挪回到屋里。

贺龙已是71岁高龄了，再也不似当年横刀跃马的光景了，腰部扭伤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棵大树折断了主干，站立不能，躺卧也不能，只能直直地坐靠在椅子上，稍稍动弹一下，便痛出一身冷汗来。贺龙发脾气，紧紧地皱着眉头说：“这不是成了个废人了吗？快叫医生来！”

医生不知什么原因，总也迟迟不来。薛明急得直搓手，搓得手心阵阵发热。薛明忽然想，就这么着给贺龙做做按摩吧，也许会有作用。

贺龙很配合，让薛明轻轻地按摩。薛明便使劲地紧搓双手，搓得手心热呼呼的，再赶紧放到贺龙的腰部去轻轻搓揉，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搓，像做热敷似的。做了一个多小时，贺龙觉得舒服了些，腰部的疼痛似乎也缓解了些，扭过脸来说：“薛明，你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呢！”薛明已经累得自个儿直不起腰来了，脸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听贺龙这么说，心里倒觉得高兴起来。以后，便是每天两次“热敷”，一连十几天。就这样，贺龙的腰扭伤在薛明的照料下渐渐地恢复了。

贺龙能站立起来活动了。薛明又找了一把剪刀出来，咔嚓咔嚓地在石头上磨了几下。

贺龙挺纳闷的，不解地问：“这打算干嘛呢？”

薛明用手指试了试刀刃，又使劲地在石头上磨着，停下

来，才说：“你猜吧！”

贺龙便猜：“做衣服啊？你又没有布；剪花？你也没那个闲情！”

最后只好摇头，“猜不出来。”

薛明端出一把凳子来，扶着贺龙坐下，找出一件旧衣服来，很像那么回事地抖搂了两下，便给贺龙围上，又操起了那把大剪刀，这才笑眯眯地说：“给你修理修理！”

贺龙也笑了，说：“薛明真行，又能当护士，又能当理发员，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薛明笑嗔道：“怎么没发现，你忘啦，那年在延安，不也是我给你理的发？”

贺龙说：“对！想起来了，那次是刚刚结婚不久呀，人家是理了发准备结婚，我是结了婚才打算理发呢！”

1942年的春天，这是薛明难以忘怀的一个季节。

延安的春天还是很美的，站在高高的塬上，放眼望去，黄土高坡在暖融融的阳光照耀之下，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麦芽儿泛青了，一片喜人的绿色，给原先裸露的黄土坡披上了一件新的绿袍子，路边开满了鲜黄耀眼的小花，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着，几只翘着尾巴的野兔不时地打眼前晃过，一窜便没了踪影。耳边隐隐约约又传来了高亢激奋回肠荡气的秦腔高调，让你也觉得真得吼上几声才痛快呢！

这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薛明找去了。

薛明在1938年到了延安以后，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后来分配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县参议员，后来又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西北局着重培养的妇女干部。陈正人把薛明让进窑洞，很热情地用瓷

薛明（贺龙夫人）传

缸子倒了一杯白开水端过来，放在薛明的面前。

薛明说：“陈部长，你找我呀？”

陈正人笑得怪怪的：“薛明，今年有20几了？”

薛明说：“26，这你是知道的。”

陈正人说：“对对！26，不小了。有没有恋爱对象？”

薛明一听就明白了，原来叫我来是谈这个，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大大方方地说了：“没有”

陈正人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又说：“想不想谈一个？”这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觉得问得实在不妥，这让薛明怎么回答好呢？想？她能这么说吗？不想？又不切合实际。于是，没等薛明回答，陈正人连忙又添上了一句：“薛明，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保证你满意！”

薛明抬起眼来，脸儿红红地看着他。

陈正人用手往门外一指，好像贺龙就在跟前似的，说：“就是贺龙！大名鼎鼎的贺胡子！怎么样？”

薛明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听到贺龙的名字时，还是愣了一下，觉得有点意外，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职务上，差别都比较大。

薛明的脸更红了，站起身来说：“陈部长，我再想想吧！”

陈正人说：“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我介绍的，保你没错。一个是军事领导，一个是妇女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再合适不过了！”送薛明出来，冲着薛明的背影还不由分说地喊了一句：“就这么定啦！”

过了几天，西北局书记高岗陪着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了他们。

高岗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列宁服，腰间紧紧地扎着根宽宽的帆布皮带，不高不矮的身材，显得既苗条又精神，剪得齐耳的短发，乌黑发亮，两只眼睛特别明亮，水盈盈地仿佛会说话。

薛明也在偷偷地打量贺龙。那年贺龙是46岁，高大魁梧的身材，站在屋子当中，像一尊铁塔，纹丝不动，标准而正规的军人姿态。在两道浓黑的眉毛下，一双锐利含笑的眼睛正瞧着自己。薛明连忙移开视线，跑过去端来两杯水，一路走一路洒，满满的一杯水端过来还剩了一半，连自己都为自己的慌乱感到难为情。大家都笑了。高岗说要谈工作，拉着县委书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贺龙与薛明两个人。

薛明更紧张了，手心不住地往外沁汗，脸颊红得像是被霞光染过。

还是贺龙先开口：“我听陈正人部长说过你。”

薛明“嗯”了一声。

贺龙说：“你很能干，工作很不错，很努力。”

薛明找不出话来说，只好又“嗯”了一声。

贺龙接着又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这么说是为了给自己打个掩护，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是想来看看薛明。

贺龙又开始找话聊：“老家是河北吧？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呢。”薛明松弛了一些，嗓音不高，但是很清晰地说：“是河北霸县。”

“噢！”贺龙想了一下，说：“真遗憾，没有去过，以后也许会有机会去的。”

薛明（贺龙夫人）传

这话说得已经是很有内容了，认识了薛明，所以对霸县也有了兴趣，“有了机会”自然就会想去。

薛明脸又红了，说：“那儿很穷的。”

贺龙笑了起来，说：“穷？穷怕什么？不穷，要咱们这些人做什么？延安穷不穷？红军穷不穷？但是咱们自己动手，又搞了个三五九旅，搞了个南泥湾。咱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好些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咱们不都得到了吗？猪鸭鸡兔，咱们都吃了，可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一根鸡毛也没得吃呢！”

贺龙最近一直负责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参与领导了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所以一谈到这个话题，他倒像是政治委员做报告了。一篇又一篇的。

薛明直想笑，但又被贺龙那热烈而认真的态度所感染，不知不觉的就被吸引住了，也聊起了最近的劳动生产问题。

聊了一会，贺龙又问：“你认识叶群吧？她好像也是从天津来的？”

薛明点头说：“认识的，‘七七事变’之后，我们是一起随平津学生到南京请愿的，不过我们是有组织的，叶群是自个儿去的。后来她和我是一起由江西来到延安的。比较熟悉。”

贺龙沉吟了一下，说：“我知道你跟叶群是朋友。不过你知道不知道她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写给她的信拿给别的同学看？”薛明愣了愣，说：“不知道哇，光听说她跟林彪在谈恋爱。”贺龙：“就是嘛，谈恋爱，为什么要把林彪同志的信到处给别人看？你是炫耀呢？还是不同意呢？你俩很

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么办。这么办对林彪同志没有好处，对她自己也不好。”

贺龙态度很诚恳，说完了，两眼期待地望着薛明，等薛明回答。薛明觉得好笑，这个老总，真是直率坦诚的可以，自己是为了忙自己的恋爱而来，却又操心起别人的恋爱来了。不过由此更可见到贺龙那真诚坦荡的心。薛明很受感动，关于年龄与职务上的差距，渐渐地也淡薄了许多，赶紧点点头说：“可以的，这件事我一定去做。”

听了薛明肯定的答复，贺龙很高兴。觉得似乎意犹未尽，可一看表，时间不早了，便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对了，我们那边有个厨师，会做你家乡的天津包子，哪天你来尝尝，看看味道像不像！”说完，也不管薛明怎样回答自顾自就出门找高岗去了。骑在马上慢慢地往回溜达，高岗小声地问他：“怎么样？第一印象还不错吧？”

贺龙满脸都是笑，说：“嗯，还蛮有的谈呢，到底是读过书的人，谈起话来一点也不干巴巴的。”

高岗说：“有的谈才好呢，要过日子嘛，整天两口子在一堆，要是无话可谈，那日子过得就困难啦！跟蒋介石可以没话说，跟老婆可一定得有话说！”

薛明与贺龙的恋爱开始了，用政治干部的话说，就叫做进行得“健康、活泼、迅速”，用军事干部的话来说，叫做“打了一个歼灭战”。到了当年的8月1日，经上级机关批准，两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形式简单但气氛热烈的婚礼。

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喜气洋洋。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西北局的领导人

薛明（贺龙夫人）传

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等都来了，把间不大的窑洞挤得满满当当。炊事员专门杀了一只鸡，以示庆贺，又炒了萝卜、白菜，炖了豆腐，用小盆子端了上来，热气腾腾的摆了一桌，席上喝的是边区自己酿制的米酒，既甜又糯，十分爽口。大家都夸陈正人这个“红娘”当的不错，陈正人一高兴，先喝了个晕晕乎乎。接着又一起来灌新郎官。薛明知道贺龙有胃病，不宜多饮酒，这会儿眼瞅着贺龙招架不住，于是挺身而出，接过众人敬过来的酒杯，一连干了好几杯，给贺龙解了围，可自己却落入了“包围圈”中。大家都笑，说薛明是“舍身救将”。等众人都散去了，贺龙才悄悄地贴着薛明的耳朵说：“不是舍身救将，是舍身救夫！”

没过几天，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的窑洞里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这是薛明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显得有点拘谨，倒是毛泽东先抱起双拳，拱手笑道：“薛明同志，恭喜恭喜呀！”随后，又看了看站在一旁微笑着的贺龙说：“贺龙同志呀，脑袋上负担太重了，不像个新郎官呢！”贺龙不解，毛泽东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用手在头顶上比划了几下子，说：“要理发呢，不然薛明同志看了不满意！”待接见之后，薛明便找来了小剪刀和剃刀，端了把凳子放在院子里，准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贺龙怕警卫人员瞧见了不好意思，又把凳子搬进窑洞里，乖乖地让薛明给他修理了头发。

现在想起这件事来，心里倒也是暖融融的，于是很听地从地坐在凳子上，让薛明用做衣服的大剪刀为他理发和修剪胡子，贺龙特意叮嘱道：“小心点，不许把胡子剪了。要是给剪了，贺胡子就不叫贺胡子了！”

薛明说：“你放心好了，原来是啥样，理完了还是啥样，咱们不能跟个坐监牢的似的，就得精神着才是。”

贺龙说：“对，他们越是想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忙乎完了，薛明又取出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来让贺龙看看效果，贺龙对小镜子照了照，摸摸短茬茬的头发和胡子说：“挺不错，完全可以去参加国宴了！”

日子一天又一天慢悠悠地过着，枯燥且单调，仿佛与世隔绝了一般。白天照顾贺龙的生活，和贺龙聊聊天，也就把时间打发了。可是到了夜晚，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薛明总是难以入睡，一个萦绕心头的问题无时无刻不缠绕着她。那就是孩子们究竟怎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每每想起孩子们，孩子们那活泼可爱的脸庞总是在脑海里晃动，一件件记忆犹新的往事把孩子们拉到了薛明的眼前。

鹏飞可以说是在战争年代的马背上生的，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贺龙可宝贵这个儿子了，一回到家就喜欢高高地举起孩子，用短茬茬的硬胡子去扎鹏飞娇嫩的胖脸蛋，薛明心痛儿子，说贺龙把孩子的脸都扎红了，贺龙总也不服气，举着儿子上下忽悠，说：“咱贺胡子的儿子，哪有那么娇气的？”有时还瞒着薛明悄悄地带着儿子去骑马。薛明知道以后真的发了一次火，那是第一次对贺龙发火。贺龙也知道自己做得太冒险，所以认错认得特别的快、态度特别的好。弄得薛明最终也没能发得起火来。全国解放以后，又从西南地区来到了北京，条件改善了许多，在宽敞明亮的房子住了，有了轿车，有了电影看。孩子们可高兴了，可是没想到，爸爸的光是一点儿也沾不上的。上学下学要自己挤公共汽车，

薛明（贺龙夫人）传

哪怕是刮风下雨，也不许例外。薛明给孩子们规定了好几条，就是不准搞特殊化。有一次，鹏飞带着两个妹妹去看电影，可是没有票。男孩子胆大，跑到电影厅门口对着检票的叔叔说：“我是贺龙的儿子！”结果就轻而易举地被放进去了。没想到这事被贺龙与薛明知道了，爸爸和妈妈总是统一战线，在教育孩子、严格要求孩子的问题上一点也不肯马虎。熊得鹏飞直哭不算，两个妹妹也遭受“牵连”。薛明现在想起这些细节来，不知怎的，好像浮上来了一丝内疚，有点后悔以前对孩子太严厉了。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到底身在何处呢。天冷了的日子里，知不知道要加件衣服？饿了的时候，自己会做饭吗？单独在外面生活，交了些什么样的朋友？在这风浪险恶，危机四伏的运动中，能分清是非左右吗？

月色似水，如泣如诉，薛明合上了双眼。睡梦中，仿佛孩子们蹦蹦跳跳地来到了自己面前，晓明还嚷着，“妈妈，今天做什么好吃的？”薛明笑着说：“还是吃饺子吧，全是肉的！”自己又好像去煮饺子了，可是等端着饺子出来，却连一个孩子也不见了，薛明急了，到处去找，大声地叫着：“鹏飞！黎明！晓明！别躲啦！该吃饺子啦！”可是低头一看，自己两手空空，饺子呢？怎么一个也不见了？”

薛明一下子被惊醒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原来是场梦，两行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身边的贺龙轻轻咳了两声，推了推薛明，说：“做恶梦了吧？我听见你叫孩子们了！”

薛明一直不敢在贺龙面前提及孩子们的事，怕更影响他的情绪。她知道贺龙非常喜欢这几个孩子，只是平时不大肯

流露出来。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当时就很担心。到了西山后与警卫副官杨青成分手时，他紧紧地握住了杨青成的手，嘱咐道：“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杨青成点点头，离开了。可是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

薛明止住了抽泣，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呀？”

话已挑明，贺龙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那一份思子之情。他坐起身来，透过窗户望着那深邃无际的星空，沉沉地说：“真想这几个小鬼头啊！”

过了些日子，杨德中代表周恩来来到象鼻子沟看望贺龙。贺龙提出来，想请总理帮着寻找一下孩子们。

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孩子们的下落。

消息来得是那么的意外，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廖承志夫妇与贺家原来的交往不太多。但在危难时刻，他们仗义收留了黎明。

贺龙捧着这封薄薄的信，激动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连声叫薛明把老花眼镜找出来。薛明高兴地擦去眼角沁出的泪珠，说：“还是我先念给你听吧？”贺龙又赶紧催她：“快，快念！”

黎明在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她们：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

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信不长，可是给薛明与贺龙带来了多么大的欢愉与安慰

薛明（贺龙夫人）传

呀。薛明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贺龙自己接过来，一字一句地看了又看，喃喃地说：“么女哟，我们的么女来信喽。”

对这短短的几十字的信，薛明是读了又读，最后连标点符号都背下来了。可是仍然感到不满足，要是再多点内容就好了，这个小么女，为什么不多写一点点呢？不晓得爸爸妈妈心里有多牵挂吗？每天与贺龙都把信拿出来看，以至于那些薄薄的纸都被磨毛了边，薛明舍不得了，找了张报纸把信包好，对贺龙说：“原件由我保存，你要是想看，我就背给你听好不好？”贺龙点点头说：“我也背得了。不用看了，你让我每天摸摸就行，就像是摸着么女了！”薛明听了，心里一阵凄惨与难过，她把信又拿了出来，小心地递到贺龙手上，轻轻地说：“还是放你那儿吧！”

贺龙说：“我们也给么女写封信吧？”

连行动自由都受到了限制，给孩子们写信，未必能得到孩子们的手中。但是薛明不忍心扫贺龙难得的好兴致，于是说：“好，试试看吧。你说我来写。”

“不！”贺龙坚决地摇摇头，“我这一辈子也没给我自己的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要补过来。你不要打扰我，我要自己写！”

从此以后，在贺龙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非常认真地给孩子们写信，在信的结尾之处，端端正正地写上“爸爸、妈妈”几个字。在这无法投递的信中，贺龙总是勉励孩子们，要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山上的树叶渐渐地由浓绿转为深

黄，又渐渐地枯萎飘落，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秋风，最后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桠了。每到黄昏，在沉沉暮色之中，在半山腰的院落门口，总能依稀见到两个互相搀扶着的人影。

贺龙的脚步越来越迟缓了，瘦弱的身影在秋风中如同一枚枯叶似的摇摆，他站在山坡上，极力向远处眺望，直到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渐渐地在暮色中淹没了踪影，这才转过身来缓缓地走向那间孤寂的小屋。

薛明知道他在等待什么，薛明自己也是满怀着希望地在等待。她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曾经说过的，等到了秋天便来接他们。秋天，应该是个充满了喜悦的丰收季节，可在这少见人迹的山里，秋天却显得如此地荒瘠与凄凉。数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却不知道还要在这儿待到几时。

周恩来没有派人来，可以猜测得出来，党内的斗争更复杂、更激烈了。自己只能尽所有的力量和能力，照顾好贺龙。一想到不管怎样，自己总还能与共同生活了半辈子的丈夫在一起，这也算是给了自己在大不幸之中的一丝安慰吧。

六、无计赴国忧

山外边的世界依然是激浪翻滚，浊流汹涌。在这场以“打倒一切”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与江青狼狽为奸，不择手段地搜集与寻找新的能致人毙命的“武器”。贺龙与薛明哪曾想到，就在他们还怀着一线希望企图回到生活中去的时候，一张新的大网又漫天撒开了，一个新的罪名

薛明（贺龙夫人）传

又成立了。

1967年2月间，林彪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来自武汉市的信。写信人名叫晏章炎，是原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信的内容，是说贺龙在历史上有向蒋介石“乞降”的行为，有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

“乞降”与“叛变投敌”，所指的是1933年底熊贡卿游说贺龙一事。

熊贡卿是国民党的政府参议员，又名熊瑞龄，湖南安乡县人，心眼颇为活络，口才极好，能说会道，读过些书，也算是知古通今，自谓“儒将”，实际比较适当的说，也就是四下游说，替蒋介石作宣传的一名政客。1925年4月间，因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时，湖南省长赵恒惕对他颇不放心，同时另派湖南省议员熊贡卿，作为省府驻澧州镇守官邸的代表，实际起一个监督贺龙的作用，就此而与贺龙相识。当时因交往甚浅，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恶感。

熊贡卿做事较有盘算，他知道贺龙脾气耿直，善恶分明，但因当时红三军遭受内外夹击，处境十分窘迫。似乎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于是怀有一线希望，希望能说动贺龙倒戈反共。也怕一上来会碰上贺龙的硬钉子，一是自己没了面子，在蒋介石处无可交差，二是如果自己出面直接碰了硬壁，下面连个弯都没法拐。不如先找个人去探探口风，蹉蹉子，若是有了一丝松动，自己再出面就比较保险，所以先派了属下一个叫梁素佛的，去找贺龙。梁素佛带来了熊贡卿以“昔年友好”名义写的一封信。信中称他欲前来与贺龙见上一面，一是叙旧，二是愿意帮助贺龙等人解脱困境。

意思是很明白的，贺龙不动声色，先让人带梁素佛前去休息，自己旋即拿着信去找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政委关向应。

关向应仔细地读了信，沉吟片刻后说：“这件事应当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不妨让这个姓熊的来一趟，摸摸这家伙的底，了解一下国民党对我们红军的策反情况。”

贺龙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便连夜赶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夏曦作了汇报，夏曦也同意关向应的建议，并且和贺龙、关向应一起仔细地商量了一下计划，由贺龙写了信给梁素佛带回，同意熊贡卿前来一见。

没过几天，熊贡卿和梁素佛一人乘着一台“滑竿”，带着十几个武装随从，抬着礼物，来到了红三军军部驻地。

当时红三军正从利川公鸡岭向咸丰、宣恩转移。为了便于监视熊贡卿一伙人，指定他们紧随在军部后面行军。晚上宿营时，夏曦、关向应和贺龙即抓紧时间和熊贡卿谈话，借以了解国民党企图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熊贡卿则认为，多谈多接触也有好处，贺龙等人并没有立即给自己碰一个壁，可见还有游说策反的余地。所以他聊起来便滔滔不绝，亢奋不已，谈话中自然透露出大量不该透露的情况。

这样日行夜宿，原定要了解的情况基本也了解清楚了。贺龙考虑到熊贡卿跟随军部走了半个多月，也看到和听到了不少的事情，绝对不能再放他回去，提议把他杀掉。中央分局同意了贺龙的意见。1934年1月底，在龙山茨岩塘，集合了部队进行公审。

迎着凛冽的山风，贺龙站在一块大岩石上对着大家讲

薛明（贺龙夫人）传

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奸细！我们绝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蒋介石只能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同样也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休想欺骗得了我们红军！”贺龙高亢激奋的讲话在山间回荡，激励鼓舞着红军战士们。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熊贡卿与梁素佛被当场处决。

在1934年3月17日《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中，专门呈报了此事。这份报告现在仍在中央档案馆保存。但是林彪则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将晏章炎的诬陷信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结果，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间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经毛泽东同意，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又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方面搜集、复制当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将此当作贺龙的罪证，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以及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待贺龙的

“罪行”。然后将这些逼供出来的、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了剪辑与拼凑，拍照或指供重抄，制造了伪证。就这样，一顶贺龙“投敌叛变”的黑帽子制造出来了。

薛明首先感觉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

中国人感情的善恶变化，最容易流露在餐桌上，历来如此。在象鼻子沟，本来就非常一般化的伙食，现在就更差了。

贺龙自1950年开始患有轻度的糖尿病，平时因为注意饮食和加强药物控制，所以基本上对工作、生活妨碍不大。可是到了西山之后，生活条件渐渐地越来越差，由于疾病的关系，贺龙总是感到饥饿。薛明常常为此事发愁。每顿用来打饭盛菜的是两只扁扁圆圆的饭盒，饭只给浅浅的一层，菜经常是盐水煮萝卜，或者炖白菜，再不就是些一嚼起来便筋筋拉拉的老豆角，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给吃饱。夫妻两人又开始谦让起来，谁也不肯轻易下箸。薛明忍住心酸，用筷子在小饭盒里划了个分界线，对贺龙说：“那一半归你，各扫门前雪，务必要完成任务！”说着，自己先夹了一小块萝卜。看见薛明吃，贺龙这才肯伸筷子。于是趁着贺龙闷头吃饭不注意的时候，薛明又悄悄地把自己的那一份多划拉过去一点，尽量让贺龙多吃一些。

薛明想，长此以久总不是个办法，不行，还得另想主意。天气转暖了之后，山上山下的路边长满了许多叫不出名的野草野菜，薛明心里一喜，心想这里面有的一定可以吃！于是经常在山边上溜达，采集一些翠绿的植物，拿回去给贺龙看。有一回她看见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草，满心欢喜，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来，笑嘻嘻地进门便叫贺龙：“快来瞧

薛明（贺龙夫人）传

瞧，今天找到一样好东西，晚上可以烫豆角给你吃了！”贺龙拿起来仔细地看了看，说：“你白费劲了，这玩艺儿不能吃的！”薛明只得兜起那一堆“豆角”倒了出去，自嘲地说：“空欢喜了一场，无效劳动！”贺龙心疼她，说：“怪累的，别去采了！”薛明说：“没事的，权当散步。”于是，仍然不甘心地出去找，找到一种能吃的，便采集回来，用开水烫一烫，无盐无油的给贺龙下饭。贺龙很高兴，每每又用筷子夹给薛明，说：“今天又加餐了，你尝尝，挺不错的。那会儿我们在湘鄂西边区的时候，没得吃，红军可困难了，就是到处找这些个野菜吃，不也熬过来了？”薛明说：“就是，这些野菜真个是弓直在帮红军的忙呢，现在也还在帮。你多吃一点吧，咱们迟早也能熬过来的。”

薛明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这种饥饿不堪的生活使她越来越消瘦了，常常一站起来便感到头发晕，脚底下飘浮不定，好像踏在云层间一样。她一直在提醒自己：绝不能倒下！饿一点，苦一点，都算不得什么，一定得撑住，要是自己先倒下了，贺龙怎么办？她最为担心的，就是贺龙，最关心的，也就是贺龙。这一信念一直支撑着她。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薛明除了带了些换洗衣服和日常用物以外，唯一没有忘掉的，就是贺龙每日必服的药物。到了西山以后，也就是靠薛明带出来的这点药物，一直维持着贺龙的血压与尿糖的正常。薛明就像是半个大夫，每天每顿，不管再累再乏，也要把药按从前医生叮嘱的服法配好，看着贺龙吃下去。所以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有了薛明的细心照顾，贺龙的病情一直也比较稳定。但是后来情况便有了变化。

首先是来了一个“专案组”。于是，原来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护的贺龙与薛明，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而实行监护。

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转化成了几乎完全是敌我矛盾的关系。首先在生活上，就表现得如同对待阶下囚一样了。

专案组借口防止有人要揪斗贺龙，给屋子里装上了严密的窗帘，不许再拉开，屋子里便透不进一丝亮光来，只能整天亮着一只瓦数很低的小灯泡，昏暗无光，看得不得书，看得不得报，似乎要把人闷煞。又不知为什么，连借口也不说了，就把床上的被褥、枕头都收走了。薛明只好在每天睡觉前，将自己脱下的外衣卷一卷给贺龙当枕头，而自己只能睡在光秃秃的木板床上，枕着手臂入睡，手臂被枕得麻木酸痛，夜里常常要醒好多次，人被折腾得更显瘦弱了。原来代管贺龙医疗的医生不见了，换了一个经过六次“政审”，才被选中的“医生”。这个“医生”其实原来是个神经科的护士，并不懂如何治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来了之后，说要检查药品是否变质，强行收走了薛明从家里好不容易带出来的全部自备药品。接着，又在医疗上进行控制，减少药品和调换重要药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药也得不到保证了。

薛明不放心这个“医生”送来的药，常常不是弄脏了，就是连胶囊也挤破了，里边也不知都装了些什么粉末。薛明很怕会出差错，也担心这个“蒙古大夫”在药品上搞名堂。所以每顿拿来的药，薛明都要仔细地先数一遍，再辨认一下药品的种类与剂量，防止贺龙误服错服。那个“医生”住在山下，也懒得自己来送药，就让一个战士顺便给捎过来。

薛明（贺龙夫人）传

过了几天，药里忽然多了一片叫不上名的药片来，被薛明发现了。那个“医生”好不容易来了，薛明很生气，把药拿给他看，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个“医生”喃喃了半天，说是“送错了”。薛明责问他：“能把药都送错了，你还算个医生吗？”谁知那个“医生”并不在乎这一点，说：“这有什么！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贺龙忍不住了，用手杖敲着地说：“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你这个医生是干什么的！”也不等他回答，便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高声说：“滚！你给我滚！”

那个“医生”见贺龙真的发脾气了，心里也直发毛，没敢多说什么，赶紧就走了。

薛明望着他的背影说：“居然派了这么一个蠢人来！只会打小报告！”

贺龙说：“成天也没人说话，和他吵吵也痛快，出出气也好！根本不用怕他，他的任务就是来监视我们，你骂他，他也只好听着，然后就去打小报告嘛。怕什么，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薛明说：“是。不过咱们也要往开想，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没什么意思。”

贺龙点点头，说：“只当是一段小插曲吧。唉，当初真不该到这里来，全国那么多地方，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呢？连个人也见不到！”

一天夜里，他们刚刚睡着，就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薛明欠起身来问：“有什么事吗？”

门外的人说：“暖气坏了，给你们挪个地方，搬到山下

去！”薛明看了看已经躺下了的贺龙，犹豫地说：“明天再搬行不行？”

门外的人非常坚决：“不行，让你搬你就搬！”

薛明搀扶着贺龙起来，望了望那几个年轻得还是满脸稚气的战士，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连夜搬到山下去了。这样，贺龙和薛明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在走廊里走动，势必会要经过那个“医生”的房间。薛明明白了，这又是为了更利于监视他们的行动，心里觉得有点可笑，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婆子，弄得他们似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了。

贺龙环顾着这间不大的屋子，用手杖东敲敲西敲敲，挺幽默地说：“哼哼，说不定这屋里还专门为我们装了个窃听器呢！”薛明说：“真说不定呢，找咱们的罪证找不出来，就采取偷听的办法嘛。”

贺龙带了点笑意说：“有了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原先要骂他们也听不见，这样才好，不听也得听了！你说是不是？”

薛明叹了口气，说：“毛主席要是也能听听就好了！”

贺龙带着几分天真的想法说：“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能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可是现在要让毛主席能听到我们说的话，该是多么的难呀！”

1968年下半年，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像贺龙这样的老同志是上届党代会的代表，这一次是否能允许他参加呢？林彪与江青等人自然是不情愿的，他们对大会参加人员有着严密的控制，大会必须按照他们要求的那样去进行。不让贺龙再次

薛明（贺龙夫人）传

参加会议，比较合适的理由，就是“需要更进一步地审查贺龙的问题”。贺龙是有“问题”的人，自然是不能参加这样神圣、庄重的党的大会。

于是，便需要专案组加紧工作，先弄出一批有分量的材料来。专案组的人员急于见成效，觉得贺龙只是一只被困的死老虎，不如搞一搞面对面的斗争，效果来得快。到底还是中央文革那拨人显得老辣，他们知根知底，晓得贺龙虽然年纪大了，可是脾气也大，怕斗不过。再说，真要面对面的刀枪相见，专案组的人员未必是贺龙的对手，贺龙有贺龙的理由嘛。所以要求专案组改为“背靠背”，就是由专案组提问题，然后让贺龙来回答。这样也可以避免贺龙乱说，给自己评功摆好。

到了9月18日，来了几个人，也没多说，搁下“问题”就走了。“问题”是写在纸上的，大致有这么几个：“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是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还有“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白日撞见鬼了！”

薛明见他突然间怒火中烧，吃了一惊，连忙捡起那几张纸来看。看了之后更是吃惊不小，这几样事情要是都成立，那贺龙的问题就严重了，从历史上就一贯反党反革命，与党离心离德，与蒋介石拉拉扯扯。薛明看着，气得连手都微微地颤抖起来，她也想发火，也想大声申述一下自己内心的委

屈，宣泄一下自己被长久压抑的情绪。这些人的卑劣手法令她愤恨，令她吃惊，令她感到困惑不解。

她看着贺龙。贺龙一反常态，缄口不语，拼命地吸烟，那间不大的屋子里，到处都弥漫着呛人的烟味。贺龙沉默无语地在烟雾中坐着，不停地在一张纸上划拉着，满篇只有“冤枉”两个字。那个“冤”字他写得特别的用力，最后的一挑，写得细长而愤怒，好像要把天戳个窟窿似的。

薛明极力地控制着自己，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不能轻易发火，首先是发火解决不了问题，这帮人想尽办法来整你，就是想激怒你，想刺激你，想让你失态，让你不能够冷静地对待他们的提问。再就是发火于自己身体不利，贺龙的身体状况比较差，上半年曾有一次突然不能说话，诊断是脑缺血失语症。如果他再因气愤而病倒，那又有谁能把这些历史上的问题说清楚呢？薛明意识到，自己马上要做的，就是化解贺龙内心的忧郁。

她立起身来，走过去轻轻推开掩着的窗扉，一股风吹了进来，顿时将屋里的烟雾撕扯开了一道口子，呼吸起来，空气也显得清新了许多。然后走到贺龙的身后，轻柔而有力地扶着贺龙的肩膀，另一只手却伸了过去，拿开了贺龙那从不离口的烟卷。

贺龙扭过脸来，薛明瞧着，暗暗又吃了一惊。自己最熟悉的那张面容被痛苦与愤怒折磨得几乎变了形。

贺龙怒道：“干什么？他们处处与我作对，不让我痛快！你也要和我唱对台戏？把烟拿过来！”

生气时的话是听不得的，薛明不去计较贺龙的态度，却俯下身去，轻轻地靠着贺龙的面颊，贴着贺龙的耳朵，低声

薛明（贺龙夫人）传

但语调十分坚定地说：“我相信你！”

贺龙终于从肺腑之间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来，低沉地说：“唉，你相信有什么用？”

薛明紧紧地拥着贺龙那瘦削的双肩，说：“不光我一个人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呢。记得那句老话不？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我信这个，所以相信你！我是知道的，你没有错。但是现在中央和毛主席不一定完全能知道。咱们应该让他们也知道。问题提出来了，咱们就实事求是地答复他。总比以前不理不睬好像没咱们这个人存在似的好吧，不等于是给了咱们一个申述的机会吗？他们能说，咱们也能说呀，为什么只能伸出手去挨板子呢？”

贺龙微闭双目，苍白的脸上涌起一团血色，但随即又消失了，他哑着嗓子说：“这就叫做杀人不见血呀！”

薛明说：“是，他们就是想这样干的。他们巴不得咱们垮掉，巴不得咱们软弱可欺，巴不得咱们向他们低头认输嘛！”

贺龙的拳头攥得紧紧的，狠狠地砸在那几张“问题”纸上：“栽赃，完全是栽赃！说我乞降，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有这样的乞降吗？27年、29年、33年的事，统统是假造的！”

薛明说：“你从来就没有服过软，也从来没有服过输，况且咱们还是对的呢！咱们好好想想。也跟从前打仗似的，看看怎么样对付这帮家伙！要他们还咱们一个清白！”

薛明的话显然是鼓舞了贺龙，也震动了贺龙。贺龙看着薛明，仿佛第一次才认识她似的，妻子那日渐瘦弱的身躯里

包含着怎样一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勃动不息的心脏里蕴酿着怎样一种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恨的鲜明情感。在薛明的安慰与鼓励下，贺龙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贺龙又捡起那几页提满“问题”的纸，扫了一眼，平静地问薛明：“那你说现在怎么搞好？”

薛明扭脸想了一会，说：“有两种办法，一个就是不理他们，任凭他们乱叫乱咬，也可以说是以静制动吧。”

贺龙沉吟了片刻，摇摇头说：“不好！你是晓得我的脾气的，怎么能容忍这帮子家伙这样任意地诬蔑、栽赃我？白的说成黑的？”薛明点点头说：“我晓得的。所以另一个办法，就是也拿起笔来，反击这帮家伙！”

贺龙说：“这后一个办法行。写一份回顾吧，不夸大、不虚掩，实事求是地说明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湘鄂西‘肃反’运动，还有怎样枪毙熊贡卿的这几件事，咱们自己也是作个回顾吧，留给后人，说不定这些材料或许中央能看到呢。”

薛明立即铺好纸、备好笔，端端正正地坐来说：“还是老办法，你说，我来记！”

由贺龙口述，薛明记录的一份详细的历史回顾，很快就整理出来了。专案组拿走这份材料后，很快又送到了康生处。康生不满意，在材料上批示道：“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以后又批评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搞摘要就是要使用编辑的手法，编辑手法就有个引导与意向的问题。这是康生整人的妙棋高招。

薛明（贺龙夫人）传

后来贺龙写的材料，专案组便不再原样不动地上送了，而是根据需要作了摘要，对摘要过的材料，康生又批示道：“贺龙自传，空洞无物，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贺龙完全被封锁了起来。

1968年10月13日，召开了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1969年4月，召开了党的“九大”。这次大会会有一个最最特殊的动作，这就是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的总纲里。这倒真正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了。同时，由于毛泽东的那句话，贺龙很自然地就被剔出了这次大会。

贺龙站在毛泽东与林彪的一张挂图前注视良久，以至薛明都感到奇怪了，便走到贺龙身边，轻轻地问道：“看什么呢？不是天天看到的吗？”

贺龙并没有将目光移开，他指着林彪那张病怏怏的脸说：“我在想，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的问题了。”

薛明含着眼泪转过身去，她不想让贺龙看到自己在流泪。“革命几十年了，今天才明白自己还不能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吧？”

贺龙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那只胳膊慢慢地在照片前划过，垂落下来，再也无力抬起。他站在那里，许久久，突然那双眼睛又有道光闪亮了一下，薛明非常清晰地听见他说：“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贺龙一直期盼着毛泽东能为他说一句话。毛泽东在若干年后，终于说了：“我看贺龙摘错了，我要负责呢。”

不过这是在贺龙去世后的第五个年头上说的。也就是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上说的。

薛明终手听见了这句话。可是这句话来的似乎已经迟了许久。

七、关河梦断

转眼已经是1969年的初夏了，是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的开始。贺龙与薛明孤独地在西山象鼻子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也已经有两年多了。

山野乡间，应该说景致是别有一番韵味。此时，晚霞已褪，暮色渐浓，仿佛给延绵起伏的山恋罩上了一层墨色的帷幕，倒显得茫茫苍苍，深沉莫测。略带些凉意的山风，不时掀起阵阵林涛声，粗犷浑厚，更显出山林间的寂静与荒凉。

薛明没有心思来欣赏夏夜静谧的景致。此刻，她披了件薄薄的外衣，静静地坐在贺龙的床前，双眉紧锁，显得心事重重。

白天，贺龙在屋子里平白无故地又摔倒了。薛明赶紧过去扶他起来，问他怎么了。贺龙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告诉她，自己也弄不清楚，好像是身不由己吧，只是感觉到两条腿沉重得像是灌满了铅水，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仿佛已经不是自个儿的腿了。

薛明（贺龙夫人）传

薛明蹲下身去，只见贺龙的膝盖上，胳膊肘上都是在地面上擦破的伤痕，血迹中掺杂着许多细小的沙土，还有好几处的瘀血斑，这是前几次摔伤时留下的。薛明用白开水轻轻地洗过伤口，然后涂上了一点好不容易要来的龙胆紫药水。在短短的十来天当中，贺龙已经这样莫名其妙地连着摔倒了七次。

贺龙患高血压与糖尿病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很早之前医生专家诊断，认为病情是轻的，只要用药物控制和注意饮食就能够保持病情的稳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况且，原先贺龙的体质还是比较强健的，性格也是很豪放乐观的。

但是，自从住到了西山，对他的折磨和打击太大了。仿佛是一尊高大的铜像，被来自外部的酸雨与锈斑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肌体，终于有一天，它将轰然倒下。

这样连续的摔倒，对于贺龙来说，无疑是病情起了严重变化的一个征兆。从这时候开始，如果能制定一个周密详尽的治疗计划，给予必要的药物补充，饮食上给予一定的照顾，生活上能给予一个方便卫生的环境，贺龙的病也不至于会那么早那么快就发展到最后一步。

贺龙静静地躺在木板床上，并没有睡着，饿得实在是难受极了，胃里面仿佛全被掏空了似的，火辣辣地疼痛。虚弱得连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无力地搭在薄薄的被单外边。薛明轻轻地握住了那只熟悉的大手，默默地坐在旁边，心里七上八下的，一点主意也拿不出来。白天，她去找过那个“蒙古大夫”，把贺龙摔倒的情况讲了讲。“蒙古大夫”说：“年龄大的人摔个跟头是常有的事，你为什么不好好看他？”跟这种人简直就没法再说，薛明只好快快

地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守护着贺龙。

薛明不知道：“蒙古大夫”之所以敢这样肆无忌惮的莫不关心，是因为他也是严格地遵照上级指示行事。上级的指示要求他“维持现有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这话说得既明白又透彻，给点药吃就行，不必太尽心。反正是治不好的病，更不必费尽心思去制定什么治疗方案了。所以，这个“蒙古大夫”不仅不给予必要的照顾与治疗，同时还收走了薛明千方百计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些药物，由他控制发放，这样又中断和减少了贺龙过去一直在服用的降压灵和 D860 等必备药物的用量。也不检查血压，更不检查血糖、尿糖。薛明想自己给贺龙做一做糖尿试验，可连唯一的一点试剂也被“蒙古大夫”收走了。薛明真是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在 1968 年的 3 月间，贺龙曾经病倒过，当时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头痛得像要胀裂开来。好不容易被送进医院，但是写在病历上的姓名，却是“王玉”。接诊的医生立场是很鲜明坚定的，在病历上不单是写了几句简单的症状，又写了一通“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还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时下流行的语录，诊断的结果是“诈病”，最后什么措施也没有，只有一句，“请政治军医主宰”。住进病房后，医生的冷淡，护士的呵斥，都使贺龙难以忍受。他觉得，住这种医院，简直像过鬼门关似的，没有病都要被整出病来。没住几天，就又被送回象鼻子沟了。他倒觉得，在薛明身边安逸多了。把住院的经过遭遇讲给薛明听，薛明心痛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她怀着一线希望，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了贺龙在西山的情况，问能不能给

薛明（贺龙夫人）传

些药或是改善一下生活条件。贺龙打消了她的希望与企求，对她说：“看来周总理也是无能为力了，否则不会把咱们放在这儿不管的。如果信落到了别人的手里，那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呢？我们会向他们求情吗？说到底，不就是没得药吃，身体不好吗？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说是这样说，可是贺龙的身体真是一天天地垮了下来。

忽然，薛明觉得自己握着的那只大手动弹了一下，用力拉了拉她。她连忙俯下身子去，轻轻地问道：“好点了没有？”

贺龙嘴唇动了动，声音太微弱，薛明听不清楚。

于是她侧过脸去，把耳朵贴近贺龙，又问了一句：“想说什么呢？”

这次听清了，贺龙用了力气，说了“我饿”两个字。

糖尿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总感到饥饿。不要说是像贺龙这样，每顿连一定的食品数量都不能保证了。知道他饿，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手头上哪怕是有一块能解解馋的糖块也好啊，尽管糖尿病患者是不让多食糖的，但现在已顾不了那许多了。薛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忍受着饥饿不堪的熬煎。

薛明端过一小杯水来，小心地喂了他几口。一点吃的也没有，只能喝水。以白水来充填那如同荒漠的肠胃。饮水后的结果，是更迅速地加快了肠胃空洞的蠕动，更感到饿不能当。可是现在，薛明能供给贺龙的，只有这杯水了。

慢慢地喝完水，贺龙觉得好一点了。他睁开了眼睛，问：“几点了？”

薛明轻轻用毛巾替他揩去唇边的一丝水迹。那条毛巾也

是从家里带出来的，两人合用至今，已经不像是条毛巾，磨损得只剩下四个边了。薛明看了看表告诉他，已是夜里 10 点。

贺龙又问：“今天几号？”

在西山虽然几乎是与世隔绝，但断断续续地可以看到一份报纸，可以收听中央台的广播，这也算是与外界的唯一的信息来源。或许林彪等人认为，中央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不用对贺龙封锁，应该让他受到“教育”与“洗礼”。有了报纸和广播，所以每天的日子倒是知道的。

薛明告诉他，今天是 5 月 4 日。

贺龙点点头，说：“噢，是青年节呢。”

薛明也想起来了，果真是“五四”青年节。

贺龙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握紧薛明的手说：“还记得那年在延安过‘五四’青年节吗？”

薛明知道，贺龙说的是两人认识后不久过的第一个“五四”青年节……

延安的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经常举行一些文艺联欢、庆祝活动什么的。贺龙与薛明虽然已经开始恋爱了，但平时因为工作关系，接触的机会也不是太多。贺龙很喜欢与薛明在一起，因为每每使他感觉到薛明营造出来的氛围是既轻松又愉快，难以忘怀。只是这样的机会总是太少。所以一旦机关里有了活动，贺龙就立刻派人去通知薛明，让她赶紧过来。

这天，机关搞联欢活动，到的人很多，尤其是年轻的人多，笑声、歌声融成一片，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贺龙与薛明一人端了个小木板凳坐在边上，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地上

薛明（贺龙夫人）传

去唱歌，或者朗诵，也觉得有意思得很，随着大伙笑个不停。

贺龙突然碰了碰薛明，含着那只左右不离身的大烟斗轻轻地说：“当点神！恐怕逃不过去了！”

薛明正笑得前仰后合，因为表演的人把歌唱得找不着原来的调门了，可还在台上坚持着不肯下来。所以一下子没听贺龙的话：

“什么？”

贺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说：“下面大概要轮到咱们了，你瞧那个主持人，拿眼睛满场子找人呢，现在盯住咱们这边了！”

薛明顺势看过去，果然，主持节目的是鲁艺的几个年轻人，正笑眯眯地往这边瞅呢。他们最感兴趣的事，便是叫首长出节目。以往参加这样的场合多了，贺龙也有自己的保留节目，便是唱一曲“大生产”，不管唱得好不好吧，最后的高腔总能用足力气吼上去，往往也能博个满堂彩。今天因为薛明在边上坐着，贺龙忽然觉得别扭了起来，十分不自在，脑子一转，又悄悄地说：“形势严重，你得帮我一个忙！”

薛明笑着说：“帮什么忙呀？又怎么帮呢？”

贺龙说：“不难，你帮我上去唱个歌就行！”

薛明很喜欢唱歌，学歌学的快，唱得也不错，不能算是专业水平，但也是情真意切，字正腔圆。

但是薛明却不肯帮贺龙上去唱歌，她有她相当充足的理由：“人家点名是要首长唱，我算哪一出子？自个儿跑上去露脸？不要让人家笑话死才怪呢！”

贺龙拿下烟斗，笑得怪怪的：“这有什么，名正言顺的

嘛，你算贺龙家属还不行吗？”

薛明羞得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好在那个简陋的小礼堂里只在台前点了两盏白炽炽的美孚灯，别人并不能看清楚她脸上的变化。贺龙还不甘心，紧盯着问：“怎么样？”

薛明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被逼无奈，贺龙只得上去唱了一首，大概是因为有点特殊的原因，紧张得过分，这首歌创下了有史以来跑腔跑调最厉害的纪录。在掌声和笑声中贺龙满头大汗地跑下来了，连连摇头，给薛明解释说：“好久没练了，太忙太忙！”

薛明笑眯眯地，秀气的脸上像绽开了一朵花，说：“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去唱了！”

贺龙好不容易在小板凳上坐停当了，问：“你晓得为什么？”

薛明一字一顿地说：“因为你唱得真是不好！”

贺龙身子一歪，差点没从小板凳上摔下来。

联欢会散场后，天已经很黑了，贺龙送薛明回县委住处。弯弯的月亮像一片柳叶，又好似一把镰刀，跟随着他们的脚印一步一摇。近处，延河的流水波光粼粼，低吟着一首不知名的曲子，欢快地从他们身边流过。薛明捡起一个小石子，使劲地扔进河里，“叮咚”一声，仿佛给河水的歌唱又新添了一个音符。

薛明说：“我给你唱个歌吧？刚学的。”

贺龙说：“刚才叫你唱，你不唱，这会儿没观众了，唱了谁听？”薛明不理他，自顾自地唱了起来，声音不高，但随着微风甜甜地送过来，不但清晰可辨，更有一番温馨在里边。

薛明（贺龙夫人）传

快走到县委住处的门口了，薛明不让贺龙再送了。临分手时，薛明说：“唱了给谁听？你说给谁听啊？”说完，头也不回就赶紧进去了。惹得贺龙回来时溜达了一路，想了一路。

进城之后搬到了东交民巷，孩子们也都长大了，院子里总是充满了孩子们活泼天真的歌声与笑声。有一次，孩子们拍着手在唱歌，一首联着一首，把会唱的歌全搜索出来唱了，气氛真是热烈极了，把正在看书的贺龙都吸引住了。

贺龙走到院子里，浓浓的眉宇间藏着深深的笑意，站在屋檐下静心聆听。

贺晓明看见他了，欢跳着跑过来，问：“爸爸，爸爸，你也来唱吧。”

贺龙弯下腰去抱起她，微笑地用手指头使劲地按着她的小鼻子，说：“爸爸唱不好，还是让你妈妈唱吧。”

贺鹏飞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非常新奇：“真的？妈妈会唱歌啊？”

贺龙很认真地说：“不但会唱歌，她在延安时唱的陕北民歌，真是没得说呢！”

孩子们“哇”地一下全跑过去围住了薛明，抱胳膊的抱胳膊，抱腿的抱腿，把薛明撕扯得东倒西歪，非要叫“妈妈也来一个！”薛明又兴奋又难为情，嗔怪贺龙多嘴。贺龙笑着说：“我也是好久好久不曾听见了，你就唱一个吧！”

薛明被纠缠不过，只得唱了一首歌。贺龙得意洋洋地用手打着拍子，夸道：“听听，这才是我们延安的调调呢！”

往事如烟，淘去多少岁月。唯有这件事，在薛明和贺龙

的记忆里留下了难忘温馨的一笔。

想起往事，如同是昨天才有过的一般，薛明仍是激动不已，憔悴的脸上也浮起了二丝温暖的微笑。她仍然握着贺龙的手，眼睛越过窗户，越过黑夜，越过高山，向更远更远的地方望去，嘴里开始轻轻地哼起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民歌调子。

一座山来九层岭，
一条河来九道弯；
我在岭上唱一声，
满河歌声九弯传。
一座山来九层岭，
一条河来九道弯；
红军哥哥唱一声，
天下要过太平年！

歌声在夜空里回荡着，虽然没有那份激昂和嘹亮，但是深深地震撼着薛明自己与贺龙，仿佛又回到了延安的战斗岁月中。

唱完了这一首，薛明见贺龙似乎还是意犹未尽，于是又轻声询问道：“我再唱一个好不好”

贺龙深深地被歌声所打动，深深地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听见薛明的话，点了点头，此时，似乎唯有薛明的歌声方能排忧。薛明略想了一下，便低声地唱起来另一首贺龙十分熟悉的歌

“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是贺龙的家乡，贺龙的许多亲人在洪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薛明也非常熟悉洪

薛明（贺龙夫人）传

湖，因为带着对贺龙深厚的爱，所以视洪湖为第二故乡。唱着唱着，仿佛眼前出现了一片晶亮的湖水，那是烟波浩渺的洪湖，湖水在阳光下，抖动着银色的盔甲在荡漾，无边无际。

唱着唱着，薛明好像听见了一种和声。她犹豫了一下，以为自日听错了，停顿了一下又接着唱下去，可是分明有人在和。薛明用心去听，听清楚了，是窗外的哨兵跟着她的歌声在轻声而又清晰地唱。贺龙也听见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

薛明也走到窗前，看见了那张年轻稚气的脸。薛明感动不已，小声地问道：“同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呀？”

哨兵回答的声音小极了：“是湖北……阳……”

薛明没有听清楚，意欲再问。那位年轻的哨兵歉意地点了头，转身走开了，肩背上的刺刀在月光下发出了一道逼人的寒光。贺龙却听清了，大约是由于激动，猛地咳了起来，薛明连忙跑回去，扶他起来，又喂了他两口水。贺龙止住了咳，一把抓住了薛明的手，说：“沔阳，一定是沔阳，他的老家在沔阳！”停了下，点点头说：“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呢。”

薛明见他太激动了，连忙扶他重新躺下。贺龙的双眼闪着亮光，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就在那里呀，蒋介石出十万光洋买我这颗人头。我说，我哪值那么多呢？十万光洋，到底也没能把我的脑袋买去！”

薛明说：“怪我，唱这个歌，让你想的太多了。不想听了，好吗？早点休息吧。”

贺龙微微合了下眼睛，随即又睁开了，说：“不知怎么

搞的，睡不着，脑子里乱哄哄的，总有支‘洪湖水’在响呢。”

薛明知道他太兴奋了，重病在身的人，这样子躁动并不好。可是能使人安眠入睡的药物让那个“医生”全收走了。薛明只得像哄孩子似地哄道：“静下心来，慢慢就能睡着的。我也困了，还是睡吧。”

可是今晚的贺龙，显得特别固执，夜已很深了，他却毫无倦意，头脑清醒得如同白天一样。听了薛明的话，他摇摇头，缓缓地说：

“我还有话要对你说呢，明天忘了就说不上了。”

听他这样说，薛明心里冷丁地一哆嗦，觉得这话说得不好，但又不好明说，只得重新坐下，替他掖了掖被单，说：“日子长着呢，明天哪能就忘了呢。我听着呢，别着急，慢慢说。”

贺龙显得安静了下来，一字一句地说：“恐怕要作最坏的打算呢，要有思想准备，他们完全有可能把我们分开。”

薛明倒真是没有思想准备，一听这话就有点急了：“怎么能分开！我不能跟你分开，你这个样子，没有人照顾怎么行！”

贺龙说：“是。可是他们不管你这套，他们就是想往死里整我们嘛！”

薛明感到心里沉重而又疲惫不堪，这两年多的生活，她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有贺龙在。贺龙不倒，她便不能倒！她支撑着自己，忍受着一切，但从来也没想过要和贺龙分开。她也相信自己在贺龙生活中的重要位置，也是因为自己，照顾和鼓励贺龙一直

薛明（贺龙夫人）传

坚持到现在。应该说，这就叫相依为命吧。

薛明强忍着欲将夺眶而出的泪水，声音有些哽咽了：“我不能和你分开，不管怎样处置咱们，不管到哪里，我都不能和你分开。”贺龙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你呀，想问题还是那么天真简单！你没看党内出了奸臣了吗？这个卑鄙的家伙，不准我革命嘛！”说着，贺龙又猛咳了起来。薛明急忙用拳头轻轻地擂打着他的背。过了一会，贺龙喘了口气，接着又说：“那家伙的那个老婆，也不是个好东西，过去在延安你揭发了她，她能甘心？能饶得了你？他们就是借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来报复咱们了嘛！”

薛明一听就明白了，知道贺龙指的是林彪与叶群。她点点头，同意贺龙的想法，同时又说：“可能就是因为是在延安整风时的那件事，她一直不忘，是我这个问题连累了你。”

贺龙又淡淡地一笑，摇摇头说：“你这样想就错了。不是由于你的事，他们才要打倒我。而是因为我挡了他们的路，妨碍了他们的篡党夺权，他们才要打倒我的。说起来，反而是我连累了你！”

八、大树悲风鸣

薛明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滴血的日子。

1969年6月8日。

西山象鼻子沟的囚禁处。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听完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广播里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仍然是千篇一律地歌颂大好形

势，并且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薛明找到了针线来补衬衣。这件贺龙的衬衣冬天穿了夏天再穿，一年四季都是它。袖口与领口都破得不像样了。薛明想，再补一补吧，补一补还能坚持着穿一个夏天。

贺龙听完了广播，为了节约电池，很快就关掉了那只打家里带出来的收音机，这只收音机也是伴随着他们两年多了，在孤寂无助的日子里，给了他们一线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消息。

薛明并没有看出异样来，她看见贺龙好端端地坐在那里，于是低下头，穿针引线，开始缝补衬衣。

只是听见贺龙突然说了一句：“我有点想吐！”话音未落，贺龙就止不住地呕吐起来。先吐的是早上刚吃的一点点早饭，接着再吐下去就是胃液了，最后差不多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吐得他上气不接下气，面色潮红，身子也支撑不住了，只得软软地靠在床板上。薛明吓坏了。一个劲地问：“感觉怎么样了？感觉好点了没有？”

贺龙无力地摇摇头，一扭脸又要吐。

薛明意识到，这可能是出现了从前保健医生曾经给自己介绍过的糖尿病酸中毒的症状。她赶紧扶着贺龙躺下，用湿毛巾给他擦了擦嘴，连声安慰着贺龙：“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马上去找医生！”

薛明奔出去，去敲那个“蒙古大夫”的门。那个“蒙古大夫”却不在屋子里。哨兵说，他一早就出去了。

薛明急得五内俱焚，六神无主，一会儿跑进来照顾贺龙，给贺龙拿毛巾、递水，一会儿又跑到门口去张望，盼着那个“蒙古大夫”赶紧回来。一直折腾到近中午，那个

薛明（贺龙夫人）传

“蒙古大夫”才不紧不慢地回来。薛明一见他的身影，立刻奔了过去，着急地说：“赶紧去看看吧，贺龙同志病得厉害，一直在吐，止也止不住！”

“蒙古大夫”走进屋，看了看卧在床上的贺龙，没有吱声。

薛明问：“你看会不会是糖尿病引起的酸中毒呢？”

“蒙古大夫”说：“不像。再观察观察吧，现在不好说。”说完，便走了出去。

薛明又赶紧过来安慰贺龙说：“医生说不要紧的，需要再观察观察，你忍着点。”

贺龙点点头，一边喘气一边说：“就是这吐，忍也忍不住。”话音未落，又翻肠倒胃地吐了起来，吐到后来，只能伏在床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了。

薛明急得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看贺龙仍在吐，她实在忍不住了，又跑出去敲那个“蒙古大夫”的门，请他过来再看看。

“蒙古大夫”找了个听诊器，在贺龙前胸后背听了一阵，然后摘下耳塞，问薛明：“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怎么有点像食物中毒？”

薛明说：“不会吧，吃的东西都是你们拿来的。要说是食物中毒，那我怎么没什么感觉呢？恐怕还是糖尿病引起的吧。”

“蒙古大夫”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糖尿病怎么会这种样子，再瞧瞧吧！”

薛明急得一把拉住他，说：“别再瞧了，先让他不吐就行，光这么吐，是个好人也吃不消哇！”

“蒙古大夫”说：“那就先打一针止吐针吧！”

好不容易给贺龙打了一针，可是并没有止住呕吐。这时已是下午3时了。住地负责监护贺龙和薛明的工作人员也进来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又出去了。

薛明替贺龙擦去额上沁出的冷汗，喂了他两口水，又问他，感觉是不是好点了？

贺龙无力地伏在床边上，用手顶着胃部，声音非常微弱地告诉薛明，上腹部疼得难以忍受，那种感觉，仿佛有七八只手在撕拉牵扯着肠胃，又仿佛有人在胃里灌满了酒精，随即又点燃了火，整个腹部火辣辣地在翻江倒海。

薛明想，是不是胃里太空洞了？吃点东西也许会好。于是赶紧又去找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给贺龙做一碗汤？

过了一会儿，汤倒是做来了。薛明用筷子一挑，干干净净的汤水里只翻上来几块老黄瓜皮。她忍住眼泪，小心翼翼地把汤端到贺龙床前，轻声问道：“能吃一点吗？吃一点也许肚子里好受点，否则太空了。”

贺龙听着薛明的话，努力地想坐起来。薛明赶紧把汤碗端到他的嘴边，可谁知贺龙一看见那酸酸的老黄瓜皮，一下子又诱发得吐了起来。这最后的一碗汤连一点儿也没吃成。

薛明急了，心想，这么拖下去根本不是回事。于是，她果断地又去敲“蒙古大夫”的门。

薛明说：“这样下去不行，你们得想想办法了！人要出危险的！”

“蒙古大夫”看到薛明的态度强硬，心里也有点发怵。拿了个血压计过来，给贺龙测血压。水银汞柱一直往下滑，直到标着七十毫米汞柱和五十毫米汞柱处才微弱地跳了一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下。贺龙的血压在下降。“蒙古大夫”有点慌了，跑去找住地的工作人员叽叽咕咕商量了一会儿，这才决定向他们的上级报告。

向上级报告是下午5时，又整整等了四个小时，上级派来的两个医生终于到了。

两个医生简单地看了看，说：“先作个化验吧。查个尿常规。”薛明想，查尿常规干吗？连自己这个门外汉都知道，当务之急，应该先查检一下血糖与尿糖才对。贺龙反应出来的糖尿病酸中毒症状，已经是相当明显了。处理这种疾病，首先应该是纠正酸中毒啊。

两个医生把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了。薛明又感到奇怪，为什么要送到药品检验所去，而不先看看尿中各种项目的指标呢？

医生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药物中毒，排除贺龙有畏罪自杀的可能，所以，尿样必须做药品检验。

薛明气坏了，这帮人，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会生出那么多古里古怪的怀疑念头来。那么长久、那么困苦的日子贺龙和自己都熬过来了，她真想大声地告诉那几个穿着白大褂面无表情的人：你以为想死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以为谁都像你们一样地畏惧困境与高压吗？

两个医生不理睬薛明，自顾自地和那个“蒙古大夫”“研究”病情。他们终于决定给贺龙输液，因为病人两眼深陷，手臂上的血管已经没有了弹性，皮肤更加显得皱巴巴的，重度脱水的症状已经相当明显了。

外来的医生问：“你这儿都有些什么可以输的？”

“蒙古大夫”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有葡萄糖和

生理盐水。”外来的医生对视了一下，说：“那行吧，先输上两千毫升，给他补点液体。”

薛明开始怀疑了，瞧贺龙的症状，糖尿病酸中毒看来是无疑的了，如果真是酸中毒，为什么不给他用上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呢？为什么要给他输这种高渗葡萄糖呢？给糖尿病酸中毒的病人输入这样的高渗糖，不是雪上加霜，火中添炭吗？

看着致命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注入到贺龙的血管里，薛明又怀疑又担心。她终于忍不住了，把自己的问题提了出来。

外来的医生说：“现在一是检验报告还没有回来，并不能确诊他就是糖尿病引起的酸中毒。二是你没见病人吐的挺凶吗？所以首先第一步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纠正脱水。万一脱水，问题也是很严重的，谁能负责？你能负责？”

薛明说：“你们是医生，医疗上的事，当然是你们负责，怎么能叫我负责呢？”

外来医生说：“还是啊！所以治疗上的事，你不要多插嘴了！要服从治疗。”

9日零时5分。

检验报告出来了，尿中酸的含量剧增，酸中毒已经确诊无疑了。

可是直到这时，他们也不拔除那致命的液体，仍然维持原来错误的治疗措施。

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显得非常急促起来，每分钟已经达到了40次。那种酸中毒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烂苹果味随着呼吸已经弥散在整个屋子里了。

外来的医生也有点沉不住气了。事情是明摆着的，病人

薛明（贺龙夫人）传

的病情是很危急了。他们怕负责任，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怕自己交代不了。于是，在零点40分过后，才打了个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医生们跑到隔壁商量着打电话去了。薛明这才能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着贺龙的手。

贺龙心里很明白，他从那温柔体贴的动作中立刻感觉到了是薛明在身边，紧闭着的眼睛吃力地睁开了，果然又见到那张熟悉亲切的脸容。于是贺龙咧了下嘴角，企图给薛明一个微笑，让她不要太担心。

薛明见他神志很清醒，稍稍有点放心。她俯下身子，安慰贺龙说：“不要紧的，他们又找人去了，专科医生来了就好了。”贺龙嘴角动了一下，薛明见他似乎是想说什么，急忙更靠近了他，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贺龙声音很低，但是很清晰地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的眼泪差点就要掉下来了，她定了定神，说：“别瞎想，他们不敢！”

贺龙又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跟他们斗！”

薛明忍住泪点点头，说：“是，所以一定要活好！把病治好！”说了这几句话，贺龙已经感到十分疲乏了，似乎耗尽了全身仅有的一点气力，他合上眼，沉默地躺着，仿佛在积蓄宝贵的体力，为了完成自己“要活着跟他们斗”的诺言。

早晨5时30分。

来了一辆救护车。从车上陆陆续续下来的，是贺龙专案组的人员和301医院的几位医生、护士。

听完原先在的几个医生简单的讲了下情况后，照例又给病人作了一遍检查，检查心脏功能与肺功能，测血压，给腹

部做了触诊，量体温，数脉搏与呼吸。把已经衰弱万分的贺龙又折腾了一遍。做完检查后，几个医生与专案组的人员又到隔壁去商量的。

专案组的人员先听医生们介绍了检查结果，然后问：“那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医生们说：“得送 301 医院去，病人的情况糟透了，这儿的治疗与护理条件都不行，出了问题，我们不能负责。”

专案组的人员思寻了一下，同意说：“那好，先给医院打个电话吧。看看有没有病床接。”

7 时零 5 分。

301 总医院终于来了电话，答复说：“可以送来。”

专案组的人员又走进了贺龙与薛明住的屋子，阴着脸说：“决定了，准备送你去医院。车就在外边。”随即，医护人员也跟了进来，收拾东西，准备立刻就走。

贺龙一下子睁大了双眼，很清楚地说：“我不去，我也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专案组的人有点不耐烦了，抬高了声音说：“不去？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告诉你，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非去不可的！”一辈子都习惯于服从组织决定的贺龙与薛明，又一次服从了这个“组织的决定”。

担架抬过来了。贺龙欠起身来，用目光找到了薛明，问道“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很自然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说完之后，她用征询的目光期待地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们，看见的却是一张张毫无表情木然的脸。

等了几秒钟，谁也不表态，等于不同意薛明去。薛明也

薛明（贺龙夫人）传

是受到监护的人，自己是不能作出决定擅自行动的。没有办法，为了安慰贺龙，她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屋子里等你。”说着，轻轻地握住了贺龙那瘦骨嶙峋的手，小心地掖进被单里，又叮嘱了一句“好了就可以回来了，别着急。”

担架把贺龙抬走了。薛明一个人坐在那间显得格外冷静的屋子里，等待着消息。

8时55分。

解放军301总医院14病室。

贺龙被抬到了一张空病床上。床前的住院卡上写着仍是“王玉”，这是专案组的人员给起的名字。

薛明与贺龙都不知道，在贺龙住院如何进行治疗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背景的。

林彪手下负责总后工作的亲信邱会作知道贺龙病重的消息后，明确地给医院有关负责人作了指示，“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这话说得是再明白也不过了。倾向鲜明，指示明确，就是要拖拖拉拉，就是漫不经心地来办。

所以贺龙虽然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却是什么治疗也没有。

10时25分。

开始了一般性的治疗，主要还是放在观察病情上。

10时55分。

贺龙的血压降至七十毫米汞柱和四十毫米汞柱，仍然还在下降。

11时30分。

负责贺龙入院治疗的临床主治医生提出病人病情很重，要求组织一次专家会诊，以便确定一个抢救方案。

请示了院领导。那位医院负责人正准备回家吃饭，接到电话后说：“那就叫内科专家来一下吧。”

主治医生建议说，是不是同时请一下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最有经验的代谢科专家参加？”

那位医院负责人说：“我看就不必了吧。不用去那么多人。”主治医生又问，几时开始会诊？

那位医院负责人看了下手腕上的表，说：“这会儿已经下班了，就放在下午上班以后吧。”

人命关天，应是争分夺秒。但是，宝贵的两个小时就这样白白流逝了。

13 时 30 分。

会诊终于开始了。可是奇怪的是专家们并没有见到病人。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几张化验报告和 X 光片，另外，就是根据经治医生汇报的病情“背靠背”地让专家们讨论。这样，作出了一个不能说是周密的会诊结果。

15 时零 4 分。

贺龙的心脏渐渐停止了跳动。他安静地躺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好像睡着了一般。

薛明不知道医院里所发生的一切。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坐着，放心不下的就是贺龙，因为这次发病的症状比哪一次都来得强烈迅猛。但是她又安慰自己，不要紧的，在这里治疗条件差，到了总医院，怎么着也比这山沟里强呀！贺龙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像往日那样生龙活虎地走回到自己身边来的。

薛明（贺龙夫人）传

快到中午了，外边的人在叫：“薛明，吃饭！”

薛明一点也吃不下去，没有胃口。但是她强撑着自已，贺龙还等着自己去照顾呢，如果自己的身体也垮了下来，那贺龙怎么办？回来了有谁会照顾他呢？想到这儿，她拾起了筷子，拨动了那一粒粒硬如细砂的米饭，一口一口，几乎是囫圇咽下。

吃着吃着，忽然眼皮突突地跳了起来，使劲揉了揉几下，可是手一拿开，眼皮又猛地跳了起来。一时间跳得薛明心惊不已，更加忐忑不安。

她不迷信，平时更不信一些胡乱的说法。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她忽然觉得这是个不大好的兆头。

这样一想，连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了。住处的工作人员看见饭盒里剩下了饭，叽咕道：“这么浪费！”薛明没有理他们，仍然静静地坐着，像一尊塑像。

快傍晚的时候，门口开来了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挂的是北京卫戍区的牌子。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个子不高的参谋，先找了住处的工作人员，谈了一会，然后一起走到薛明这边来。

“薛明，通知你去一趟医院！”

去医院？薛明一下子站了起来，开口就问：“贺龙同志怎么样了？”

住处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表情，从他们脸上也看不出凶善吉恶来，淡淡地说：“不知道。就是让你去医院核实个材料。”

既然连他们也不知道，可见不会出什么乱子，贺龙一定还在医院里检查治疗。薛明这样想着，为自己宽心。但一转

念，又提心吊胆起来，因为使她疑惑的是，有什么材料需要到医院里去核实呢？一路上就这样正过来想、反过去想，想的头都痛了，也没想出个名堂来，只得叹了口气，又想：算了，不去瞎猜瞎想了，到了医院见到贺龙就知道了。

刚进医院的门，下了车，迎面碰上的竟是贺捷生、贺鹏飞和贺晓明。因为太意外了，所以薛明一下子并没有反应过来。倒是儿子女儿们叫着“妈妈”跑了过来。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薛明又百思不得其解，太阳穴痛得更厉害了，仿佛有数把尖锯在不停顿地刺打。

残阳如血，斜斜地照在一排排病房的山墙上，一片一片，映得通红。薛明又有点糊涂了，看不清楚，那一片片的是鲜血吗？怎么会涂得那么高？

被人引导着走进了病房。贺鹏飞与贺晓明一边一个，几乎是架着薛明。薛明的胳膊有点痛了，她想挣脱一下儿子与女儿有力的搀扶，她相信自己能走。却听见有人在耳边不停地说：“妈妈，你要坚强些！妈妈，你要挺住！”

她看见的是病房四壁刷得白得刺眼的墙，那白色的病床，白色

的桌椅，白色的工作服，白色的裙子，那白色的床单，以及床单下那

张熟悉又苍白的脸。

薛明觉得自己的脑筋不够用了，觉得自己大约真的是糊涂了。她被动地被人搀进了病房，又不由自主地被搀扶了出来。她觉得又奇怪又纳闷，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呢？一点也弄不明白。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被白色床单严罩着

薛明（贺龙夫人）传

的那原先高大魁梧的身躯，这才仿佛怕人知晓似的轻轻地问身边的儿子：“那人是谁？是你爸爸吗？”

九、 凄风苦雨

过了好久好久，薛明都不能接受这一现实，贺龙真的不在自己的身边了。

回到那间冷清的小屋，和衣倒在木板床上，似乎还能感觉到贺龙刚刚离去留下的温热。夜里梦中惊醒，耳边再也不闻那熟悉而搅人的鼾声，反而觉得已是很不习惯，一种失落无奈的感觉显得分外惆怅。

薛明形单影只，木讷讷地推着时间。叫她吃饭她就去拿碗，叫她休息她就去睡觉，每天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住地的工作人员看了害怕，担心薛明如果出了事，自己也同样不好交代。于是决定给她换个环境，离开与贺龙共同度过最后岁月的象鼻子沟，让她忘却那场恶梦。

薛明非常服从地跟着走了，搬到了另一陌生的地方，仍然有人看着她，仍然不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一天，她在窗前孤独地站立了许久，猛地抬头，看见远处是一幅挺熟悉的景致，那是颐和园的万寿山，这才猜测，自己住的地方离颐和园不远，也算是在北京郊区吧。

专案组的人依然跟着，见薛明似乎恢复些了，立刻又来找她谈话。还是那几个熟面孔，一个胖一些，一个瘦一些，贺龙在的时候就老是来，现在是锲而不舍，又跟着薛明来了。薛明淡淡地坐着。也不搭理他们。

胖一点的先开口：“薛明，怎么样？最近好一些了吧？”
薛明懒得说话。

胖子又说：“你看，组织上还是挺关心你的，这个新地方环境不错呀！”

薛明还是沉默，似乎根本没听见。

胖子也不急，自顾自地说：“最近有什么想法没有？可以谈一谈嘛。”

薛明动也不动，也没表情。

那个瘦子有点耐不住了，抬高了声音说：“薛明，问你话呢，你听见了没有？”

薛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嚷什么嚷，又没有聋！”

瘦子：“你这是什么态度？”

薛明又回到了原状，依然静静地坐着。

瘦子说：“不要以为贺龙死了，事情就了结了，问题没那么简单。他不在了，还有你呢！不要采取与人民、与组织对抗的态度！”胖子说瘦子：“不要急嘛，她年龄大了，让她好好想想。”转过脸来对薛明说：“有的问题慢慢想想，给你时间，该向组织上交代的还是要交代的嘛。”

薛明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胖子：“你让我交代什么呢？”

胖子眼含得意地看了瘦子一下，又更加耐心地对薛明说：“就是贺龙的那些问题呀，例如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不是贺龙让他去红三军的吗？”

瘦子打断了胖子的话说：“那就是贺龙有向蒋介石乞降的动机嘛！”

胖子继续说：“贺龙有通敌的嫌疑，这些历史问题，你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不会不知道吧？”

薛明坐正了身子，说：“我是1942年和贺龙在延安认识的，42年之前的事，我不清楚，你们应该问贺龙去。”

两个人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薛明会这样回答，心里的恼恨却说不出。

冷场了好一会儿，胖子仍然不甘心，耐着性子和声细气地又说：“好吧，就算这些历史问题你弄不清楚，那解放后的问题你总该都知道了吧？”

薛明不吭声。

胖子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材料，拍了拍说：“你看，材料不少呢，贺龙一直有个人企图，在军内到处伸手抓权，是个刀客，可以说是有野心的，是篡军反党反子。”

瘦子接上来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想自己另立山头。你还不跟他划清界限吗？”等他们说完，薛明稳了稳情绪，因为听到他们毫无根据地诬蔑贺龙，心里实在感到气恼，但是怕情绪急了说话容易让他们抓把柄，所以停了片刻，她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说的这些，我也不是今天才听说，早就知道的，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

胖子说：“那更好，有准备就更好，你说说看吧。”

薛明说：“在我和贺龙住在西山象鼻子沟的时候，有关你们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都给中央写过书面的思想材料，是交给你们的。你们可以看那几份材料。也是贺龙口述，我记录的。那上面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既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我也没有什么新的回答。你们去看材料吧。”

听到这种不软不硬的回答，瘦子真是又急又火，腾地一

下就站了起来，指着薛明大声斥道：“薛明，你知不知道要和贺龙划清界限？给你机会你不要，顽固地跟着贺龙跑！贺龙是什么？是大军阀！”

薛明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一字一个地字地说：“军阀？军阀是你叫的吗？你说他是军阀他就是了吗？”

谈话简直没法继续下去，两个专案组的人不曾想到，这个外表瘦弱得似乎风一吹便会倒的被审查对象，这么不好对付。收获全无，弄得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再待下去也没意思了。两个人一言不发地收拾起一堆材料和笔记本，扭转身子便出去了。以后很长很长时间都没有再来。

薛明更是陷入了无人理睬的孤独之中，却有了更多的冷静地思考问题的时间。

贺龙刚一去世，应该说给薛明的打击不亚于晴天霹雳，她的正常思维已近似于麻木，万念俱焚，肝肠寸断。匆忙中见到一面的孩子们是怎样与自己分手的，连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你不能相信，几小时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悄然消失了。总觉得他还在，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他迟早会回到自己身边来的。可是当这一切都被无情地证实了的时候，薛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怎么能与贺龙分开呢？我要去，要和贺龙一起去！”

去哪儿？怎么去？她的神志有点迷乱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

在从象鼻子沟搬出的时候，她一个人木木地收拾着简单的行装。可是，当她翻开贺龙用来当枕头的一个破旧的衣服包时，却一眼看见了那封幺女的信。

信仍然是用报纸包的四方，只是因为贺龙翻看的次

薛明（贺龙夫人）传

数太多了，报纸的四边也变毛糙了。

薛明小心翼翼地打开报纸，一字一句地读起么女人信来。信其实早已读得滚瓜烂熟了，一个字一个字都像是已经刻在记忆中的。但是当她只剩下独自一人读这封信时，忽然想到，这封信么女是写给爸爸妈妈两人的。可是现在，贺龙已经不在了，那孩子们还会失去妈妈吗？

以后孩子们如果问：爸爸是怎么死的？有谁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再问：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谁能告诉他们？

只有自己。

自己不但有责任要告诉孩子们，这两年零六个月与贺龙共同度过的最后岁月是怎样的，而且有责任告诉中央，贺龙的清白是无可怀疑的。生与死相比，生应该是更困难，更需要具备勇气与毅力。因为这种遥遥无期的囚禁的日子，并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薛明选择了生。她走上了一个更艰难、也是更孤独的路。

其实有人一直在关注着她，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份关于她的近况的汇报送上去。

这是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四个年头。也是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进行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迫不及待的一个年头。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而...‘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是这样的，林彪以一个默默无声总在养病的形象，一跃而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成绩确实是“最大最大最大”。但他总有点不放心，总还想要再检验一下自己的实力。林彪显得急不可待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而去了南方之际，他擅

自签署并发布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这样，中央与军委的许多老同志被强行疏散到外地，朱德、董必武去广州；陈云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开封；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武汉……

叶群拨通了给吴法宪的专用电话。

叶群问：“看到‘一号令’了吗？”

呈法宪说：“看到了。我已经照你上次电话的精神，该处理的已经处理了。”

叶群不满意：“还有一个人呢？”

吴法宪懵懵懂懂地问：“主任是说谁呀？”

叶群提高了声音：“就是贺龙的老婆嘛！”

吴法宪这次反应比较快：“噢，我们也打算作安排，给她再换个地方。”

叶群又放平缓了音调：“嗯。准备换到哪里定了吗？”

吴法宪：“还没有。我们打算听听主任的意见。”

叶群：“具体事情还是你们定吧。要掌握一条，就是要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一般的远不行，越远越好。知道为什么吗？”

吴法宪回答：“知道，知道！”

叶群：“要注意，一，不能让她死了；二，不能让她逃了，三，更不能让她胡说八道！”

吴法宪在电话那端连连点头：“主任的意思我们明白了，一定按照主任的精神去办。”

叶群说：“不是我的精神，主要的在于掌握好原则。”

吴法宪说：“明白，这一点我们明白，请主任放心。”

薛明（贺龙夫人）传

叶群放心地把电话挂了。

11月份的北京，已经下了当年的第一场雪。气温很低，但是雪仍然存不住，下到地上便化了，弄得到处都是泥和水，又脏又湿。薛明住的那地方暖气给的也不足，呆在屋子里还得穿上棉衣，否则冷得耐不住。薛明身体虚弱，年龄也大了，血液循环本来就差，手脚总是冰冰冷，脚上还进裂了深深的口子，一动便痛，只能找了些发油给敷上。

有人来叫薛明，说是要给她换个地方。

“为什么？”薛明问了一句。

专案组的人有点不耐烦：“要打仗了！知道不？这是为了你的安全，采取的保护措施。”

“打仗？和谁打仗？”薛明觉得吃惊得很，不由得又问了一句。“这种国家机密能随便说吗？你也当过国家干部，这都不懂吗？”专案组的人觉得她问的真是多余。

薛明也意识到自己问得唐突了，忽视了自己现在的身分，但还有一点不能不问：“那准备让我搬哪里去？”

“你有完没完？”专案组的人终于忍不住了，以前总是由他们发问的，这已经习惯了。“让你搬哪儿就搬哪儿，问什么问！”薛明挺疑惑。这些人越是不说，她越是觉得这里边有问题。贺龙已经被他们折磨死了，会不会再来对自己下毒手呢？这完全有可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自己都要想办法顶住。其实有一点薛明不清楚，就是与她谈话的这个专案组成员，当时也不晓得他的上级要把薛明弄到哪里去。

要搬家其实很简单，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薛明只是没有忘记揣上幺女的那封信，然后就跟着他们走了。

这一走真是走了好远好远，坐火车坐了三天三夜。在这

三天三夜里，薛明几乎没有合眼。这是要到哪里去呢？没有人会告诉她，自己瞎猜也没结果。于是注意看车站的站牌。一站又一站，过了郑州的黄河铁桥，又过了武汉的长江大桥，过了长沙，过了株洲，火车拐了方向，咣当咣当地折向西行了。那边是贵州的腹地。果然，车至贵阳，终于停了，薛明被招呼下车。不过这不是终点地。他们一行人乘上了早已等候在外的一辆军用吉普车，于是又上路了。

车又往南行，一路颠簸，走了多半天，最后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停住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叫磊庄，在一般常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的，它太小了，太不起眼了。

但磊庄有一个军用飞机场，是空军所属。吴法宪终于按照叶群的意思在自己的所辖范围内，找了这么一个既远又偏，跑不走也死不了的地方。

贵州这个地方，也算得是历史悠久，战国时期，此地为楚国的黔中地，号称“夜郎国”。到了宋朝，方更名为贵州，一直沿用至今。自古以来，贵州就以山高路险而著称，人说这里是“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既偏僻又贫穷，所以，旧时一直将贵州作为流放之地。

其实薛明对这里是不陌生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划建行政与军事区时，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划为西南大区。当时，在重庆市设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贺龙当时出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到1954年被调任中央工作时。薛明才带着孩子们乘船离开重庆这块生活了五年多的城市。云、贵、川是与贺龙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当然也在薛明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料想不到的却是，这次重到贵州，却是作为一名囚徒被

薛明（贺龙夫人）传

监护着去的，而且被送到了这样偏僻的一个大山沟里。磊庄是一个空军基地，机场周围都是山。离机场最近的一处叫平顶山，薛明就被安置在平顶山上的一排单独的平房里，有一个班的士兵负责看守。战士们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姓名，只知道自己看守的是一名“重要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上级按照上级的上级指示，多次对他们进行了纪律方面的要求，不许随便与看守的“犯人”交谈，不许向“犯人”提问题，不许“犯人”自由行动，等等，难怪薛明发现自己无论是走路、吃饭，还是劳动、休息，乃至上厕所，都有人看管。战士们很单纯，很听领导的话，仇恨“反革命分子”，也很要求进步。所以，薛明觉得自己也很能理解这些战士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好说的呢？都是在非常的时期，非常的年代，有许多事，自己都无法解释，更不能去苛刻地计较这些年轻的战士了。这样一想，薛明也就释然了。

附近还有一个“五七”干校，人很多，每天可以看见他们排着队唱语录歌，集体开饭，然后拿着工具下田去劳动。薛明与他们身分不同，人家是来进行“再教育”的干部学员，是可以改造好的分子，而她不是。待遇也不同，人家虽然是集体生活，但行动是自由的，薛明却是不论到哪里，都有警惕的目光盯着她。薛明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群活跃的人群，在羡慕之余增加一点遐想罢了。

这个地方位于云贵高原，平均海拔一千至两千米左右，靠近北回归线，地形崎岖，雨量充沛，所以这里多种茶树。茶叶喜欢湿润的气候，在多雨多雾的山间长的尤其好。薛明住的山后，就是一片连一片的绿油油的茶树林子。

可是对人来说，这样阴沉的气候却不觉得舒服。成天价

没有个晴朗的日子，不是下雨就是下雾，总是被那湿透了的雨雾包裹着，就连空气中浮动着的，也是一大粒一大粒欲掉不掉的水珠，衣服湿漉漉而又沉甸甸地贴在身上，有腻乎乎的一种感觉，人说此地是“天无三日晴”，总也没有个爽快的时候。

薛明就每天穿着这样一套湿漉漉的衣服去劳动了，劳动回来也没有的换，也没有的洗，因为第二天还是要穿的。时间一久，衣服都发出一种怪怪的气味来，到后来也顾不上了，薛明也就无所谓气味不气味，因为人已经累得不行了。

所谓劳动，实际带有“整人”的性质，因为派给薛明的，都是些重活、累活，锄草、挖土、担粪、施肥，无一遗漏。薛明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北京看押的近三年时间里，就已被折磨的体质相当虚弱，如同是一支风中残烛，如今，又在这凄风苦雨中飘摇挣扎。茶田里的活儿，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轻松。采茶的季节到了，薛明在天蒙蒙亮时就得起，背了只大竹篓子上山去了。看护她的人吩咐道：“两个人一组，面对面地采，不许影响速度。”薛明的对面，是一个年轻力强的小伙子，身体好，眼睛也好，动作麻利，采得很快。薛明眼睛看不仔细，一不留神就会采了老叶子。那个小伙子不时地用眼角瞄着这边，一见薛明手法乱了，于是就大声呵斥：“怎么搞的，又采老的干什么！看清楚点嘛，不要影响茶叶质量！”薛明尽力做到眼到、手到，尽力跟上那个“采茶能手”的步伐。一天下来，手指头都磨破了，钻心地痛。更糟糕的是她那上了年纪的腰板，累得像是散了架子，躺下去就坐不起来，坐起来就躺不下去。可是第二天照样还得上山去。

薛明（贺龙夫人）传

早春的茶叶终于采集完了，新的任务接踵而来，一刻也不让人歇着。他们不知从哪个仓库里翻出来许多帆布做的枪械包装布，又厚又粗，上面沾满了油腻和灰尘，让薛明抱去洗。水一浸透，帆布变得更硬，小铁皮似的，搓不动揉不动，你就是想洗也洗不干净。薛明真真是耗尽了全力，两只手被泡的刷白，又用脚去踩，力图能洗干净一点，可是你根本摆布不了那些厚重的帆布片。监管人员于是说她是“抗拒改造”。这是无法申辩的，依旧还得去洗。还要编竹筐。说起来这活倒不算太重，可是让你干活却不给你工具。竹蔑子很厚，要用刀把青皮劈开，这样才好编筐。薛明没有刀，只能用牙咬，一点一点地把竹蔑上的青皮啃下来，嘴角都撕烂了，牙齿也松动了，连吃饭都变得困难起来，但薛明仍然咬着牙顶了下来。

可是事情又来了，监管人员横竖都是不满意。你干不了活儿的时候，说是“抗拒改造”。努力去干时，又说是“用劳动掩盖自己的反动思想”。怎么干都不行，薛明真有点哭笑不得，后来一想，不去管他们说什么是了，尽自己的力气去做就是了。

在磊庄，也是一样地消息封闭。每天除了让她去干活以外，闲下来就是政治学习。政治学习的内容，除了念报纸，就是读语录，再就是听管理人员讲“大好形势”。每天必备的是“早请示”、“晚汇报”，每次一开始照例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便是“敬祝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是一种固定的程式化的形式。再就是还有一个“天天读”，一小时，这是“雷打不动”的。日子依然是枯燥、单调，并且没有一丝的希望之光能透过厚厚

的云层照射到这块偏僻的山地来。

薛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幻想。如果说，以前在西山囚禁时虽然痛苦，但毕竟是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互相之间有照顾、有支持。可是如今，她一个人在这大山之中，度日如年，孤独的像一只失群的大雁，不辨东西，只能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顽强地活下去。

没有人愿意与自己交谈，每日里仿佛是个哑巴一般。更多的是回忆，像是翻阅一本封存了多年的日历，一页又一页，许许多多的往事都清晰地浮现在了脑海里。想起了幼年走过酌那条小镇上的土路，想起了老家中那间不大的小屋……

……离天津不远的霸县有个胜芳镇，镇上有一间不大的杂货铺子，针头线脑，油盐酱醋，都是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店主叫王锦发，是个很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奢望，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一个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这件事无论是给他，还是给他的妻子，都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

大女儿叫王爱珍，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子了，镇上的人从来不大注意到她，只是经常看见她扎着一根小辫子匆忙地从街上跑过，知道一准又是给她父亲抓药去了，左邻右舍的也只是叹息一声，这家的日子过的也太艰难了。王爱珍的妹妹叫王爱奇，年龄小，更不懂事，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信奉的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条律，但因为只生了两个女孩而没有男孩，使得她自己就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成日里沉默寡言。

母亲管教女儿很严，当王爱珍七八岁的时候，她就和那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个年代所有做母亲的一样，准备给女儿缠足了。缠足，在20年代的中国，是件很普遍的事，也是件很残酷的事，不知残害了多少天真健康的女孩子的身体与心灵，折断了多少可以飞翔的翅膀。

母亲找出来了长长的布条，用米汤浸泡过，又用棒槌敲打的平平展展，柔软的白布条变得坚硬无比，像一柄薄而锋利的刀片。母亲说：“爱珍，过来，妈妈要为你做一件事，女孩子到了这个年龄都要做的！”

七八岁时的王爱珍虽然年纪小，却生性倔强，颇有自己的想法。她也常看见镇上的一些小姐妹硬是被裹了脚，不仅疼痛难忍，而且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地出来蹦蹦跳跳地玩了，走起路来一扭一拐的，也出不得远门，也做不得大事了。她想，我为什么要是个女孩子呢？女孩子就非得受这个罪吗？弄得像个废人似的，我还怎么才得做活挣钱？怎么样子才能给父母亲争口气？让左邻右舍瞧瞧，女儿一样能当儿子用呢？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这堆布条子被牢牢地裹住了！

王爱珍说：“妈呀，我不能裹。裹上了脚我就不能帮你跑跑颠颠地干活了！”

母亲叹了口气：“妈不是不知道，但这是规矩，谁叫你是个女孩子呢？”

王爱珍说：“我给您当儿子成不成？”

母亲紧紧地攥着布条走近了女儿，苦笑了一下说：“女儿就是女儿，怎么能和儿子比呢？只能怪我命不好，命里就注定了没有儿子！”

王爱珍看见母亲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心里又急又怕，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通跪了下来，哀求母亲：“妈呀，千万

不能裹脚呀！千万不能给我裹呀！求求你了，你就把我当作个儿子吧！”

母亲也哭了起来，只是摇头，什么话也说不出。

王爱珍一步一步地躲让，眼看避让不开，真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只能更加苦苦地哭着哀求母亲。

母女俩正相持不下，躺在炕上的王锦发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痛女儿，便劝阻母亲道：“我看，算了吧！”母亲犹犹豫豫地：“可这是规矩，坏了规矩，外边人家会不会说？”

父亲咳了一阵，才慢慢地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规矩也是人定的。咱们反正也没儿子，也别让女儿受这个罪了。”母亲很听父亲的话。从内心里讲，她也不愿让自己的女儿遭这个罪，弄成个废人似的。谁不心痛自己的骨肉呢？况且爱珍又聪明又伶俐，以往的事，自己都常常是依着女儿的。这次既然丈夫这样说了，也就算了吧。

父母终于答应不给王爱珍裹脚了。年幼的王爱珍暗暗地立下志愿，一定要给父母争这口气，长大了要多多地挣钱。但就此也留下了一个让自己既不能服气而更不能弄明白的问题，那就是女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如同男孩子一样呢？养女儿就要比别人低一头吗？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那种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都极差的环境中，得了这种病，差不多就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王锦发先是咳嗽，后是咳血，吃什么药也不顶用。小杂货铺无力经营，家里又背上了还不清的债。最后，父亲终于不治而终。

家里如同是塌了天一般，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既为了文

薛明（贺龙夫人）传

夫的早逝而悲哀不绝，更为了今后孤儿寡母的生计而愁苦无奈。没有男孩，报丧的事只有让女儿去做了。

母亲叫过大女儿王爱珍，边流泪边嘱咐：“好孩子啊，家里实在太穷了，如今连安葬你父亲的钱都没有，你去求求你姥爷吧，要多说软话，会吗？家里全指着你了！”

王爱珍懂事地点点头，擦着眼泪到姥爷家去了。未曾进门，就先跪在尘埃中，连磕了几个响头，忍不住地细声抽泣，告诉姥爷与舅舅：“爹没了！”结果是几家子凑钱，买了口薄皮棺材，这才收殓了王锦发。

出殡的这天，母亲又为难了。按照老的规矩，家里要由长子摔盆打幡。可是自己身边只有两个幼小的女儿，谁能出面撑住这个家呢？

爱珍拉拉妈妈的衣角，小声说：“妈，我打幡，行不？”母亲的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女儿真是懂事得很，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虽然没有儿子，可女儿也是亲生的，为什么打不得幡、摔不得盆？

问题提出来了，本族的长辈自然是不能同意。理由是，你们家没有男孩不要紧，只要本族有男孩在，就不准女孩上去打幡摔盆！母亲当然也拗不过本族的长辈，她又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那种没有根基的孤立无助，她只能又一次地埋怨自己的命苦。

出殡的时辰到了，打招魂幡的是父亲的一个叔伯弟弟。一小列队伍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彳亍而行。母亲搂住爱珍，牵着爱奇，小声地对爱珍说：“去，去拉着你那本家叔叔的胳膊，和他一块儿打幡！懂不？”

爱珍看了一眼母亲。母亲满怀期望地含着泪望着她。她

点点头，鼓足了勇气，几步跑到队伍前头，踮起脚来，伸出细细的小手，托住了本家叔叔的胳膊。爱珍不理睬周围向她投射来的惊讶不定的眼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女孩和男孩不能一样？我就是我爹的儿子，我就是要打幡！因为还债，杂货铺子也抵押出去了。一个没有男人支撑的家庭如何的举步维艰，是可想而知的。两张小嘴等着吃饭哪，母亲日日夜夜在昏暗的灯光下赶做着针线活，就靠挣来的这一点点钱养家糊口。

偏偏在这当儿，王爱珍提出了要读书！这简直是太出乎人意料了。首先是家穷，连吃饭都困难，拿什么闲钱来供你读书？再者，在当时，女孩子要读书，是件很新鲜的事。镇上倒是有一座私立的女子学堂，是一位开明绅士出资办的。母亲早就看不惯从学堂里出来的女孩子，全是大脚不说，居然还穿着露着小腿的裙子蹦蹦跳跳。母亲一看见就会摇着头说：“这学上的，都上疯魔了！”王爱珍不这么想。她太渴望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以往的事给她的思想上烙上了深深的痕迹。她不甘心总是守着家里那唯一的一间窄小阴暗的屋子。她不能走母亲的老路，不能让人瞧不起。她天真地想，自己一定要多多挣钱，多多做事，好养活妈妈和妹妹，也要让别人瞧瞧，女儿和儿子一个样。她拿定了主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去念书，有了学问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了，就能出去做事了。

母亲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实在也是因为吃的苦太多了，如果能改变一下女儿的命运，做母亲的又有什么不乐意呢？

可是一来家贫，二来又实在看不惯那新学堂新学生。母

薛明（贺龙夫人）传

亲虽然答应让爱珍去上学，却挑了一个私塾让爱珍去念。

有书念就行，爱珍这样想。于是备了两包点心，跟在母亲后头见老师去了。

这所私塾并不太远，就在镇子边上。私塾先生除了教书外还务农。也没有教室，也没有什么教学计划。就在先生的家里。先生让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而先生则是手头上有什么书便教什么书。读这个书是不交学费的，时常给先生送点东西就行。再就是每天要帮先生家里干活，爱珍年龄虽小，却也顶得上半个帮手了。每天照例是去了先干活，活儿干完了便给先生磕头背书。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可以开始认字念书了。王爱珍心里充满了喜悦，她天性聪慧，读的又刻苦又认真。没有多久，《百家姓》、《修身》、《尺读》以及《古文观止》等等先生家里能有的几本书都让爱珍读完了，虽不解其意，字倒是认了不少。

王爱珍不能满足认识这么一堆字，她渴望能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于是又去央求母亲，还是要上洋学堂。

母亲细细地打量着女儿，问道：“为什么非要上洋学堂？念书么，不就是认识几个字吗？在哪儿读不一样？”

爱珍说：“不一样。洋学堂学的东西多，都是些以后用得上的东西，学了有用的。”

母亲点点头，又问：“上学离家远，一个女孩子天天跑，受得住？”

爱珍年龄虽小，却很有主意，她早就盘算好了：“上学的话，就住到姥爷家里去，一来离学校近，二来咱们家里还省了一个人的口粮，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最后一个问题，让母亲自己就先愁得没了主意。“这些事都好办，可是咱家

穷呀，没有钱交学费，这洋学堂还是上不起呀！”爱珍胸有成竹地告诉母亲，“我早就打听好了，这个学校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考得好的学生，可以免收学费。我可以去试试，要是考好了，就可以不花钱了。考不上，我也就不去念了。因为要交钱是交不起的。”

母亲拗不过女儿，终于点头同意了。爱珍就像是只放出笼的小鸟，高兴得连走路都哼着歌儿。初级新生的考试是难不住她的，第一次就考上了榜上第一，学校免费收取了这个聪明而穷苦的女孩子。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使王爱珍虽然年纪不大，却已经懂得了一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住在姥爷家，她不敢偷懒，手脚勤快，家里的大小杂事几乎她全包了。姥爷和舅舅住在一起，开一间出租杂物的铺子，不论谁家要办红白喜事，从桌奇板凳，到灯火烛台，都可以由这租借，也算得上方便。王爱珍每次都把这些物件擦得干干净净，让人家高高兴兴地借走。还回来之后，她又擦一遍，让姥爷和舅舅干干净净地把物件收起来。姥爷喜欢喝两盅，爱珍每天跑到小酒铺去给他打酒。姥姥闲下来纺麻绳，爱珍就蹲在一边给她续线。活儿干得手脚麻利，女孩子又知书又懂礼，姥爷和姥姥们还是很喜欢小爱珍的，都觉得这女孩子大了一定会有出息。王爱珍知道这书读得不易，更是珍惜，更是用功。因为上学时年龄比其他的孩子都大，所以显得格外懂事，除了自己帮学校的堂姨干点杂活，还能照顾管理其他学生，省了老师的许多事。晚上回到姥爷家，等大家都睡了，才把书拿出来，点上小蜡烛学习。说起这个小蜡烛，也是爱珍自己做的，她发现每次收回租出去的东西后，常常有用剩下的蜡烛头，她便细心地收捡起来，重新搓一根捻子，

薛明（贺龙夫人）传

把废蜡烛头烤软了再包上捻芯。自己做的小蜡烛也很好使，每天夜里，便在这微弱的灯光下读了一页又一页。就是在夜里读书，手也不愿闲着，又帮镇上的点心铺磕瓜子仁，一斤瓜子可以得6个铜板，这对一无所有的王爱珍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平时因为没钱，每天都是早早起了之后空了肚子去念书的。就是这样，学得很用功，也很辛劳，一年下来，又得了个榜上第一。王爱珍心里是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自己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学了个好成绩出来；发愁的是一学期结束，又是年关将至，按老规矩，人家家里是不能留外人在家过年的。外孙女也是不能留在姥爷、舅舅家的，所以必须回自己家去。

可是自己的家又冷清又压抑。看到人家全家欢欢喜喜地过年，母亲的心情就更是悲伤。一家三口守着个冷冷清清的炕，围着冷冷清清的灶，真不知这个年怎么过才好。

姥爷和舅，舅知道爱珍家的处境，每每如此，便送一些白面和菜肉来，让她们母女三人能凑凑合合地包上一顿饺子。

很沉闷地包饺子。母亲的心情依旧是好不起来，没有儿子不说，丈夫又早早地逝去，出了门就受人家的白眼与冷遇，除了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还能说什么呢？有一次，二表姨家生了个男孩，大家都去庆贺，母亲知道了也非常高兴，仔仔细细地做了一双漂漂亮亮的老虎头鞋送去了。谁知又被退了回来。母亲很伤心。又有一次，有个街坊为了给久病不愈的儿子冲喜，订了门亲就急急忙忙地办起喜事来了，可巧母亲出门，迎面碰上了吹吹打打的娶亲队伍，母亲很知趣，低着头让开了。谁知经这一折腾，新郎官冲喜不成，反而病

势加重，没过几天竟然撒手去了，办完喜事紧跟着办丧事。这家人觉得是母亲冲了他们家的喜，坏了他们家的事，竟找上门来吵个不休。软弱无助的母亲除了哭泣还能说什么呢？

王爱珍看见母亲受气，心里也是又急又恼，但是毫无办法，只能更加咬牙发愤学习。一连六年，爱珍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小学终于念完了。

校长王邻阁对爱珍说：“你应该接着再念，学好本领，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校长的话鼓舞了王爱珍。爱珍又何尝不想念下去呢？但是再念下去又何尝容易呢？镇上没有中学，要想再读书，就得到天津城里去了。可是学费从哪里来？王爱珍想了又想，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借。

王爱珍来到了天津，找到了亲戚的家，谁知钱没有借到不算，还被数落了一番。又走了一家，依然如此。两手空空，只得又回到了胜芳镇。

王邻阁觉得很奇怪，问道：“王爱珍，你怎么又回来了？难道你是没有考上？”

王爱珍摇摇头，把经过简单地讲了讲。

王邻阁叹了口气，想了一下说：“现在再去考已误了时间了，只有等下一学期了。可是学习不能荒废，这样吧，你还是留在我们学校里，再补习一年功课。”

这个主意当然很好，王爱珍很快就答应了，于是搬到学校来住。王爱珍勤快惯了，也不想让别人说她是被照顾而来，占了学校的便宜，因此除了自己学习以外，还帮助教一、二年级的音乐、体育等，又帮助老师批改卷子，眼勤手勤腿勤，很受老师们的喜爱。到了下一学期又开始招生时，

薛明（贺龙夫人）传

王邻阁和老师们资助她早早地去了天津，考上了天津的三八女子中学。

1936年的天津，是一座繁华与贫穷错杂的城市。一面是洋房洋行，西服革履，一面是破旧杂乱，贫穷加疾病。王爱珍初到天津，借住在六叔家里。父亲的这个同胞兄弟在东北做事，家里只有婶母和几个孩子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乘电车要花一毛钱。王爱珍舍不得也出不起这笔开销，所以每天老早就动身往学校去。走一路看一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是新鲜而好奇，日子渐渐地长了，爱动脑筋的王爱珍在脑海里的的问题又慢慢地多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竟有差别如此之大的两个天地呢？为什么在天津有那么多的租界地？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就能享有什么领事裁判权，可以任意欺辱殴打中国人而不受到制约？为什么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东北逃过来的，只有忍痛卖掉孩子而求一条活路？为什么有的学生好不容易读完了大学，却在若大的一个国家里找不到工作，只得被逼而跳楼自尽？自己原先只想多读书多学本领好挣钱养家，不知还能行得通吗？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王爱珍的思想中产生，越来越多，自己感到又困惑又费解，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呢？

婶母家来了个陌生的年轻人，叫王增，是王爱珍的堂兄。爱珍觉得这位二哥哥怪极了，也没有工作，说他成天闲着吧，似乎他又忙得很，他看的书对爱珍很生疏，读《政治经济学》；他谈马克思谈共产党谈抗日，这些内容也让王爱珍觉得饶有兴趣。王爱珍也找了书来看，说实话，那本书里大多数的词句是读不懂的，但是好像是一股很清新的风，吹进了王爱珍那年轻活跃的心扉。她和这位二哥讨论这些弄

不懂的问题，又去和同学们讨论，开始积极地投入到了学生运动中去了。

没有多久，二哥王增要离开了。王爱珍问他去哪儿，他笑了一下，悄悄地说：“我要去延安。延安，你听说过吗？”

王爱珍摇了摇头。

王增继续说：“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所在地，是全国抗日的中心。蒋介石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才主张抗日救国。现在是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都应该到延安去！去抗日去救国！”

王爱珍似懂非懂，但是王增的那股子激动执着的情绪同时也感染了她。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再也没有见到二哥王增的面。等王爱珍后来去了延安，王增已经离开了那里，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

这时的中国，真是像一枚肥硕诱人的果子，各国列强都按捺不住贪婪的野心，谁都想来咬上几口。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得寸进尺，在占领了东北之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进一步控制了察哈尔地区。在天津日租界里，日本兵随处可见，日益增多。在这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政府仍然是坚持着不抵抗的政策，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情绪。

学生们显得更激动更活跃了，许多学生组织先后成立，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妇救会等等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抗日的烽火迅猛地在中国大地上燃烧，学生们已经纷纷地走出教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

王爱珍知道，不可能很安静地读书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要想读好书找好工作多挣钱养家是根本行不通的了。

薛明（贺龙夫人）传

要先救国家才能保证以后有书读，有事情做。王爱珍很积极踊跃地投入到了各个学生组织的活动中去，做宣传，做讲演，学唱抗日歌曲，日子过得又愉快又充实。由于她的积极表现，由天津扶轮学校的共产党员任树荣联系介绍，在这一年的四月份，她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和任树荣保持单线联系。

王爱珍加入了党组织，连她的邻居刘瑞芳也不知道，刘瑞芳原名刘继光，和婶母的女儿是同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紧挨着隔壁，所以常常来玩，彼此之间很熟悉，也是无话不谈。刘瑞芳是天津学联的总负责人，思想很进步，和王爱珍在许多观点看法上很谈得拢。但就是这样，王爱珍也严守着组织纪律，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给好朋友。

王爱珍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多，组织上又交给她一项任务，编印出版《天津妇女》刊物。这对王爱珍来说是一个崭新内容的工作，从组稿、编稿、审稿到送厂、发行的活儿全由她一个人承担，集主编、编辑、出版，发行于一身，而且要冒着危险到意租界的一个小印刷厂去取回刊物，每次去的心情都是既兴奋又紧张，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女学生，在当时学生众多的天津城里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天津妇女》刊物的版面虽不大，却也办得新鲜活泼，短小精悍，很受妇女和女学生们的欢迎。王爱珍常常用简单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妇女解放、妇女翻身的道理。在教育别人的过程中，王爱珍自己也同样又一次受到了教育。她渐渐地认识到从前的想法是多么的狭窄，多么的简单，而且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求得民族的解放，求得妇女的解放，才能最后、最彻底地解放自己。形势越来越紧迫，在天津马路

上，日本兵随处可见，并且在天津大修飞机场，修筑工事，抓了许多中国的贫苦百姓当民工。但只见抓，不见放，反而在海河里经常见到飘浮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后来才知道，这些浮尸都是被抓的民工，有病死的，有被活活打死的，也有的是干完活以后就被杀害了。这一切，激起了广大市民和学生的愤恨，抗日救亡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人再也不能做亡国奴，再也不能任人宰割了。

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领导组织及时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决定领导和发动一场新的爱国学生运动，抵制日货，反对日军的侵略，呼吁天津守军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天津爱国学生著名的“5·28”大游行。

天刚蒙蒙亮，王爱珍就早早动身赶到了南开大学。游行队伍分南、北两路，南路的有三八女中、南开大学等单位，约定在南开校院集合。王爱珍住的远，尽管动身很早，待赶到校院里，却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了，叽叽喳喳，学生们都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很快集合好了队伍。队伍是八个人一排，学生们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一出校门就高声唱起了抗日救亡的歌曲。队伍很长很长，望也望不到头，歌声激昂，也传得很远很远，老百姓都跑出来看，为这支年轻的队伍鼓劲。

三八女中的学生作为先锋队排在整个队伍的最前列，一排排剪着短发的女学生精神抖擞，非常引人注目。王爱珍在队列中紧紧地挽着同学们的胳膊，激动得脸色通红，明亮的眼睛闪着光，乌黑的短发在风中飞扬，她平时就喜欢唱歌，人又聪明，许多歌一听就会，学的快，唱的也好，这一回更

薛明（贺龙夫人）传

是放开了喉咙，不断地指挥着大家唱歌，一首接一首，情绪高涨。

队伍进行到了金钢桥便走不动了。按照原定的计划，南、北两路学生应该是在这里会合，然后集中到官银号。那儿有一个三角广场，地势开阔，也是个繁华热闹的商业区，学生们准备在那里举行集合与演讲。可是现在的金刚桥，已经不似往日了，桥头布满了警察与大刀队，雪亮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警察们也是一个挨一个，铁青着脸，有的端着步枪，有的端着水龙头，形成了一道人墙，阻碍着南、北学生会合。

这时，南、北两路的学生已经聚集到了金刚桥的左右两个桥头。南路的学生高呼着：同学们，冲过来！人群像潮水般的开始涌动。渐渐地，警察开始往后退了，抵挡不住学生们的涌动，一个当官的跳在桥头上大喊：“不许他们过去！一定要挡住！”警察们又开始往前顶，可无济于事，于是，他们就朝天开枪，企图吓退学生队伍。清脆的枪声在人群上空炸响，听到枪声，学生们更愤怒了，北路的学生领袖振臂高呼：“同学们，冲过去！与南路的同学会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一声令下，学生们像是决了堤的洪水汹涌而上，一下子便冲垮了貌似强大的警察队伍，紧接着冲过了桥，和南路的学生们拥抱在一起，又唱又跳，汇成了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官银号进发。

很快，学生队伍集中到了官银号。按照预先的计划，分别占领了这个大广场的三个角，开始演讲，向市民们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分析介绍了眼前的形势，中华民族已经处在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挺身而

出，肩负起救国的重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学生们的演讲，不但吸引了广大的市民，就连正在警戒的警察也纷纷抱着枪听得入神了，不时频频点头，小声议论着，学生们说的对呀，同样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反而要自己打自己呢？

王爱珍也跳到讲台上进行演讲。大家看见是一位年轻的女学生，都想听听她说些什么。王爱珍镇定了一下情绪，清了一下喉咙，便开始讲起了妇女翻身、妇女解放的道理。一口气说了十几分钟，又指挥大家唱了好几个歌。市民们暗暗称赞道，这个女学生还真不简单呢，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爱国热情，还有这么大的胆识，口齿伶俐，讲得这么好！待王爱珍跳下讲台时，已是满头的汗水，激动得一个劲地心跳，小声地问同学：“我讲得好不好？这样讲行吗？”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这么讲就行，市民们都在夸你呢！

王爱珍不但使市民们受到了教育，通过这次活动，自己也受到了很强烈的震动。自己原先的那点想法是多么地简单而幼稚，如今国难当前，想要安安静静地念书也是不可能的了，只有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这场运动中去，拯救国家，拯救民族，才能彻底地拯救自己。

1937年的夏季，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

书，是没法再念了，若大的中国土地上已经安置不了一张平静的课桌了。王爱珍跑去找刘瑞芳，商量着怎么办，正好刘瑞芳也要找她。

刘瑞芳说：“日本人已经打进华北了，可蒋介石还是磨磨蹭蹭的，一点没有诚意。”

薛明（贺龙夫人）传

王爱珍说：“‘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已经答应抗日了嘛。”

刘瑞芳说：“说归说，做归做，蒋介石的心思不在抗日上。”

王爱珍沉思了一会，说：“那怎么办？反正书已是读不下去了，是不是再搞一次南下请愿活动？我觉得现在最要紧的大事，就是督促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迅速抗击日本人。”

刘瑞芳点点头道：“这个主意很好，本来学联也有这个考虑。”王爱珍挺了挺胸说：“那我得去。”

刘瑞芳说：“咱们再联系几个同学。这样吧，我去联系人，你是不是先回家看看？这一南下，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

王爱珍当天就乘船，回胜芳镇。到家看见母亲，母亲的第一句话就问：“爱珍，你是不是共产党？”

王爱珍吃了一惊，瞧见母亲的神情很担忧，于是安慰道：“我不是共产党，妈，你听谁说的？我不一直在念书吗？”

母亲叹了口气，说：“你在天津演讲、游行、抛头露面的，镇上好多人都知道。女儿长大了，也念了书了，做些什么、干些什么也由不得做娘的了。我只是担心，你别出事就好。”说完，便忙者给女儿做饭去了。

王爱珍看着久别的妈妈和妹妹，看着这间熟悉的小屋，心里不禁涌上一阵酸楚来，心里默默地对母亲说：“妈，女儿不能侍候您了，女儿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女儿马上要出远门了，这也是为了您，为了妹妹，为了千千万万个当母亲的能过上安安稳稳的舒心日子。”

在家里待了没两天，王爱珍便动身返回了天津，没有想到，日本飞机已经开始轰炸天津，占领了火车站。城里一片混乱，许多人家纷纷出逃避难。王爱珍顾不上去婶母家，直接找到了刘瑞芳。刘瑞芳家的房子也被炸掉了一大块。两人找地方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出发，一口气赶了30里路，来到了天津杨柳青。准备南下请愿的同学已经在这里集合了。

一共是18个人，大多数是认识的，因为经常在一起搞学生运动。有刘瑞芳、孙宏志、马树春等人。这时，大家也互相知道了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是共产党员，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笑的是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了，居然互相隐瞒了这么久。于是商量定了，又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委有刘瑞芳、孙宏志和王爱珍。并且委托王爱珍管理大家的经济账。没有盘缠，学生们卖掉了自己的两辆自行车，一辆车卖了30块钱，又七拼八凑地掏腰包，一共凑了不足100块钱，通通交给王爱珍保管。

天津到南京，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这对没有出过远门的王爱珍来说，真是一次小小的“长征”了，她由这里走出了家庭，走出了学校，从此，踏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这18个人一路走，一路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沿途的老百姓看到这些年轻的学生有这么高的爱国热情，听到他们爱国忧国救国的演讲，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还纷纷拿出馒头和窝头等干粮来给他们充饥。到了沧州，终于搭上了一节敞篷火车。天下着雨。火车司机招呼着他们快上车，抱歉似地说：“没办法，就这条件，只能让你们坐敞篷的了。”王爱珍觉得这比走路强多了，淋点雨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大声

薛明（贺龙夫人）传

地对火车司机说：“谢谢你们为抗日出力！”这下子前进的速度就快得多了，不久便到了济南。济南的学生早已得到了消息，早早在车站等候他们，可是谁知来迎接的不但有学生，还有韩复榘的“大刀队”与警察，没等他们下车，就把车站给包围了，说是要“找”学生代表。大家一商量，不能派代表，一派了代表就会被他们扣押起来。警察没有办法，只得采取不许他们出站的办法，并且对他们说：“你们这帮学生就是滋事的祸根，我们不管你是南下还是北上，只要不进济南城，不把日本人给招引来就行。赶快离开！”刘瑞芳与王爱珍们的前进目标是南京，本来也不准备在此久留，于是与济南的学生们挥手告别。又搭上了一节火车，一直到了浦口。

浦口与南京城只一江之隔，站在长江边上，便能望见巍峨的钟山与南京城。可是谁知到了浦口就又被国民党的政府官员拦截住了。这次他们没有派出警察与“大刀队”，由硬变软，想软化分裂学生队伍。让他们住进了一所小学校里，天气炎热，8月的南京如同一只蒸锅，给他们一人发了一领凉席、一个茶缸，还有一本国民党印发的所谓“精神讲话”，每人还发了五块钱。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不许随意走动，不许出小学校的门，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同学们发急，多次找他们交涉，但不得进展。就这样，在浦口被围了一些日子。

这时，大批的平津学生接踵而来，全都拥挤在小小的浦口镇，抗日救亡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政府终于没能拦得住，学生们分批乘船渡过了长江，来到了南京城。

南京，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学生们抱着一腔救国

的热忱来到这里，以为能唤起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醒悟。而国民党当局也不能让这些年轻的学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随心所欲”，于是对学生采取了“管教”的办法，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动员学生投亲靠友，实际是让学生脱离组织，脱离队伍；二是要求学生能找职业的找职业，美其名曰“自谋生路”；三是让学生参加国民党办的“青年战地学习班”，这就是企图给学生们“洗换”脑筋，从中培训特务，为国民党做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爱珍遇到了后来成为另一位元帅夫人的叶群。

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南京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积极抗日的诚意，反而企图分裂瓦解学生队伍。王爱珍对此彻底绝望了。她想，要抗日，就只有到延安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她找到刘瑞芳和孙宏志，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想法，刘瑞芳已经抢先开了口：“王爱珍，我们是来和你告别的，我们要走了！”王爱珍一愣：“走？你们去哪儿？”

孙宏志把手一挥，说：“这个不抗日的鬼南京，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们要到延安去，到真正抗日的中心去！”王爱珍一听就急了，说：“那也不能就顾你们自己去呀！谁不要抗日？我也要一起去！”

刘瑞芳说：“组织上决定你在这儿再留一段时间，因为女生比较多，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能让国民党利用了学生。”

孙宏志说：“王爱珍，你的任务也是很重的。学生里面的成份也很复杂，尤其是到了南京，要注意一部分学生的思想起变化。”刘瑞芳伸出手来，说：“再见了，我们先行一

薛明（贺龙夫人）传

步，在延安等你们！”

王爱珍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紧紧地握了握并肩战斗的战友的手，哽咽着说：“再见了，祝你们一路顺风，尽早到达延安，为抗日出大力气！”

送走了战友不久，南京的形势变得更严峻了，日本人的飞机开始了轰炸南京城。南京已经开始了慌乱的撤退。眼看待不下去了，王爱珍和同学们按照组织的要求，撤离到了江西，找到了新四军办事处。

新四军办事处的同志很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让她们去参加雷洁穷的妇女工作。王爱珍分配到了丰城，离南昌 120 里路，叶群也分来了。

在江西的日子里，王爱珍依然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要办妇女扫盲班，教妇女学文化，学抗日的道理，宣传妇女解放；还经常去慰问从前线负伤下来的伤员，鼓励并感谢他们为抗战流血流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王爱珍只觉得时间不够用，要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恨不能有个分身术才好。

太平的日子并不长久，日本飞机随即又开始轰炸了武汉。江西也待不住了。王爱珍和几个同伴一商量，仍然决定还是要上延安去。主意已定，王爱珍去找叶群，告诉她大家准备去延安，要求她和大家一起行动。叶群犹犹豫豫的，想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她想留在江西和丰城县的县长一起上山去打游击。并且说，打游击也是抗日嘛。王爱珍很吃惊，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大家一起走，不能留在国民党这里！”叶群无奈，再也不能坚持自己的理由，只得同意了大家的决定。

终于到了延安。

王爱珍觉得一切都不同了，天空显得格外的晴朗，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她又可以放声歌唱她所学会的那许多抗日歌曲、苏联歌曲，清脆悦耳的歌声在宝塔山下飘荡，在延河边回响。她又遇见了许多同学，发现精神面貌也大不一样了，彼此之间称呼着“同志”，再也没有了“小姐”、“先生”，显得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平等。王爱珍开心得恨不得成天唱着歌，连走路都一蹦一跳的，幸福得像一只百灵鸟。同样，这些年轻女学生的到来，也给古老的延安吹进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风，安静的延安变得热闹了起来。

当年的王爱珍，今天的薛明，非常怀念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那期间，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希望，可是现在呢？希望在哪里？

十、欲暖还寒

希望终究是有的，乌云终究不能永远遮盖住太阳的光辉。到了1971年的9月，薛明在一次开会时，突然发现那个每次说得唾沫星子四溅的管理人员居然在一下午没提一句“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是疏忽还是另有原因？

薛明是很敏感的，长年的政治斗争熏陶的她习惯于注意观察与分析，从中得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又开了几次会，仍然再也不提“副统帅”了。薛明想，这个“副统帅”出了什么事？到茶田去劳动时，站在乎顶山上，远远地可以看见那个不大的飞机场。与往日不同的

薛明（贺龙夫人）传

是，原来指向四周天空用来防空用的高射炮，现在却掉转炮口对着平面上的机场内部了。

这太反常了，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党内军内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但是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薛明不得而知。而且，对她的监管似乎更加严密了起来。

一天夜里，薛明已经躺下了，白天的劳累使她十分疲倦，慢慢地搓擦了一阵似乎已僵硬了的胳膊与腿。心想，早点睡吧，明天还要干活呢。谁知越是疲倦，反倒越是难以入睡，全身每一处筋骨仿佛都不是自己的，只有颗大脑清醒的要命，不停顿地在思索。

忽然，有人敲门，听动静，外面站着好几个人。

薛明欠起身子来问：“有什么事吗？”

“快起来，有事通知你！”门外的声音不容分辩。

薛明已经习惯了这种呵斥与支配。于是不再言语，坐起来穿上衣服去开门。

门外是管理人员和几个士兵，管理人员说：“告诉你，眼下形势很紧张，上级通知要准备打仗呢，你得练习行军！”

“练习行军？”薛明觉得莫名其妙，上哪儿练习去？怎么练习？“怎么练？就在这儿练！达到练习行军的目的就行，不讲条件。”说着，管理人员扔进来一条帆布背包带，“把背包打上，练习行军就得有个行军的样子！”

薛明伸手拉开了屋里唯一的那盏低瓦数的小灯，准备打背包。“不许开灯！”管理人员连忙又把灯关了。“半夜三更的你这儿又点灯又有动静，别人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薛明不知道管理人员怎么表现得比她还心虚，不是让练习行军准备打仗吗？怎么还偷偷摸摸地回避着人？只好不开灯，摸着黑总算把背包给捆上了。

管理人员用手摸了摸，十分不满意地说：“这叫打的什么东西？”不知为何又一转念：“就这样吧，捆上就行。你背上，不许惊动外边的人，就在屋子里练！”说完把门给关上就走了。

在深夜里，要一位老太太打起背包在屋里转圈。真是为了要打仗吗？还是故意要折磨人？更进一步地从精神上直到肉体上都达到消灭你的目的？

不过薛明却显得心平气和，这么多年，什么风浪没有见过？这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她反而觉得有点可笑，居然想出这么个招儿来，可见也没剩下多少套路子了。他们越是这样加紧了折腾自己，越是证明了自己的猜测与判断是正确的，一定是有了新的变化，而且是大的变化。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这么多苦都经受住了，越是到了最后关头，越是要沉住气，要顶得住。薛明想着，平静而稳扎地一步一步地在狭小阴暗的屋子里转开了磨。

后来，管理人员真的也没什么新招了，上级又不能再给他们新的指令，他们的任务是主要限于看住薛明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天气出奇地晴好，太阳暖融融地从山顶上照射下来。已是秋季了，树叶子在阳光下发出透明的黄色光彩来，远处的山峦一层层绿一层层黄，斑驳陆离，绚丽多彩，像是一幅油画似的漂亮诱人。云贵高原的景致真还是非常值得欣赏的。成熟而丰收的秋季，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季节。管理人员又来叫薛明了，说：“请你去会客。”

薛明（贺龙夫人）传

用了一个“请”字，让薛明奇怪的不得了。习惯了大声地斥责与训话，突然转变了态度，变得斯文和礼貌起来，让人觉得似乎不是昨天的那张脸了，让人觉得不知是对方弄错了还是自己弄错了。薛明疑疑惑惑地跟着走了。

所谓会客室，其实就在隔壁不远的一间屋子。会有谁来看自己？就这几十步的路，薛明想了许许多多人出来，可立刻又被自己全否定了。还没到门口，就有人迎出来说：“薛明同志，你好！”薛明仔细地看了看，认出原来是刘西尧。刘西尧是湖北省委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因为几年来，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熟悉的老同志。薛明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你怎么来了？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怎么找到我的？找我到底要干什么？”

刘西尧笑了，说：“薛明同志，你的问题真不少，我们坐下来慢慢地说好吗？”

管理人员送了两杯茶进来，清香沁人。薛明捧起杯子贪婪地喝了一大口，心里想，这也许就是我亲手采的茶叶泡出来的呢。刘西尧说：“首先要告诉你的，是在9月13日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林彪与叶群从北戴河驾机叛逃，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共八男一女，坠毁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他们搞阴谋活动，反对毛主席，企图另立中央，罪证是确凿的，中央已有文件。”

薛明想，林彪不亡，天理难容！她纹丝不动地坐着，注意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刘西尧继续说：“林彪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其中包括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中央认为，你的问题要重新考虑，重新处理。所以特地派我负责找你，

费了很多周折，才知道你在这么远的地方。能找到你，这就很好。我立刻回去向中央汇报，不久就会有人接你回北京了！”

薛明点点头，这些话好像听起来有点似懂非懂的。

刘西尧临上车前又回过头来叮嘱了一句：“好好等着，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管理人员把薛明送回了房间，临出门前，薛明犹犹豫豫地叫住了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问：“还有事吗？只管说好了。”

薛明疑疑惑惑地问：“是林彪死了吗？”管理人员的口气不容置疑：“是的，是林彪和他的臭老婆坐了飞机逃跑，摔死啦！我们都听了传达了，绝不会错！”管理人员见薛明不再提问，便轻轻地掩上门走了。

薛明静静地一个人坐着，禁不住泪流满面，她在心里轻轻地叫道：“贺龙啊贺龙！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怎么就不在了呢？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哪，我要告诉你，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告诉你呀……”

这意外的消息使得薛明太激动了，兴奋得怎么也休息不好。一闭上眼睛，出现的就是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有亲人的，也有敌人的。薛明从来不信因果报应之说，但她相信那一句话，便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一切都报。”不再叫她去茶田干活了。管理人员客气了许多，也有了很热心的笑容了，并且拿了许多报纸来给她看。薛明把那一摞过期的报纸翻得很仔细，她一向有读报的习惯，只是后来条件不允许了。但是，从报纸上大块大块的文章与口号中，薛明又体会不到更多的喜悦。林彪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一伙虽然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似乎仍有一片阴影存在。看完了报纸，薛明的心又开始沉重起来，新的担忧又浮现了上来。

不管怎么样，事情总算有了一个重新开端。不久，中央派齐英武专程到贵州接薛明。可是因为薛明的身体太虚弱了，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于是只得急电告北京。几天以后，北京派来了医生和护士，专程护送薛明乘火车返回北京。

车到北京站，薛明由护士搀扶着缓缓出了站。先一步回北京的齐英武迎了上来，他带来是北京警卫部队的车。可是意想不到的，空军也派了车来专程接薛明。

这里面有个说头，空军的上级领导就是吴法宪。吴法宪也就是“贺龙专案组”的组长，从一开始起，贺龙和薛明就是在他们的严格控制之下。薛明一个人去贵州，也一直是由空军负责监管的。

那么到底坐谁的车呢？薛明想：“虽然知道吴法宪已被逮捕，但是空军的情况十分复杂，自己弄不清楚。齐英武是中央派来接我的，应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只有他上哪个车，这样便不会出错。”这时齐英武也看见空军的人了，便过去说明由自己来接薛明，这样打发走了空军的车。

齐英武的车把薛明送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是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

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现在被用来接待一批“刚解放”或是“有待重新作结论”的干部，因为自己都有个不大不小的“尾巴”，也觉得别人也有“尾巴”，所以平时是不相互串门的。在招待所后面有一幢不大的楼房。薛明被安排在二楼。

好好地休息了几天，觉得精神与体力上都恢复了不少，心里开始惦念最厉害的，便是几个孩子。自从在西山被监管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孩子们。只是在贺龙去世的那天，在医院里，才与鹏飞、黎明短暂地见了一面，那时自己的思想极度混乱，情绪极度悲痛，没有心绪也没有时间与孩子们交谈。天各一方，又是好几年过去了，如今他们怎么样了？

有人敲门，打断了薛明的苦思冥想。

进来的是在磊庄找到自己的刘西尧。薛明很高兴，连忙让坐。

刘西尧也笑吟吟地说：“薛明同志，不用忙。是总理让我来看你，要我代他问候你！”

薛明确实很激励，连忙问：“周总理他好吗？身体好吧？工作一定很忙吧？真像个钢铁材料做的，没有把他拖垮。”

刘西尧不慌不忙地说：“周总理很好，还是很忙，时间排得满满的，所以他也不能来看你。让我来问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薛明想都没想，就说：“困难是没有。就是不知道我那几个孩子怎么样了？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刘西尧又笑了，说：“薛明同志的心情太迫切了，我很理解。”薛明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是，是太迫切了，太急了一点。”

刘西尧摇摇手说：“不算急，不算急。总理这次派我来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我告诉你，总理已经派人把你的孩子都找回来了，让你们全家团聚！”他一看薛明要站起来，连忙让她坐下，继续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别

薛明（贺龙夫人）传

太激动，也别太紧张了！”薛明似乎第一次这样沉不住气，紧催着刘西尧赶紧说。刘西尧被她催得反倒接不上话，只好乐。等薛明不催了，这才说：“好消息就是啊，待一会儿，鹏飞、晓明、黎明他们几个就要上这儿来了，来看你呀！”

薛明愣愣地，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西尧又大声地说；“就是怕你激动！孩子们哪，全找来了！你们全家可以团聚了！”

薛明喜欢得直埋怨，说：“我听清楚了，不用那么大声！怎么不早点说呢。我也得准备准备。”说着就站起来，又想换件衣服又想拢拢头发，一时间手忙脚乱，倒反而不知先做什么好，一个劲儿地在屋子里转圈圈。

刘西尧耳朵尖，听见楼下有汽车的响动，便忍住笑，说；“什么也不用忙，自己家的孩子嘛！我去楼下看看，估计也该到了。”

不大会工夫，楼梯上一片纷乱的脚步响，薛明反倒紧张得一颗心怦怦乱跳。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群使薛明天天想见而又不能见、如今见到了却觉得一下子眼生的年轻人，还有一个娃娃！薛明真是又欢喜又吃惊，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贺鹏飞长得又结实又魁梧，活脱脱是当年贺龙年轻时的形象。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外衣，脚上的皮鞋不算太新，可是擦得亮锃锃的。薛明可不知道，这是为了见妈妈，贺鹏飞的爱人冯露特意向哥哥借了一副行头。

贺晓明和贺黎明已经不是当年那种黄毛丫头瘦弱单薄的样子了，脸上带着成熟的微笑注视着妈妈。

最叫薛明吃惊的，是晓明抱着的胖乎乎的柯柯。听见这

孩子扑着跑上来稚声稚气地叫“姥姥”时，薛明忍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滚落了下来。大家一起围拢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劝慰着妈妈，劝着劝着，也不知怎么搞的，两个女儿也开始抽泣起来了。贺鹏飞说两个妹妹“招事儿！”话音未落，自个儿的眼角倒先湿润了。

刘西尧退了出来，叹了口气，轻轻地掩上了门。

只剩下薛明和孩子们在一起了。小屋子里显得又拥挤又暖和，谈话是那样地杂乱无章，你抢一句，他插一句，都是那样的急不可待，恨不得一下子把这五年来积存的话全都说出来。结果反而连一个完整的事情都无法说完，大家意识到这一点时都笑了起来，都说：“好了，不说了，夜已深了，该睡了，今后的日子长着哪，天天在一起了，天天可以说了！”可是仍然刹不住话头，只要提起一个话题，大家便又七嘴八舌地抢着重新开始说。最后，还是贺鹏飞说：“不行，得下命令了，分头去睡觉。妈妈身体不好，不能影响她休息！”说着，把妹妹们赶了出去，自己抱着早已睡熟的柯柯也退了出，去，临走时给了妈妈一个很美好的笑容：“早点休息吧，妈！咱们明天再见！”

这一晚上，薛明睡得特别沉，连身都没有翻，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与舒坦。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可爱。早晨玫瑰色的阳光很洒脱地照了进来，使整个屋子里充满了暖融融的气息。几只长着灰毛红嘴巴的无名鸟在枝头上追逐着啾啾直叫，又给沉静的冬日带来了几分活泼。孩子们的屋子里都没动静。薛明终于忍不住了，甚至怀疑昨晚是不是只是一个梦？她蹑手蹑脚地推开门，悄悄地走近床前，看着那一张熟睡的脸，感觉到了那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一股年轻源头旺盛的朝气，那一股强烈的生命延续的勃动。这五年间，他们自己不愿意细说到底吃了多少苦。孩子们是真的成熟起来了。可是贺龙至死也没能见上心爱的孩子们一面。

有许多事是薛明后来才慢慢知道的，孩子们觉得妈妈吃的苦已经是太多了，再也不能给她增添无谓的刺激了。倒是薛明十分冷静，说：“正因为妈妈吃了这么许多的苦，经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所以，不管再有什么事，我相信我一样能挺过来！”

那是1967年的冬季。贺鹏飞兄妹根本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们从显赫的“红卫兵小将”，一下子沦为了“黑五类子女”。家被抄了数次，爸爸妈妈被迫离开。他们被集中到了北京和平里的一幢楼房里。“红卫兵”管它叫“黑帮子弟楼”，因为在那里关着的全是遭到迫害的高级干部的子女。疯狂统治了一切，兽性取代了人性。你不能想象，在那里所遭遇到的是一些什么。一些人被乱棒打死了，一些人被打得落下终生残废，他们兄妹三个下决心逃了出来。

可是，哪里能收留他们呢？父亲以前相熟的叔叔伯伯家，许多人遇到了和他们家一样的磨难，自顾而不能，更顾不上其它了。有的人家情况不明，也不能冒然而去。再也没有想到，当廖承志和经普椿一听到他们的消息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贺鹏飞兄妹三人进了廖家，经普椿阿姨知寒问暖地把他们安置了下来。可是贺鹏飞非常懂事，当他得知廖承志叔叔的家也呆不下去，“革命群众”常常来光顾，所以他被保到中南海去了的消息时，立刻意识到廖家的处境也很危险。三个人住在一起目标太大，窝藏贺龙

的子女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在那种疯狂之极的年代真是不敢想象。夜里，兄妹三人商量决定还是离开这里，另觅藏身之所，不能连累了廖承志叔叔一家。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说了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答应，她也知道，孩子们只要一跨出这个大门，就很难说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毒手。劝说无效，经普椿只好说：“留你们是廖叔的意见，要走也得问问他。”

电话接通了，也找到了廖承志。可是这几个刚强的孩子主意已定，再三挽留也不行。商定的结果，是贺鹏飞同意留下16岁的小妹妹贺黎明。自己和贺晓明仍旧要走。廖承志只得叮嘱经普椿：“多给他们一些照顾，不要让孩子们在生活上发生困难。”经普椿拿出了钱和粮票，掖到贺鹏飞的贴身口袋里，含泪和他们告别了。

廖家后来也遭受了多次的袭击查抄，每每情况紧急，廖承志和经普椿就把贺黎明藏到了母亲何香凝老人的卧室处。因为只有九十高龄的何香凝副委员长的住室，才是周恩来亲自规定的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

贺鹏飞与贺晓明几经周折，到了天津码头。两个人多了一个心眼，没敢说自己是誰，改名换姓，在一艘来往于天津至上海的货船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可以有饭吃，虽然累一些，但是一来因为年轻，身体棒，不怕干活，二来在船上待着比较安全，船上的人对他们都还不错。干了一段时间后，周恩来派人找到了他们，让他们回到北京，住在学校里。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红卫兵”了，被取消了“革命”的资格，实际也受到了监控。每到“八·一八”那个红卫兵第一次受到毛泽东检阅的日子，各个学校都有一番“纪

薛明（贺龙夫人）传

念活动”，并不是开庆祝纪念大会，而是更疯狂地进行大抓、大批、大斗，“黑帮子女”在学校也是和“臭老九”一样首当其冲。到了1968年的“八·一八”，风声特别地紧。贺鹏飞与贺晓明商量，要想躲过这一阵，只有离开北京，到哈尔滨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去避一避。

按照商量好的计划贺晓明一个人先到了天津，结果发现天津也像北京一样紧张。她立即返回北京告诉贺鹏飞，天津不能去。贺鹏飞抱着一线希望执意要从天津走，怎么劝说也不行，他独自一人去了天津，买了船票，也顺利地上了船，这才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下可算是逃出来了。船徐徐地开动起来，渐渐驶出了塘沽口，进入了波涛起伏的渤海湾。

再也没有想到，执掌公、检、法大权的谢富治的嗅觉是那样的敏锐，他居然嗅出了贺家兄妹的踪迹，动用了快艇，在渤海上拦截了那艘轮船，以“企图外逃”的罪名逮捕了贺鹏飞，又抓住了在北京的贺黎明。把他俩送到了北京市少年管教所。

在少年管教所，就是真正的“犯人”了。只有唯一“逍遥法外”的贺晓明去探望他们。那种心灵上与身体上的摧残真是苦不堪言。

贺晓明确想，可不能束手待毙，这一关进去，知道几时才能放出来？于是，她怎么也不甘心，到处想办法找路子递消息，千方百计地营救哥哥与妹妹。消息终于传到了陈毅的耳朵里，尽管当时他的处境也很困难，但是陈毅在这种时候挺身而出，找到谢富治质问道：“娃娃有什么罪？为什么连他们也要关起来？为什么有了病也不让治疗？谢富治无法回答。再加上本来给贺鹏飞套上的罪名就是捏造出来的，查来

查去也查不出个结果来，在关押半年后，只得把贺鹏飞兄妹俩释放了。

父亲去世的那天，他们被找了去，在 301 医院与衰老得几乎不认得的母亲匆匆地见了一面。这以后，不但又与母亲分离，兄妹三个结果也都被拆散开来了。

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已经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又出现了一股新的人员流动浪潮。一方面，城里边锣鼓喧天，结彩挂红，大张旗鼓地欢送应届毕业生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去，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兴高采烈与哭哭啼啼的学生们，另一方面，在农村的田埂上、山坡上，农民们瞪大了眼睛奇怪地望着这群学生，不明白这帮子人要来做什么？

不管怎么说，贺鹏飞兄妹三人是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下乡插队落户的，这种身分有点像“主人”给的一点恩赐，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把你送下去了，你不能忘了感恩戴德。其实对他们的安排，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有意识的分得东西各异，难以往来，贺鹏飞到了四川绵阳，贺晓明到了贵州雷山，贺黎明给分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兄妹之间连原先能做到的相互依靠都谈不上了。其实贺晓明所在的雷山离薛明所在的磊庄只不过是 100 多公里的路，但是并没有人去告诉她们。贺黎明年龄最小，是与几个遭遇相仿的老同志的子女一起去了陕北。但是在一个深夜里，一伙人如狼似虎地冲进了她们那简陋的住处，一把扑灭了油灯，然后拳脚棍棒相加，劈头盖脸地打来，几个孩子受了很重的伤却无处去诉说。就在那一次，贺黎明被打伤了髌骨。

但是应该承认，这段插队生活使他们真正得到了意想不

薛明（贺龙夫人）传

到的收获。他们从城市来到了农村，从狭窄的生活圈子中来到了另一个广阔崭新的天地，他们体验到了生活的艰难，人生旅途的凶险。这些，如果是在原先家中那温暖明亮的住宅里，在父母羽翼的庇护下，都是体会不到的。应该说，他们成长起来了，成熟起来了，翅膀是真正地练硬了，可以放心地展翅高飞了。

知青之间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和传递网络，在患难与共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抱成一团的。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消息就神速地传递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比父辈意识更敏感，立刻就预料到，又会有一番新的变化。果然，时间不长，他们就被分别找回了北京，也终于见到了劫难之后的妈妈。

薛明一时间沉浸在全家团圆的欢欣之中，尤其是那个缠绕膝下的外孙女柯柯，又机灵又可爱，真让薛明疼也疼不够。薛明第一次尝到了当姥姥的滋味，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条件差，柯柯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薛明便翻出旧衣服来改做，每天戴上老花镜缝个不停。她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的“麻烦事”，也找来了无限的乐趣。回到这种温馨愉快的家庭生活中是原来梦寐以求的，可是当真正回来时，薛明一下子还不能适应。几年了，她无名无姓，只是一个“囚犯”，连她自己对“薛明”这两个字都感到了陌生。当她第一次看到别人在一张签单上填上“薛明”时，她特别纳闷，怎么会写上薛明呢？别人听她问得好笑，不写薛明写什么？你本来就是薛明嘛！这样慢慢地，她才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觉到了自己又回到了社会之中。

真正要重新进入社会生活是不容易的。你想进，只是一

厢情愿，因为还有障碍存在。薛明很快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在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住着，没有了明显的监管，但实际上无形的监管依然存在，在薛明的周围，依然有一大片阴影在浮动。阴影仍然来自于上层。

在1966年的“倒贺”阴谋中，除了林彪与叶群外，江青和康生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顾问，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林、叶的阴谋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逞的。现在，林彪与叶群已成一堆黄土，可是江青还在，她丝毫没有忽视薛明的存在与重返北京。她并不是要想帮已故叶群的什么忙，只是本能告诉她，薛明是她的敌人，是死对头。不可以让自己的敌人舒舒服服地过太平日子。这一天，办事处的人走过来告诉薛明，一会儿，有位首长要来见她。薛明想，不知会是哪位老同志？在二里沟这儿住的人，互相之间是不说话不串门的，贺龙的问题也还没有落实，自己还算有个不明不白的“尾巴”，现在会有谁能来看自己呢？

不大一会，办事处的人引着一位中年人走上楼来了。看样子，大约40岁不到的光景，保养的不错，面皮红润，只是长得很平常，几乎没有什么特征，初见一面的人不很容易记得住他。但穿着挺讲究，灰色的中山装笔挺而无一丝褶皱，显然是精心烫过的，脚上穿的是一双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当时许多老干部喜欢穿布鞋，所以他这双皮鞋显得很扎眼，带有点暴发户的残余味道。头发一律向后梳倒，没有一丝乱发，顺顺溜溜的，似乎还抹了点发蜡。当时用这玩艺的人很少，尤其是一个男人。

薛明不认识，在脑海记忆中飞快地搜索了半天，一点印象也没有。于是，她便不好冒然开口。

薛明（贺龙夫人）传

来的人看出她的窘态来了，不知为什么笑了起来，自己很大度地拉过一张椅子坐下，用手整了整裤腿的中缝，说：“你不认识我。我就是迟群。”

薛明听说过迟群。

迟群是山东乳山县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中央警卫师当宣传科副科长。开始搞军训时，他被派到了清华大学军宣队。这个人笨，脑子里有想法，抓住了一个“六厂二校经验”，搞得有点名堂，江青很是垂青，以后让他担任了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江青后来称他是“我们的炮队”，这种比喻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迟群在担任“梁效”写作班子的总策划时，搞了不少文字炮弹。这是后话。当时的情况是，他把手伸到新疆办事处来了，并且专门从下面的部队医院抽调了两名护士，名义上是来“护理”薛明，实际是为了起一个监视作用，找她们来的介绍信上，在“任务”一栏里填写的都是“看押重要女犯”。

迟群资历虽浅，年龄也不大，但也是当过几天领导的人了，进进出出都被人称作“首长”，所以“首长”的架子端得也还可以。说起话来不急不快，不高不低，有点遇变不惊、遇惊不慌的味道。迟群说：“你回来了，好嘛。今天不谈贺龙的问题，贺龙的问题我不感兴趣。”说着，他摆了摆手，似乎将“贺龙的问题”轻轻地挥至一边去了。“谈谈你自己吧。”

薛明愣了一下，“谈我自己？谈我自己什么？我的问题是与贺龙同志的问题紧紧连在一起的。怎么好分开来谈呢？”迟群瞧明不明白要作点解释，于是又说：“谈你自己，

就是说，谈谈你和叶群的事，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更不明白了，说：“我和叶群是什么关系，你们难道到现在还不清楚？在延安的时候，我说了叶群的问题，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谁不知道？叶群两口子现在是怎么整我们的，这你们也不都看见了吗？”

薛明的话里边提出“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这话挺刺激迟群的，因为他相差甚远，眼下还轮不到他来摆谱。

迟群听出来了，面色不变，一点也不生气，这一点上颇有“首长”风度。仍然平静地带着微笑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这是就刚才那句话提醒薛明，从延安过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要明白现在由谁掌握。

薛明并不谦让：“你们既然掌握，何必又来问呢？”迟群又浅浅地一笑，说：“关键是有个问题我总也搞不大清楚。问题是，叶群的问题是你揭发出来的，你怎么就会那么清楚叶群的那些见不得人的活动呢？”

迟群的话里有个套，若是不小心，便会被套进去。这话有半句他没有说出来。应该是“如果你不是亲身和叶群一起参加活动，怎么会对叶群的活动那么清楚呢”。说完，仍然笑眯眯地看着薛明。薛明看着迟群那张微笑的脸，心里反倒渐渐平静下来，反过来问：“你知道那段历史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

迟群的笑稍稍凝固了一下，有点迟疑，一下子没答上来。薛明不急不忙，把自己是怎样认识叶群的，以及叶群在南京一些活动的情况慢慢地说了个清清楚楚。

迟群有点不耐烦了，说：“你说的这些我们自然都是知道的，现在主要是问你怎么会清楚的？”

薛明（贺龙夫人）传

薛明很严肃地说：“你要问这个，其实很简单。叶群在给国民党电台当播音员，谁听不到呢？大家一听就听出来了，这能瞒得了人吗？她和国民党人员关系不正常，在公开场合也是进进出出的谁又看不见呢？她给 CC 分子办报投稿拿津贴，公开参加演讲得头奖，南下请愿的学生都知道这些事。就是叶群自己以为那是在南京的事，到了延安不一定会有人知道。没想到瞒不住人，所以一直对我们怀恨在心。这个你清楚了吗？”

迟群一动不动，没有吭声。

薛明说：“你不去调查叶群的问题，反过来问我和她的关系，问我怎么那么清楚她的事，我倒要问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迟群推开椅子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已经退失得一干二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把情况写一份详细的汇报材料吧，交给我！”

说完，也不打招呼，转身便走了。

迟群不再直接来找薛明了，也许他意识到了这个从延安过来的女干部不是很好对付，从她那儿得不到什么东西。于是把看护薛明的护士叫去问：“薛明都在于些什么？我走了以后，她都说了些什么呢？”看护薛明的护士说：“她每天都在家，也不跟我们说什么，也不出去。”

薛明确实每天都在家，她不敢浪费时间，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磊庄，周恩来派人去接她回京时就曾对她说：“贺龙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身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他都说了些什么，希望你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报告给中央？”薛明没有一天敢忘记自己的职责，她之所以能含辛茹苦地坚持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要向中央作个汇报，也要告诉孩子们和后来的人，贺龙是硬铮铮的共产党员，是清清白白的革命战士，任何企图泼在他身上的污点都是徒劳的。

她日夜不辍地思索，一点一滴地回忆，首先得将一桩桩的具体事实经过整理出来。身体很虚弱，眼睛也不好，并且又要翻开那沾满血和泪不堪回忆的一页，确实很苦。但她仍然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贺晓明成了她的助手，工作的进度渐渐地加快了起来。

十一、忽闻人间曾伏虎

“贺龙专案组”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也就是1971年的5月17日，给中央上报了一份《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给贺龙定的调子是：“党内军内通敌分子”、“篡军反党分子”。虽然当时贺龙已去世了有两年之久，但是他们仍然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四个月后，林彪死了。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结论并没有做成。

另外，在贺龙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6月10日的上午，黄永生、吴法宪、邱会作们动作很快，立即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要求专案组关于贺龙的情况递交一份死亡报告上来，很明确地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并且“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责任了”。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专案组领会的也快，动作迅速，连夜上班，第二天就准时送上了一份“关于贺龙死亡的报告”。在报告中，对他们所做的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等行为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一句话便轻轻地遮盖了深藏着的事实真相。

贺龙去世了。林彪也死了。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他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并且坦承承认“我有缺点，听了一面之辞。”但这条消息，张春桥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自然也就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到了11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又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最后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又一次催问道：“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完全知道整错了，所以核对材料是没有必要的。

于是，中共中央在9月29日发出【一九七四】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贺龙“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

‘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这份通知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薛明知道，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留了一个尾巴。那就是通知还说：“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并且仍然认为贺龙是“病故”。这样一来，就将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事实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逝世六周年的纪念日。中央决定在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贺龙去世以后，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没有一个亲属在场，火葬单子上仍然填的是“王玉”那个名字。火化之后，专案组又将骨灰藏了起来，并且要求绝对保密，不许声张出去。但是不管怎样费尽周折，贺龙的骨灰终于找到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也就要举行了。这一点，薛明是感到欣慰的。

那一天，薛明换了一件干净朴素的外衣，由孩子们陪同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间尚早，工作人员将薛明领到休息室，请她先稍事休息。薛明静静地坐着。虽然休息室人很多，都是专门前来参加安放仪式的，但大家都知道，现在最激动的，恐怕就要数薛明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过来打扰她，想让她一个人先安定一下情绪。薛明双目微闭，安静地靠在一张沙发上。终于有

薛明（贺龙夫人）传

了一个说法，她感到宽慰。这一天使她等待的太久太久，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她抬手轻轻地拢了一下头发，头发已经花白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她显得是那樣的从容、安静，尽管在她的内心深处有如海涛翻卷、阵阵不息，但她的神情却像是一泓宁静不起皱波的湖水。

忽然，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进来，传到了薛明的耳朵里，有人在叫她。

“薛明！薛明呢！”

是周恩来。

薛明知道，今天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原来是没有通知周恩来。因为周恩来那时已经查出了患有癌症，正在住院，接受治疗。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果真是周恩来，他消瘦了许多，原先十分合体的中山装如今像是套在一副架子上一样空荡，脸庞两颊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只有那双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眼睛依然如旧，闪动着智慧的光亮。

薛明又惊又喜又悲，这太出乎意料了，没想到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就抱病前来。这对贺龙，也是对自己和孩子们多么大的安慰呀。薛明连忙迎上前去，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扑扑簌簌地打湿了衣襟。

周恩来急步向前，抚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呀！”话音未落，已是语不成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薛明的眼睛完全被泪水蒙住，雾蒙蒙一片，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痛得厉害，哽咽着只说了一句：“总理，感谢您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贺晓明在旁边，怕他们过于悲伤，连忙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

周恩来摇了摇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周恩来话音苦颤，痛切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顿时，所有在场的人百感交集，休息室里已是哭声一片。

由于压低了规格，原先仪式是由军委主办，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剑英见到周恩来能抱病前来，觉得如果能由周恩来致悼辞就比较合适了。于是压住悲痛，走到周恩来身边，将悼词递了过去，说：“总理，一会儿仪式开始，请您致悼辞。身体行吗？”周恩来点了点头，接过了悼辞。这样，就将原定军委主持的仪式无形中变成了中央主持。

哀乐声起，周恩来带头走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七个躬，全场感动不已。随后，他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代表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薛明想起贺龙生前经常提起过，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的入党仪式上，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个好同志！”现在，周恩来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这一个评价对于贺龙的亲属和因贺龙而受牵连的许多干部来说，是很重要的。使他们从那几年来连续遭受的打击迫害中解脱了出来，还给了他们一个政治上的清白，肯定了一批原来就是很优秀的干部。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政治生命仍是他们的第一生命。

薛明（贺龙夫人）传

贺龙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薛明轻轻地走近了他，似乎怕惊动了已魂归泉台的贺龙，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冰凉而光滑的木质骨灰盒，仿佛像以往一样抚摸着贺龙那温暖的大手。骨灰盒安置的编号是“八一”，也许这是个巧合，不过这一巧合使薛明感到欣慰，应该说，是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贺龙也才真正地拥有了新的生命，他的名字是与“八一”分不开的。薛明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贺龙呀贺龙，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在天有知，你可以瞑目了。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企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形势又变得严峻了起来。

1976年来到了。要用文字来述说这一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显然是力不从心，在这一年当中所有事件所汇聚的历史性、斗争性、复杂性与艺术性，是够编写几十部像《红楼梦》那样的宏篇巨著的。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像是缓慢形成的一个热带海洋风景，越来越加剧，开始由慢及快地搅动了起来，中心风力十二级。

薛明这次并没有处在这个风暴旋涡的中心，但是，她也没有能够站在这个风暴旋涡的边缘之外。

薛明已经不是1966年那时的薛明了。

这一次，她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她每天看报纸，听广播，注意国际与国内形势动态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注意江青等人的言行动作。薛明的头脑非

常冷静，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势态尚未明朗化时，她向孩子们嘱咐了后事。孩子们觉得妈妈这么早就说这些不免有点太伤感。但是没想到薛明自己不但冷静，而且说到自己的后事也是从从容容。

薛明说：“很有可能再把我抓起来……”

贺晓明打断道：“别瞎想，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薛明有点恼火地打断她的话：“这不是岁数大小的事。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已经被监管了六年了，无非再坐一个六年？两个六年？无所谓了。”

贺鹏飞说：“妈，现在的形势不像 1966 年那会儿了，‘三点水’那几个不一定能压得住阵脚，街上针对他们的大字报也有，老百姓议论起来差不多都是公开的。”

薛明点点头说：“这是人心所向嘛。但是咱们也要作好最坏的打算，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应该是个什么样它就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我想你们也要做一做准备才好。”

贺黎明问道：“怎么准备？我们上哪儿去？”

薛明说：“万一我要被抓起来，我自己没有什么，主要就是你们几个。我只有几句话，就是你们立刻带着孩子离开这里，离开北京，找个地方先避一避。要留住青山啊！”

孩子们静静地听着，都显出少有的沉重来。

薛明继续说：“钱和粮票都要准备一点，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一有情况，马上就走。别的东西不要带，保护住人就行。我如果被他们整死了，那也没有什么，跟你爸爸一样，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会证明一切的。我只有一句要嘱咐你们的，我们贺家的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联在

薛明（贺龙夫人）传

一起的。听懂了吗？”

几个孩子都面色严肃地点点头。薛明放心了。给孩子们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每天依旧是该干嘛就干嘛，从容不迫地打发时光，但丝毫没有忽视时态的变化。

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突然。对于这一点，薛明可是没有准备好。

吃完早饭，她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腿脚。这套房子，是1973年5月1日搬进来的。这座庭院，本来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的住处。文化大革命中，小女儿贺黎明无家可归，廖承志夫妻俩保护了她，危难之中，她就经常躲到这个院子里来。大难促成了一桩姻缘。后来，廖承志的儿子廖平与贺黎明恋爱并结了婚。贺、廖两家成了亲家。再后来，中央决定让薛明一家搬进这套院子来住。院子很宽敞，正是金秋十月，树上果实累累，枝繁叶茂。薛明发现，昨天还没有红透的几个柿子，今天已经掉在地上了，肥鼓鼓的，一摸软软乎乎。薛明弯腰把柿子一个个捡了起来，爱惜地拍去沾在皮上的灰，侥幸并没有摔坏，一定甜得很，心想留着等柯柯她们回来吃。

捧着柿子慢慢地往回走，忽然隐隐约约听见大门外马路上似乎有鞭炮声，她微微倾耳听了一下，并没有太在意，也许是谁家迎新娘办喜事吧。

这时，让她吃惊的是贺晓明慌慌张张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又兴奋又紧张，嗓门高得墙外边都能听见：“妈！妈！电话！快来接电话！”

薛明有点埋怨自己的腿，似乎真是上了年纪了，心里想

快脚下就是快不起来。被贺晓明催得发慌，几个柿子又掉在了地上。她还想去捡，贺晓明已经连跑带跳地到了跟前了，一把拉住她就往屋里拽，还连声催个不停：“快点呀，妈，快点接电话，出了大事了！”

“什么大事？”薛明被她拽得气喘吁吁，不解地问。

“您一接电话就知道了，是个意想不到的喜事呢！”贺晓明卖关子不肯立即告诉她。

薛明抓起了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刚刚“喂”了一声，话筒里就传过来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是薛明同志吗？”薛明听出来了，连忙回答：“是，是我。”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薛明屏住气息在听，这个消息来得似乎是非常出乎人意料，但再细思忖下去，又觉得应该如此，事情发展下去只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薛明又想起那句老话来，多好不义必自毙。

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多小时，关于如何抓捕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来龙去脉讲得很细。最后告诉薛明，这些消息，中央还没有公布，但消息素来灵通的北京老百姓已经兴高采烈地开始挑选采购螃蟹了。

薛明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想不到这个喜讯来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又是这样的鼓舞人心，激动人心。前些日子一直深深地陷人在为党为国家忧患重重的氛围之中，现在真是松了一口气，又看到了希望。薛明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真是不容易呀！

孩子们在院子里点燃了长长串串的红鞭炮，炸得真脆。院内院外的鞭炮声连成了一片，热闹得很，震得薛明的耳朵嗡嗡直响。她走到院子里，看着喜庆万分的孩子们，不由欣

薛明（贺龙夫人）传

慰地在想，我们这一辈人所吃的苦、所遭受的磨难，再也不会他们在他们身上重复了！”1980年的秋末。在特别法庭的二庭审判席上，薛明到席旁听。她终于看到了对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作为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此时此刻，她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一切，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家庭与个人的苦难。比起整个国家来，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了。值得庆幸与宽慰的是我们的国家终于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之后，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严冬过后是春天。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这一年，薛明是66岁。